加拿大文学丛书之 三

主编 邢志春
秦明利

假象

〔加拿大〕M·艾特伍德 著

赵雅华 李英垣 译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加拿大文学丛书

第一辑书目



ISBN 7-5059-1602-5/I·1095

定　价：3.65元

(京)新登字172号

加拿大文学丛书之 三

主编 邢志春



假 象

〔加拿大〕M · 艾特伍德 著

赵雅华 李英垣 译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京)新登字172号

加拿大文学丛书之三

假　象

〔加拿大〕玛格丽特·艾特伍德　著

赵雅华　李英垣　译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印张　2插页　149千字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
ISBN7-5059 1602-5/I·1095　定价3.65元

本书简介

《假象》是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艾特伍德的一部著名长篇小说。它叙述的是一个自然、简单而又神秘、虚幻的故事。作者关心的不是故事情节的本身，而是人与自然、超自然的关系，因而有着深刻的哲学内涵。

此作品文字洗练、洒脱，于不动声色之中讲述了一个耐人回味的沉重故事。

加拿大文学丛书

主编

邢志春
秦明利

编委

邢志春
秦明利
赵雅华
蒋立珠
周之南

责任编辑
崔艾真
封面设计
曹全弘

Margaret Atwood

SURFACING

本书根据Paper Jacks ltd 1979年版译出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个自然、简单的故事，又是一个神秘、虚幻的故事。女主人公的父亲失踪了，她与男友以及另一对夫妇朋友去寻找……在这幅用概括的线条勾勒出的图画中，有着极丰富的内涵。这里有社会人、有自然伟力、还有超自然的神灵、鬼怪。

作者关心的不是故事本身，而是人与自然、超自然之间的关系，是自然、超自然对人的作用。这部小说有着深刻的哲学内涵。

编者的话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第一套大型加拿大文学系列丛书的第一辑终于与读者见面了。向中国广大读者介绍加拿大文学，使更多的读者了解加拿大、认识加拿大进而促进中、加两国的文化交流和人民的友好往来是我们编辑这套丛书的宗旨。

本丛书以收集加拿大当代作家的代表作为主，为了让广大读者更全面地了解加拿大文学的历史，我们也选入了一些加拿大早期作家的名篇。

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曾得到过加拿大使馆文化处、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外语系及国内外一些专家学者和作家的资助与帮助，在此我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丛书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纰漏，欢迎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秦明利

1991年5月于哈尔滨

第 一 章

我无法相信自己又走在这条路上。它沿着湖岸蜿蜒而行，湖岸上的白桦树因病行将死去，这种病是从南方蔓延过来的。我注意到这里的人们有水上飞机出租了。但这地方仍旧离城市不远；以前我们没有越过这里的界地，现在该城拓展了许多，以至有了一条旁道，这是一项成就。

我从未把这地方作为城市看待，只是把它作为最后或第一个边区村落来看待，这取决于我们行进的方向，这里棚屋和箱子挤在一块。一条主要街道上有一座电影院，红色的R字一闪一闪的，两家饭馆都销售黑色汉堡包牛排，上面涂着黑糊糊的肉汁和罐装豌豆，这些豌豆松软洁白，一粒粒象是鱼眼球，还有用猪油做的炒杂碎。我母亲说过，假如你要了一份荷包蛋，你可以根据蛋的边缘判断它是否新鲜。

在我出生以前，有一回我哥哥爬到其中的一家饭店的桌子底下，把他的手伸进上菜女招待的大腿中间，上下滑动；当时还正打着仗，她穿的是发亮的桔黄色人造纤维长筒袜，他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袜子，我母亲不穿这玩艺。又有一年，我们光着脚走在那儿的雪地里，跑过人行道，因为我们没有鞋，鞋子在夏天里就已磨破了。当时我们用毯子裹着双脚坐在汽车里，假装受了伤。我哥哥说，德国人把我们的双脚打飞了。

而今，我坐在另一辆车里，而这辆车是大卫和安娜的；这车的尾部的突起状装饰物很显眼，车身镀有铬合金属的条纹。十年前的样式，笨拙的怪物。他得把手伸到仪表盘底下才有办法把它点上火。大卫说，他们买不起更新的车，这话未必尽然。我发现他车开得好极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把搁在外面的手放在车门上。一是为了撑牢自己的身子，再就是必要时，我可立刻跳下车去。以前我和他们一起坐过这辆车，但行驶在这条路上，情形有点不对劲，不是他们三人出了毛病，就是我出了毛病。

我坐在放行李的后座上。乔这家伙坐在我身边，嘴里嚼着口香糖，还握着我的手。他们俩个也在打发时光。我审视着那只手：手掌宽大得很，短短的指头一会儿握紧，一会儿松开，拨弄着我的金戒指，那是他的习惯性行为。他的手是地道的种田人的手，而我却有一双种田人的脚，这是安娜说的。现在每个人都玩点小魔术，她在晚会上给人家看手相，她说这样可以取代交谈。当她看我的手时，她问："你是双胞胎出生吧？"我说不是。"你肯定吗？"她说，"因为你手上的一些手纹线是双重的。"她的食指探索着我："你的童年很美好，但后来就有了这条有趣的断裂线。"她皱了皱额头，我说我只是想知道还能活多长时间，她可以省略其它的内容。然后她告诉我们，乔的手表明他是个可靠的人，但不敏感，我置之一笑，其实那是误会。

从乔的侧面看上去，他简直就象美国五分镍币上的水牛像，毛发浓密，上面安着一个矮鼻子，一对眯缝眼，眼中流露出挑衅而又愚不可及的神态。这种眼神只能出自曾经显赫一时，而今却面临灭顶之灾而甚感惶恐的某一物种。这也是

他对自己的看法：倍受欺凌，真是岂有此理。他暗地里却希望人们为他建一座公园，一座象鸟类禁猎区似的公园。绝妙的乔。

他意识到我在注视他，于是松开了我的手。然后吐出口香糖，并把它揉成团包在锡箔包装纸里，塞进烟灰缸，双手抱着膀。这意味着我不该注视他，于是我的脸转向前方。

起初几小时我们坐车翻过由牛群点缀的平坦的山坡，又穿过树叶繁茂的树林以及那些枯死了的榆树，而后驶入针叶林地段，又穿过炸药炸开的路堑，这里的石头都是呈粉红和灰白的花岗岩，接着又驶入那些容易坍塌的旅行者小屋。小屋上挂的牌子写着“此地可通北方”的字样。至少四个镇子都有相同的牌子。未来属于北方，这曾是一句政治口号；我父亲听人说起这句话时，他说，除了过去，并且这也不足挂齿，北方什么东西也没有，现在无论他在哪里，死了还是活着，对此谁也不知道，他已不再说那些警句式的语言了。他们毫无权利变得衰老。我羡慕那些父母在他们年幼时就去世了的人们，因为这样使人容易想起，他们没有变化地留在子女们的记忆之中。我敢肯定我的情形会是这样的，我可以晚些时候离开或返回，什么都不会发生变化。我把他看做生活在另一个时代的人。他们只为了自己的事而奔波，安全地躲在一面象果子冻一样半透明的墙壁后面，象冻在冰川里的哺乳动物那样。我必须做的就是一旦准备就绪，就立刻回家。可是我不断地往后推迟，那儿有太多的解释理由。

现在我们正驱车经过岔道，向着美国人当时挖的炮兵掩体开去，从这里看过去那座掩体就象是一座平静的山丘，云彩覆盖，但穿越森林的粗重的电线暴露了它的秘密。

据说他们已离去了，或许那是个计策，他们可以轻松地生活在那个地方。将军们可以生活在用混泥土筑的掩体内，而普通士兵则可在地下建筑里生活。那里的灯火昼夜通明。我们无法进去看一看，因为我们没有被允许。这座城市邀请他们留下，他们对于商业有好处，因为他们很能喝酒。

“那地方就是放火箭的地方，”我说。我本该用“曾经是”，可我没去纠正它。

大卫骂道：“该死的法西斯，蠢猪美国佬！”他好像是在评论天气。

安娜一言不发。她的头倚靠在座位的靠背上，轻柔的发梢在风中吹拂着，风是从没关紧的车窗缝里吹进来的。起先她一直唱着《旭日之屋》和《丽丽·玛莲》这两首歌，她把它们唱了又唱，尽量把嗓音控制得沙哑和深沉；但发出的声音却是沙哑的童音。大卫打开收音机，但什么也收不着，我们的位置正好处在两家电台之间。当她唱了一半圣·路易·布鲁斯时，他便吹起口哨来，于是她便闭嘴不唱了。她是我最最要好的朋友，即我最要好的女友；我认识她已经二个月了。

我往前倾了倾身子，对大卫说：“酒店就在这儿附近，再向左转一个弯就是。”他点了点头，并放慢了车速。我早些时候就告诉过他们有关酒店的事，我猜想那地方会引起他们的兴趣。他们正在拍摄一部影片。乔负责摄影，他以前从未干过这一行，但大卫说他们是新型的“文艺复兴之士”。你教会你自己该学的东西。这大概是大卫的想法，他自称导演：他们已把所有的存款都取了出来，他需要把他们所遇到的一切都拍摄下来。他把这称做随意样片。这也将是这部影

片的名称：《随意样片》。当他们使完了胶卷（这些胶卷是他们唯一能买得起的东西，摄像机还是租来的），待他们看完所拍摄的一切后，他们将重新剪接这些镜头。

“如果你不知道那是关于什么的，你怎么能知道该拍摄些什么呢？”当大卫描述这部电影计划时，我问他。他用他那教新手入门的眼神望了我一眼，说：“如果你事先就关闭头脑，就象你现在这样，你就什么也做不成。你需要的是向前走。”正在炉子上煮咖啡的安娜说，她认识的每个人都在制作电影，但大卫说这不是他不能拍摄电影的混帐理由。她说：“你是对的，非常抱歉。”但她在他的背后嘲笑这件事。她称其为“任性的脓疱”。

那个酒店是用混凝土把酒瓶粘在一块而建成的，这些酒瓶瓶底朝外，绿色和棕褐色瓶子交错排列成锯齿状，样子象是学校里教我们画在圆锥状帐篷上的图案；另外的一堵完全由酒瓶砌成的墙壁围住了这座房子，按着字母顺序排列，于是棕褐色酒瓶便拼成了“酒瓶别墅”。

“挺带劲的呢。”大卫说。他们从车上走下来，手里提着摄像机。安娜和我随他们之后也下了车；我们伸了伸臂膀，安娜抽起烟来。她穿着紫色的束腰外衣和白色的喇叭裤，裤子上有一块污迹，那是车上的油垢。我说她该穿条工装裤之类的裤子，她说穿那样的裤子使得她显胖。

“是谁建造的呀，上帝。想想那是什么样的绝活哟。”她说，然而我对此一无所知，只知道它一直就在那里，环绕着它周围的那个幽黑的云杉沼泽地使这座建筑显得更为神秘莫测。那是一座极不平常的纪念碑，它是专门为某个古怪的流放者或象我父亲那样的一位自愿成为隐士的人建造的。逸

择这片沼泽地是因为只有这个地方才能使他实现一生住在瓶子房里的梦想。墙的内侧是片尚未成形的草地，还有一个桔黄色的树丛铺垫而成的金盏花坛。

“妙极了，”大卫说，“真带劲啊！”说着说着他搂住了安娜，拥抱了她一下以表示他的喜悦，好像她与这座酒瓶别墅有什么联系似的。我们重又上了汽车。

我往两边的车窗望出去，外面就象是电视屏幕一般。直到我们抵达城市界标时我什么也没想起来，界标的标志是一块牌子，牌子的一面用法语写着“欢迎”，牌子的另一面用英语写着“欢迎”。这块牌子有一个子弹孔，弹孔四周泛着红锈。秋天里，猎人们总是拿它当练射击的靶子；不管人们换了多少次牌子，不管人们给它涂了多少次油漆，子弹孔照样重现不误，好象它们不是钉在那儿的，而是由于某种内在的逻辑或传染病而长出来的，象霉菌病一样。乔想把那块牌子拍摄下来，大卫却说：“不、不、不，何必呢？”

现在我们行驶在回乡的路上，异域他乡。我的喉咙开始发哽起来，当我发现人们在说话，而我完全不明白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时我的喉咙就曾发哽过。装聋作哑是比较容易的。当他们想要两角五分钱时，他们就会把卡片伸给你，上面有手写的字母。即使这样你也得学学如何拼读。

首先扑鼻而来的是锯木厂的木屑味。院子里堆着许多木屑，还有堆积成山的木板。那些纸浆原材将运往其它地方的造纸厂去，但大些的原木则在河里绑成水栅状。一圈连在一起的原木，圈内是一根紧挨着另一根的活动的漂浮的原木；它们通过高架滑木运输道运往锯木厂，还是老样子，没有什么变化。我们的车在高架滑木道底下经过，我们逶迤而行，

来到那小小的镇子上。镇子上公共花坛摆得井然有序，镇子中央还矗着一座十八世纪的喷泉，好几尊石凿的海豚，还有一个面部缺损的小天使立于喷泉中央。它看起来象座临摹的建筑，但也许它是真正的呢。

安娜说，“噢，多么了不起的喷泉啊！”

“一家公司兴建了整座喷泉。”我说。大卫接着说，“可恶的资本主义劣等货。”说完又吹起口哨来。

我要他向右转，他照办了。那条道应该在这儿的，但取而代之的是一块歪斜着的花格板，道给堵死了。

“现在怎么啦？”大卫问。

我们没带地图，因为我当初认为不需要它。“我去问问路。”我说。于是他把车倒了出去，然后我们沿着大街往前开，一直开到一家街角杂货店，它出售杂志和糖果。

“你指的一定是那条老路吧？”那位妇女略带口音地问，“那条道已多年不通了。你们需要走一条新道。”我买了四个香子兰蛋卷冰淇淋，因为只打探道儿而不买点东西可不太好。她用一把铁勺子从一个纸筒里往外挖。从前，冰淇淋只用纸卷装着的，这些纸会象树皮一样被撕掉，用拇指把短短的冰淇淋柱捏成圆锥状。这样的法子已废弃不用了。

我回到车上告诉大卫行车路线。乔说他更喜欢巧克力。

一切都与从前不一样了，我不再记得路了。我用舌头舔着蛋卷冰淇淋，努力把精力都放在它的上面，现在人们往冰淇淋里放海草，我开始抖动起来，为什么道路不同了呢！他不该允许他们这样做的呀；我想要返回城里去，不再查寻他到底怎样了。我要哭叫了，那简直太可怕了。他们将谁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我也不会知道。我使劲咬了口蛋卷冰淇

淋，有一阵儿，我什么也感觉不到，除了刀割似的疼痛。麻醉法是一种技能：如果你感到刺痛，你就发明另一种不同的疼痛。这一招果然灵验。

大卫吃完了蛋卷冰淇淋，把带有纸报箱气味的把柄抛到车窗外面，然后发动起汽车。我们经过一个从城里延伸过来的地段，这地段是在我离开此地后才延伸过来的。新建的四方形平房除了粉红和淡蓝的装饰物以外大都和城市里的平房一样。再往前一点的地方有几座棚屋，它们是用沥青纸和未加装饰的木板修成的，一群小孩正把泥泞的土地权且当作草坪在上面玩；大部分孩子的衣服都太宽大了，这使得他们看起来很矮小。

"他们一定在这儿占了不少便宜，"安娜说，"我猜想那是教堂。"然后她又说，"我不算太坏吧。"

大卫说，"真正的北方是强悍和自由的。"

那些房子的另一头，两个稍大一点的黑脸孩子，朝我们的汽车举起听罐，里面装的大概是山莓之类的东西。

我们来到加油站，那儿的一位妇女告诉我们往左拐，大卫高兴得叫了一声："噢，快看呀。"说着走下了车，仿佛要是他们跑得不快，它就会跑掉似的。他们急于前往观看的是油泵旁站台上的三只剥了皮的驼鹿：它们披着人的衣服，后腿上用金属丝加固后竖立起来。那头公驼鹿披着军用胶布夹雨衣，嘴上刁着一个烟斗，母驼鹿穿着紧身短裤，戴了顶带花的帽子，一头小驼鹿穿着一条短裤叉，还穿了一件带条纹的运动衫，头上一顶棒球帽，手擎一面美国旗。

安娜和我紧跟在他们之后。我走到大卫后面对他说，"你是否要给车子加点油啊。"他不该不付钱就去观赏这里

的驼鹿，就象这里的洗手间一样，那是用来招揽顾客的。

“噢，瞧，”安娜说着把手放到嘴上。“屋顶上还有一头呢。”果然，一头小雌驼鹿穿一条有褶边的裙子，蓄着一条淡黄色的辫子，一只蹄子上擎着一把红雨伞。他们得到了它。加油站的主人穿着一件衬衣，站在他那厚厚的玻璃板橱窗后面，透过那层灰尘，阴沉着脸看我们。

当我们重新回到车上以后，我似乎在为自己辩解道，“这些东西过去都是没有的。”安娜摇了摇头，我的声音听起来肯定有点奇怪。

“在什么以前？”她问。

那条新路铺得很直，两条单向行车道中间有一条线。界标已经开始出现了，还有几个广告牌，有座木制的十字架，上有耶稣塑像，耶稣像身上肋骨暴突，那是异域他乡的神灵，对于我来说，它依旧与往常一样神秘。耶稣像下面有几个装着花草的果浆坛子，其中有雏菊，红色“魔鬼”画笔，白色的那管可以拿掉，这里还有印第安人喜爱的花束，蜡菊。看起来这地方一定发生过交通事故。

先前的老路偶尔横陈在我们面前；它很脏，到处都坑坑洼洼，这条路是依地势而修筑的，一会儿爬坡，一会儿下坡，有时还绕着悬崖和石砾而行。过去人们总是尽快地通过这一段道路。他们的父辈对这里的路段了如指掌，就是蒙上眼睛，他们也能走出这条路的，而他们也确实经常这样干。通过写有“小村庄”的标牌，从升降机的边缘急驰而下，勉强通过岩石面，“靠左行驶”，喇叭高鸣；其余的人在车子里夹得紧紧的，尽管他们的母亲总给一些救命药之类的东西，但还是晕得越来越不行，最后在眼花缭乱之中在路旁呕吐，

路边上长有翠菊和粉色的火草，当然要是他能及时停住，并把头伸出车窗的话；如果车子不能马上停下，他就得吐到纸袋里去，他已为紧急情况做好准备，如果他很匆忙，他根本就不想停下来。

那可不行，我不能把他们叫做“他们”，好象他们是别人家的人似的：我必须遏止自己讲那个故事。然而看到那条老路在远处蜿蜒起伏，穿过林子（由于野草和幼树使车辙和道路变得模糊不清了，不久就会消失），这种情形使我不自觉地把手伸进衣袋里去抓我买的救命药物。但这已经是没有必要的了，虽然那条新辟的路从人行道拐向了砾石铺就的道路，（“上回肯定挑错人了。”大卫开玩笑地说。）后面和四周扬起的我们颇感习惯的尘土，与汽油和汽车室内装璜味混合在一起。

“我想你会说这很糟糕，”大卫头也没回地说，“其实一点也不糟糕。”我们差不多到了我们要去的那个村庄，这儿的两条道路交汇在一起，但加宽了路面，岩石已被摧毁，树木连根拔起，根须暴露在空中，针叶也开始有了红色，过了平整的悬崖，那儿多次涂写过选举的标语口号，有的变淡了，有的已经磨损，有些则是刚刷上的黄色和白色标语：“投高德特一票吧！”“投奥布里恩一票吧！”并排还涂有心形物，大写字母、广告，诸如“色拉达”、“蓝月山庄半里地”、“自由的魁北克”、“去你妈的蛋！”、“请君饮用冰镇可口可乐”、“基督救世”、等等，等等，形形色色的要求、语言的大什锦，要是用X光照一下这个大什锦就可知晓这个地区的全部历史。

他们在哄人，我们到得出乎意料地快，我觉得我被剥夺

了某些东西，好象我不能真正到达这里，除非我已经遭受了痛苦、折磨；好象进入视野的那湖泊，我们已经看见它了，象赎罪一样蔚蓝和凉爽，是应该透过泪水和呕吐的晕迷而看到的。

第 二 章

我们滑下最后一个山坡，车子下面的石子发出砰砰的响声。突然，出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东西，一块招牌映入眼帘，牌子上面写着“汽车旅馆”、“啤酒酒吧”的字样，有人甚至试用霓虹灯，但完全没用，外面没有任何车辆停靠，“空房”的牌子高高悬挂着。这座房子象其他价格便宜的汽车旅馆一样，由拉毛水泥粉刷，安有铝门，这座建筑周围的泥土仍很结实，尚未被道路边上的野草所淹没。

“让我们喝几杯吧，”大卫对乔说。说着他掉转车头。

我们朝门口走去，但就在这时我停下脚步。在这地方离开他们是再好不过的了。于是我说，“你们进去喝点啤酒或别的什么，我大约半小时后回来。”

“好的，”大卫说。他懂得什么是该避免的话题。

“要我一起来吗？”乔主动搭讪道；但我告诉他不必时，他满是胡须的脸由于松了口气而发出光来。他们仨消失在酒吧的门帘里了，而我则顺着山坡走下去。

我喜欢他们，我信任他们，我想不出还会有谁更令我喜欢，但我宁愿他们此刻不在这里。虽然他们对于我是很有必要的，大卫和安娜的车是唯一使我感觉到他们的必要性的东西，这里没有公共汽车，没有火车，而我从不搭车。他们是在帮助我，而他们却不愿表示出来，他们说他们觉得这样有

趣，他们喜欢旅游。然而我来这儿的理由使他们很尴尬，他们无法理解：他们早就失去了双亲，正象你所想象的那样；乔从不提及他的父母，安娜说她的双亲不是什么重要人物，而大卫则把他的双亲称为蠢猪。

这里曾经有一座浮桥，但它太离奇出格了，在我离开的前三年，人们把它给拆了；那是为了改善水坝，取代它的是一座混凝土桥，它庞大、宏伟，并使这个村庄相形见绌了。正是这个水坝控制住了湖水。六十年前，人们提高了湖水的水位，因此他们什么时候想要把那些原木顺着窄窄的河道放到下游的锯木场时，他们便有足够的水力。但他们现在不再运很多原木了。有几个人维修铁路去了，每天运走一车皮的原木，有两家已开起了商店，小的那家过去常说英语，另一家则不说英语。其余的人经营旅游业，做起了生意人。穿的花格呢由于玻璃包装的缘故而起皱，而他们的妻子，要是她们来了，他们便成双成对地坐在门上装有帘子的单间里，在她们的男人钓鱼玩的时候，她们便相互倾诉苦衷。

我停下来靠在河沿的栏杆上。闸门开着，泡沫状的、棕褐色的急流砸向岩石，声音隆隆。这种声音是我回想起的第一件事之一。正是这种声音在当时提醒了人们。当时是在晚上，我正躺在独木舟的底板上；人们从村子里出发，但当时出现了浓雾，浓雾使人们难以看清湖水。他们最终发现了河岸，并沿岸而行；当时它静得出奇，他们都听得见，他们以为是狼嗥的声音，那声音由于山林和浓雾的阻隔而变小，这意味着他们的前进方向是对的。他们听见了急流席卷而来的声音，就在水流涌向他们的时候，他们看到了他们所处的位置。他们往回走，那阵嗥叫原来是村子里狗叫的声音。要是

独木舟倾覆了，我们便会被溺死，但他们很冷静，临危不惧；留在我脑海里的只有那白茫茫的雾气，静静的流水，和左右不停地晃动，绝对的安全。

安娜说得对，我有一个安逸的童年；那是在战争中期，我从未见过斑斑点点的灰色新闻短片，没见过炸弹和集中营，没见过那些领导人穿着制服站在人群中高声叫喊，没见过痛苦和毫无意义的死亡，没见过旗帜伴着国歌的旋律而舞动的情形。我直到后来才知道这些，那是我哥哥得知这些而告诉我的。当时的情形让人觉得很平静。

此刻我到了村庄里，正走在村里的路上，期望着怀旧心境的出现，因为有一片难以形容的建筑物就象一个接通了电源的基督诞生图一样闪着灵光，它经常出现在我的记忆中；但什么也没发生。这个村庄一点也不比从前大一点儿，眼下孩子们大概都到城里去了，同样的两层房屋，窗台上和四方形屋顶的角上依然爬满旱金莲属植物，由于雨水冲刷，这些房屋出现了五颜六色的线条，就象一条条风筝的尾巴；虽然其中有些房子比较灵巧，但已经都变了颜色。岩石山坡上的白色玩具小屋一样的教堂被人们所忽视，油漆剥落、窗台破旧。那位老教士一定是走了，我的意思是一定去世了。

沿着湖岸，许多船只停靠在政府经营的船坞上，但没有几辆车在那里停靠。船比车多，不景气的时节。我试图判断出哪一辆是我父亲的车子，但当我的目光掠过这些车时，我马上意识到我不再知道他开什么车了。

我来到了去保罗家的岔道上，这是一条肮脏的小道，塞满了许许多多的轮胎。它横穿铁轨，通向一片沼泽地，原木并排堆放在湿漉漉的地方。有几只黑头蝇追逐着我，这是七

月份，已经过了孳生期，但象往常一样还有几只剩下。

那条路开始上坡，我顺着他的那些房子背后爬上那条路，那些房子都是保罗给自己儿子、女婿和另一位儿子盖的，那是他的家族。保罗的房子很新颖，黄颜色，还有栗色装饰物，低矮的农家款式；虽然这儿不是个农业乡村，绝大部分都是石头，即便有土壤也是很薄，并且沙质很大。保罗所干的与农业有关的事情就是养了头奶牛，后来由于奶挤得过多而死亡。过去关这头奶牛和另外几匹马的地方现在成了车库。房子后面的空旷地上有两辆五十年代的汽车停放在那里，一辆是粉色的，另一辆是红色的，均被搁置在大木料上，没有轮子；零散地放在它们旁边的是一些生了锈的汽车零件。象我父亲一样，保罗把有用的东西都积攒起来。这座房子增加了象教堂塔尖一样的尖顶结构，它是用先前的汽车零件焊接而成的；这结构的一端安着电视天线，而另一端则安着避雷针。

保罗正好在家，他正在房子旁的菜园里头。他直起腰向我张望，脸上的皮肤象皮革似的，神情与以往一样，就象一个密不透风的手提箱；我想他不会知道我是谁的。

“早上好，先生。”我已走到栅栏跟前，对他说。他朝我走前了一步，仍然有所戒备，我接着又说：“你不记得我啦？”我笑盈盈地说。令人窒息的感觉再次袭来，我的喉咙开始发麻；但保罗说英语，他外出闯荡过。“谢谢你给我写信。”

“啊，”他说，虽然没有认出我是谁，但已推断出我是谁了，“你好。”他也开始微笑起来。他把双手合在脑门前面，就象一个教士或者说象一尊瓷做的达官贵人塑像；他没

有说别的。我们俩站在栅栏的各一边，表情呆板，带着一副欲言不能的姿势，嘴拢成了圆形。终于，我又发话道："他回来了吗？"

听到这话他的下颌突然下垂，他的头摇了几摇，"啊，没哪。"他侧着眼看着他左脚边的一株土豆秧，脸上似乎露出一种指责的神情。然后他又猛一抬头，高兴地说，"还没哪，怎么了？但也许很快就会回来了。你的父亲，他是知道这片林地的。"

这时候保罗太太已出现在厨房的门口处，保罗用略带鼻音的法语和她说起话来，我听不懂，因为我在学校只学了最初级的几个词。民歌、圣诞颂歌，以及后来高年级时背诵的拉辛和波德莱尔的篇章，这时它们也派不上用场了。

他对我说："你该进来喝杯茶。"说着他弯下腰卸去木头门闩。我径直走到保罗太太站着等我的门边，她伸出双手以示欢迎，哀伤地微笑摇头，好像我因别人的过错而被裁决。

保罗太太用新的电炉煮茶，电炉上方挂着一尊陶瓷的梦丹娜手抱一个粉色婴孩的塑像。当我走过厨房瞟了一眼那炉子时，我突然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她本该忠实于木柴燃料。我们坐在挂有帘子的门廊上眺望着湖水，托着手中的茶杯，在各自的摇椅上来回地摇晃着；他们给我拿来店里使用的垫子，这个垫子上刺绣着尼亚加拉瀑布。那条毛色黑白相间的大牧羊犬躺在我们脚下镶边的地毯上，这条狗，如若这条狗不是那只曾让我甚为害怕的狗的话，就是那条狗下的崽。

保罗太太从上到下浑圆肥胖，她穿着长裙套衫，黑色筒

袜，还围了一条带围沿的印花围裙，保罗穿着带有背带的齐腰裤子，法兰绒衬衣的袖子卷了起来。我对他们感到心烦，因为他们看起来非常象雕刻品；那种在出售旅游手帕的商店所出售的法裔加拿大农民风格的雕刻品；当然罗，情况应该反过来说，是雕刻品看起来象他们。我不知道他们觉得我看起来象什么，他们也许会觉得我的工装裤，我的汗衫和挎在肩上的有饰边的袋子很奇怪，或许有伤风化，尽管这类东西自从旅游业兴起以来，自从有了电视之后，在乡村也已经很普遍的了；除此之外，我也许会被原谅，因为我的家庭的名声不仅是英国式的，而且很怪异。

我拿起茶杯，他们焦虑地注视着我，此刻我该提及一下茶的味道了，"很好！"我想方设法去讨保罗太太的欢心，又说："味道好极了。"我突然感到一种不解：茶可能只是女性饮用的东西吧。

此刻我想起了父亲走访保罗时，母亲不得不走访、坐陪保罗太太的情形。我父亲和保罗总喜欢呆在外面，谈论着关船、汽车、森林火灾，或者他们中的某次探险，而我的母亲和保罗太太总在屋里坐在摇椅里（我妈用绣有尼亚加拉瀑布的坐垫），满怀良好愿望地展开她们的交谈。彼此对对方的语言的掌握不超过五个单词，在相互问好的开场白之后，两人都不自觉地提高嗓音，好象对一个聋子说话。

"天气不错，"我母亲大声地说，不管当时的天气如何，而保罗太太则勉强笑笑，然后说："什么？噢，天气好，是的，天气很好。的确好极了。"当她们无话可说的时候，两人都会死命地找话题，不断地摇晃坐椅。

"你近来可好？"保罗夫人总是尖声喊道，而我母亲辨

清其中的意思后，总说“好，很好。”然后她会重复她的问题：“你好吗，夫人？”但保罗太太总是回答不上来，她们俩依然微笑着，同时透过帘子偷偷地往外看，看他们的男人是否前来使她们摆脱窘境。

与此同时，我父亲总是给保罗一些从他菜园里带来的大白菜或者豇豆荚，而保罗则给父亲一些他菜园里的西红柿或莴苣作为回报，因为他们各自的菜园都有同样的东西，这种交换只不过是一种纯粹的礼仪：这种仪式过后，我们知道彼此的造访便告结束了。

现在，保罗太太一边搅动她的茶盏，一边叹息。她对保罗说了一阵，保罗说：“你母亲，是个好女人哪。我夫人说她的去世真是让人伤心极了，并且她还是那么年轻就去世了。”

“是啊，”我说。母亲和保罗太太是同样的年纪，但谁也不会说保罗夫人年轻；但我母亲从未象保罗夫人那样肥胖。

我去医院看她，她只是在走不动的时候才让人把她送到那儿；那是一位医生告诉我的。她一定把疼痛掩饰了好几周，骗得我父亲相信了那只是一次平常的头痛，那是她的谎言方式。她讨厌医院和医生；她一定担心医生们会把她当做一个试验品，尽其所能地用管子、针头使她活下去，尽管她的病已到了他们所说的晚期，在她脑子中情况就是如此，而实际上他们也着实是这样做的。

他们对她施用了吗啡，她说她眼前象有蜘蛛网在空中晃动。她当时骨瘦如柴，比我想象的要老得多，在她略弯的鼻梁上，皮是紧巴巴的，放在床单上的手就象是抓着木棍的鸟

爪卷曲着。她用明亮而又茫然的眼睛注视着我。她大概没认出我是谁：她没问我为什么走了或上哪儿去了，虽然她根本就不会提这些问题，她总觉得问及个人私事是不礼貌的。

“我不参加你的葬礼，”我说。我必须向她倾过头去，因为她有只耳朵已经失去了听觉。我希望她早些明白，并表示同意。

“我从来不喜欢它们，”她对我一字一顿地说，“你该戴顶帽子。我不喜欢饮酒。”她一定是在谈论有关教堂或鸡尾酒会的事。她抬起手来，十分缓慢，好象是从水中抬起它来，然后摸了摸头；她的头发里有绺白发竖得笔直。“没带寒暑表。外面有雪吗？”

我把鲜花——菊花摆在床头柜上，我看到她的日记本；她每年都记一本。日记中记述的全是当天的天气和当天所做的事：没有感想，没有激情。每当她想比较一下年份、判断春天的迟早，夏天是否潮湿，她都拿它作为参照。它毫无意义地被放在那间无窗的屋子里，我一看到它就恼火；我等她闭上眼睛之后，就把它放进我的背兜里。我走出门来就把笔记翻了个遍，我想里面也许有些关于我的事情，但是除了页面上的日期以外，全是空白的，她几个月前就不再记日记了。

“做那些你认为最值得做的事吧。”她闭着眼睛对我说：“外面有雪吗？”

我们又摇晃了一阵。我想问问保罗有关我父亲的情况，他应谈起他呀，他一定有消息告诉我。也许他在避而不谈呢；莫非他在施展他的圆滑劲，要待我有了思想准备不成？最后我说：“他怎么啦？”

保罗耸了耸肩，“他刚走不久，”他说。“有一天我去看他，门开着，那些船也在那儿，我想他大概去附近的某个地方了，于是我就等了一会儿。第二天，我又去了，一切还是老样子，于是我开始担心起来。他到底在哪儿，我根本就不知道。因此我给你写信，他留下了他的信箱和钥匙，我把那地方锁了起来。他的车在我这里。”他打着手势指向后面的车库。我父亲很信任保罗，他说保罗什么东西都会建造，什么东西都会修理。他俩曾经有一回遇到了为期三周的暴风雨。我父亲说如果你和另一个人在一个潮湿的帐篷里度过三周而没有把对方杀了或被对方所杀，那么他便是个好人。保罗为他的简朴生活的理想进行了辩护，但对保罗来说无政府主义是强加给他的，他从未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

“你在岛上查看过没有？”我说，“要是船还都在那儿，他不可能离开那个岛。”

“我查过了，他的确不在。”保罗说：“我告诉了警察，他们也去寻找了，什么也没找着。你的丈夫也在这儿吗？”他问起了不相干的问题。

“是的，他在这儿。”我说，我自己心里都稍稍觉得那是一个谎话。他的意思是：这事应该由男人去处理；作为替身，乔可以办这件事。我的地位是个问题，他们显然相信我已经结婚了。我是安全的，因为我戴着戒指，我从未抛弃它，对于女房东们来说它是很有用处的。婚礼之后我给我父母寄去了明信片，他们大概对保罗提到过此事；但他们从不知离婚的事情。那不是此时要谈论的话题，没有理由使他们气恼。

我正等待保罗太太询问一下孩子方面的事，我做好了准

备，随时可以应付。我会告诉她我把他留在城里了；那是千真万确的，只是不同的城市而已，他和我的丈夫——前夫生活得很富裕。

但保罗太太并没提及孩子之事。她从身旁的盘子里夹起另一块糖，而此时我丈夫则出现在我的脑际中，那是一个咖啡店，它不座落在城里而是在一条路边，是一次旅游或是偶然相遇。他把广告纸从那块糖上剥下来，把那方块放在杯子里，我还在谈话，而他的话变得很宽容，那一定是有孩子以前的事了。他微笑着，我也微笑着，想起了插在他的棒状三明治一端的一块黄瓜腌菜。在一个超级商场的墙上或在一个停车场中都有一块圆圆的历史徽章，它标明这个场所曾经有一座建筑物，在这个建筑物里曾经发生了一个不太重要的事件，真是荒唐极了。他把手放在我的手上，他试了那么多次，但我很容易就把他的手支开去，并且一次比一次容易。我没有时间来满足他，于是我把话题转到问题上。

我呷了呷茶水，摇晃着摇椅，躺在脚边上的狗也动了动身子，下面的湖的湖水在刚刚吹起的风中卷起了涟漪。我父亲就这么简单地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当我收到保罗的信："你父亲失踪了，谁也找不到他。"——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看起来又是真实的。

在门廊的墙壁上过去挂了一个晴雨表，有一座双门木头房子，房子里居住着一男一女。天气晴朗的时候，那位穿长裙围着围裙的妇女便出现在门口，当天要下雨时她会回到屋里，而那个男人会出来，手里拿一把斧子。当有人向我解释这种情形时，我想与其说他们是顺应了天气还不如说他们控制着天气。我用眼睛搜寻那座房子，我需要某种预见，但它

却不在。

“我想到湖的下游去看看。”我说。

保罗抬起双手，掌心朝外，说道：“我们已经找了二、三回了。”

尽管如此，他们寻找时一定会有些纰漏，说不定等我们到了那里，我父亲已从某个地方返回来了呢，他可能坐在小屋里等我们呢。

第 三 章

在回汽车旅馆的路上，我绕道来到了过去人们可在这里用英语交谈的商店：我们想要点吃的，于是我顺着木梯爬了上去，我在一条杂种狗身旁经过，它毛发蓬乱，打着瞌睡，被一条凉衣绳拴在门廊里。挂着门帘的门上有一个“黑猫牌香烟”的门把手。我打算开门进店去，这时一股味道扑鼻而来，这味道来自包装小甜饼和冷饮，这里曾设一邮局，时间极短。店里挂着一块牌子，上书：“禁止随地吐痰”，牌子上还盖有政府部门的印章。

柜台内有一位和我年纪相仿的妇女坐在那儿，她有一个奶罩形的乳房，嘴上有淡褐色的胡须；头发卷曲，有一个粉色的网罩罩在上面，她穿一条宽松裤子，一件无袖运动衫。那位老牧师一定是去世了，他不赞成人们穿宽肥的裤子。他认为妇女应该穿长长的能遮掩住身体的裙子和黑色的长筒裤，在教堂里得把手臂遮盖起来。穿短裤是违反天条的。因而她们当中许多人即使在湖边活了一辈子也不曾学会游泳，因为她们羞于穿游泳衣。

那位女人盯着我看，挺好奇，但脸上没有一点笑容，而那里的两个男人仍然留着伊利佛斯·普利斯利式的发型，后脑勺就象鸭屁股，涂着头油的高耸发型在他们的前额上卷了出来，他们见我进来便终止了谈话，朝我张望。他们把两肘

搁在柜台上。我犹豫不决：莫非传统发生变化了，莫非他们不再用英语交谈了？

“你有肉糜酒么？”我问她，脸上立刻绯红起来，因为我的口音特别。

她显牙露齿地笑起来，那两个男子也跟着发笑，但他们不是朝着我笑，而是相视而笑。我明白过来，我犯了一个错误，我该装成一个美国人才对。

“汉堡包。我们有的是哪。要多少？”她问道，“*H*”音发得很粗心，以示要是她愿意的话，她也会把这个音发得很正确。

“一磅，不要两磅。”我回答说，脸红得更厉害，因为我那样轻易地就让人识别出来了。他们在开我的玩笑呢，然而我没办法让他们知道我是可以领略他们的嘲笑的。同时我也同意他们。如果你在一个地方生活，你就该懂得当地的语言。但是这儿不是我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呀。

她用一把切肉刀切下一块冻肉。然后把它称了一下。“二斤”，她一边说一边模仿我从学校学来的口音。那两个男人则在那里窃笑。我以回想起那个政府来人来安慰自己。那个时候他是参加一个艺术馆开馆仪式的，那儿展有手工艺品，挂在墙壁上的装饰物，编织的垫子，石器打制的早餐用具；乔当时也想去，那人好象是文化参赞之类的人物，说不定还是个大使。我问他是否知道这国家的这个地方，我的国家，他摇了摇头说，“荒蛮之地，那些地方文明程度并不高。”当时真把我气得够呛。

我从一个喷瓶状的器皿里掏出些粘苍蝇用的胶状物，那是替别人拿的，拿了几个蛋、一些猪肉、面包和奶油，还有

各种各样的听罐。这里的什么东西都比城里的贵；这里的人们已不再饲养母鸡、母牛和生猪了，这些东西全由比这地方更肥沃的地区调来。面包是用蜡纸包装的，切成了一块一块。

我想从后门走出去。我不想让他们从后面瞅我；但我还是强迫自己慢慢地朝前走。

过去这里只有一家商店。它设在一座房子前面，由一位也叫太太的老妇人经营；当时没有一个女人有自己的名字。这位太太出售黄褐色的糖果，很便宜，但我们不许吃这些糖果。她真正的吸引力在于她只有一只手臂。她另外一只手呈象牙状，其末端是粉色的猪嘴状的东西。当她要把系包裹的绳子弄断时，她就把绳子缠在她的拇指下，然后用力一拽。那无手的胳膊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个谜，它象耶稣基督一样令人迷惘。我不知道那只手是怎样掉下去的（也许是她自己把它拿下去的），现在它又在哪儿呢？我尤其想知道我的手是否也会这么断掉呢？但我从未问过这件事，我对答案一定感到害怕。下楼梯时，我努力回忆她身体的其他部分是什么样的，她的脸，但我记起的只有那装在玻璃箱里的具有独特风味的糖果，我们那时候够不着这些糖果，还有那只手臂，它象圣人的脚趾，或者象那些早年的烈士身上被砍下的肢体，放在盘子里的眼睛、割下来的乳房，心脏上面标有字母，象一个灯泡，透过贴在前胸的装饰物孔向外闪光，艺术史。

我发现其他人坐在那小小的标有“酒吧”字样的凉爽的房子里，他们是唯一的主顾。橙色的桌子上放着六瓶啤酒，四个玻璃杯。一个混血男孩与他们坐在一起，他的发式与房间中别的两人的一样，只是头发是淡黄色的。

我走进去的时候，大卫朝我挥了挥手：他正为某事而高兴呢。“喝瓶啤酒吧。”他说，“这是克劳德，他父亲开这个店。”

克劳德略带恼怒地给我拿来一瓶啤酒。在柜台底下，刻着一条有红点和蓝点的木鱼，样子很粗糙。估计刻的是带斑点的鳟鱼一类的鱼；在其跳跃的背上支撑了一块大理石状的翼面。在餐柜上面放着一台电视机，关闭着，也许是坏了，一个卷边的镀金框架里有一幅很平常的肖像，另外还有一幅放大了的照片，照片上有一条河，河的两边是树林，河里水流湍急，上面有一个人在钓鱼。那是一帧仿制品，模仿的是别的地方，南方味更浓些，有南方味的别的那些照片也是仿制品。最初的那幅画上画的是十九世纪的一位英国绅士狩猎的山林小屋，那种陈列着猎物头部、和用鹿角制作的家俱的小屋，维多利亚女王就有这样的一座小屋。既然这种做法是成功的，他们何乐而不为呢？

“克劳德告诉我们今年生意很不景气。”大卫对我说。“理由是附近湖区的鱼都给捕光了。他们准备到别的湖区去。克劳德的父亲用他的飞机运送他们，很不错吧？他说有些人在春天时带着拖网出去，去那儿的人是各种各样的，并且还真有些大家伙呢，他们变得太精明了。”大卫用他那带点乡下佬的口吻说话；他这样说只是取乐而已。对他来说，这种模仿也是拙劣的，五十年代他要去当一位牧师，他就用这种口音挨家挨户地卖《圣经》，以便进入神学院。“喂，女士，要买一本肮脏的书吗？”尽管看上去是无意识的，但他这样做只是为了克劳德，以此证明他也是芸芸众生里的一员。或者说那是一项“通讯系统”里的试验吧，那是他晚间

要说教的内容，乔也在那儿工作，那是一项成人教育计划。大卫把它称做成人植物园；他之所以得到那份工作，是因为他曾经当过一名电台播音员。

“有什么消息吗？”乔问，他的口气松松垮垮，他极愿意用这种口气说话。如果我不作任何反应的话，不管发生什么事他都满不在乎。

“没有，”我说，“没有什么动静。”说话时我的语气平稳，心境平和。也许那正是他当时喜欢上我的地方，当然喽，一定有变化，虽然我已无法重新构勒出我们首次见面时的情形，但现在我还可以大致地构勒出来：当时是在一个商店里头，我正在购买几支画笔，一支固定剂喷雾器。他问我是否就住在附近，于是我们走到街角喝咖啡。当时我给他的印象是冷漠，后来他提到这事时，就是这样说的，他是指我脱衣服和做爱后穿衣的不紧不慢的样子，好像我一点也不激动，实际上我确实不激动。

克劳德拿了一瓶啤酒回到我跟前，我说了声“谢谢”，我抬头看了他一眼，他的脸松弛下来，但立刻又绷紧了。上一回我到这里的时候他只有八岁。他过去经常向那些在政府经营的码头上钓鱼的人兜售锡罐装的蚯蚓。他此刻很不自在，他明白我已认出他来了。

“我想在湖的下游呆上几天，”我对大卫说，因为车是他的。“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到周围看看去。”

“太好了！”大卫说，“我想去钓条漂亮的鱼。”他带来了一杆借的鱼杆，尽管当时我提醒他，他可能没有机会使用它：要是我父亲真的露了面，我们就马上离开，不必让他发现我们到了这儿。如果他安然无恙的话，我就不去见他

了。没有什么意义，他们没有原谅我，他们不理解我们的离婚；我想他们甚至不理解那桩婚事。这也难怪，因为当时连我自己也理解不了为什么要结婚。使他们恼怒的是我处理婚事的方法，那样地唐突，然后，离丈夫孩子而去，接着是那些非常适宜做电影画面的诱惑力极大的彩色杂志插图。扔下孩子可是不容饶恕的罪责；对他们解释，说那不是我的孩子，这样做毫无益处。但我承认我很愚蠢，而愚蠢又无异于罪恶，如果人们根据结果作出判断的话，我没有任何借口，因为我从来就不善于寻找借口。我哥哥很善于找借口，他过去经常在犯事之前就找好借口，那是合乎情理的。

“噢，上帝呀！”安娜说，“大卫以为他是个了不起的白人猎手。”她是在开他的玩笑，她常常这样做；但他没听见，他站起身来，克劳德推他出去，他要给他开一个许可证。克劳德好象是专门负责开许可证的。大卫回来时我想问问他付了多少钱，但他太高兴了，我不想破坏他的兴致。克劳德这时候也高兴得不得了。

从克劳德那儿我们得知我们可以雇用伊文斯。伊文斯是“蓝月小屋”的主人，他可以把我们用船运到湖的下游去。保罗可以免费让我们住到他那儿，这是他主动提出来的。但我觉得那样不妥；并且我相信他一定对乔乱七八糟的胡须，大卫的八字胡和他们的三个火枪手的发型很反感。这些都是如今的时尚，同平头没有两样，但保罗也许会觉得他们很危险，他们意味着暴乱。

大卫在岔道上放慢车速，道中的两条沟和一块石头隆起处把车底部擦了一下。我们的车在一座挂着“办事处”牌子的小屋前面停了下来；伊文斯正在那里，他体形魁梧，说话

精练，是个美国人。他穿了一件格子衬衫和一件后面印有老鹰图案的针织上衣，戴了一顶高顶帽。他知道我父亲的住处。所有的老向导都知道沿湖一带的住户。他把烟屁股往嘴角一挪，告诉我们他会负责把我们带到那地方去。十英里的路程，五美元便足够了。两天后的早晨他再把我们接回来，不过得另付五美元。这样可使我们在白天的其余时间开车回到城里去。他当然对那桩失踪案耳有所闻，但他并未提及。

“一位得心应手的老伙计，是吧？”我们走出来时大卫问道。他觉得很惬意，他想这就是现实：边远地区的经济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这是活灵活现的大萧条时期的摄影作品。他在纽约度过了五年时光，并且从事过政治活动，当时他从事的是某项研究；那还是在六十年代，我肯定不了到底是什么时候。我对朋友们的过去是不太清楚的，我们相互之间也不甚了解，如果我们中的任何一人患了健忘症多年，别的人也可能全然不知。

当大卫把车倒回到“蓝月”码头时，我们把东西都卸下车来。几包衣服，摄影器材，装着我的职业用品的硕大无朋的箱子，他们在汽车旅馆里弄到的半打“红帽子”以及那些纸包食品。我们踉踉跄跄地跳上船，一条磨损的木头船身的游艇；伊文斯起动了发动机，我们便晃悠悠地出发了。夏季小棚屋开始出现了，它们象麻疹一样铺开，那一定是一条铺过的路。

大卫和伊文斯坐在前面。“可以抓到许多种鱼么？”他问，毫不拘束，很是亲密且很巧妙。“到处都是，到处都是。”伊文斯回答说，他可不会免费提供什么的；然后他加足马力，我便什么也听不见了。

我一直等到抵达湖中央。就在这时，象往常一样我猛然抬起头来。我看见了一个村庄，突然变得遥远，但仍很清晰，岸上的房子在往后退去，连成了一片，白色的教堂与黝黑的树反差大极了。我原先期望但没出现的感觉现在又出现了，想家，这是一个我从未居住过的地方，我离家已经够远的了。然后那个村落在慢慢地缩小了，视觉幻觉，我们转过一处陆地，村庄就被抛在身后了。

我们仨坐在船尾，安娜坐在我的身旁。“真好，”她对我说，尖声的叫喊盖过了引擎的鸣响。“离开城市对我们真有好处”；然而就在我转过头去回答她时，我看到她的脸上淌着泪水，我不知这是为什么，她总是那样兴高采烈的呀。后来我明白那不是泪水，而是天下起了毛毛细雨。雨衣装在我们的旅行包里，刚才没注意到乌云的聚集。我们不会被淋透的，乘这条游艇只需半小时就可到达；以前乘坐笨重的船或那些原始发动机牵引的船需要二、三小时，并且还要依风向而定。在城里人们或许会问我母亲“你害怕不害怕呀？一旦发生什么事怎么办呢？”他们当时只考虑去请医生要花多少时间。

我很冷，于是我紧缩双肩；雨点噼哩啪啦打在我的皮肤上。当我们往前行驶时，湖岸线展开又收拢；从这儿往下四十英里的地方还有一个小村子，在这之间只有一条弯弯曲曲的水路，低矮的山丘露出水面逶迤伸展，小小水湾伸进水域，还有形成了岛屿的半岛，向别的湖区伸延的狭长地带。反映在一幅地图上或航海图上的水纹分布就象是一张蜘蛛网，但在船上你只能见到它其中的很小部分，也就是你所在的那一个小小部分。

这个湖让人感到神秘莫测，天气起了变化，很快便起了风；溺死者年年皆有，载重过量或船夫醉酒开船以至高速行驶撞上空船。腐朽的原木漂浮在水面上，它们是放木排时漂流下来的，是他们提高湖水水位时留下的。由于这湖有太多的迂回曲折的水道，人们一旦没有记住航标就容易迷路，我此时正注意着这些航标，房盖状的山丘，顶端伫立着枯死的松树，浅滩处直立的被砍树干的茬儿。我信不过伊文斯。

但到目前为止，他转过的弯道都是正确无误的，我们正进入我家的疆界，再绕两道弯，穿过一条夹在花岗岩岸滩之间的水道，进入一个较为宽敞的水湾，那就是我的家了。这个半岛是我离家出走的地方，它从我家房子所在的那座岛岸上延伸出来，房屋由于树木的遮掩而不露面目，尽管我知道它的位置；伪装是我父亲一贯的伎俩。

伊文斯行船绕过半岛的伸延顶端，然后放慢船速向船坞驶去。船坞已经倾斜，每年冬天的冰都带走它的一部分。水把它冲得歪歪扭扭，并使它腐烂；它曾被修理过那么多次，材料已经同原先的那些不同了，但我的哥哥就是从这个船坞上掉下去溺水的。过去他经常被丢在鸡圈一样的围栏里，那是父亲特意为他建造的，大笼子、小游玩场，里面有树、秋千、岩石、还有沙堆。那栅栏高得他无法爬过去，但那儿有一扇门，有一天他知道了怎样把门打开。我母亲独自一人呆在屋里；她从窗口往外看，结果她发现他不在那笼子里。当时还是白天，没有风声，她听到有什么东西掉进水里。她跑到船坞上，却没见到他在上面，她走到船坞的尽头，往下一看，我哥哥就在下面水里，面朝天空，眼睛睁得老大，没有了知觉，正在慢慢下沉；气泡从他的口中冒出来。

那还是我出生以前的事，但我清楚地记得这件事，仿佛我自己亲眼目睹了这种场面似的。或许我真地看见了这样的场面，我深信未降生人世的婴儿会睁开眼睛，透过母亲的肚皮往外看，就象瓶子里的青蛙。

第 四 章

我们卸下行李，伊文斯让发动机空转着。当大卫向他付钱时，他对我们厌烦地点了点头，然后把游艇倒了回去，接着转过头，绕过半岛的突出部分，发动机的声音渐渐减弱成呜呜声，随着我们之间距离的不断加大而消失了。湖水拍打着湖岸，水面逐渐平缓下来，只留下一层彩虹色的汽油，只留下一层紫色、红色、绿色。空间是平静的，风儿也渐渐小了下来，湖水象镜面一样光滑，呈银白色，这是一天来的第一次（也是好多年来的第一次），我们摆脱了发动机的烦扰。我的耳朵和身体感到刺痛——这是颠簸的恶果。就象是双脚刚从旱冰鞋中抽出来一样。

别的人茫然地站着；似乎在等待我告诉他们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们把东西扛上去吧。"我说，我提醒他们走在船坞上要当心，由于毛毛雨它变得极滑。雨下得小些了，几乎成了一片雾；我还提醒他们有些木板不吃重，很危险。

我想叫喊："嗨！"或"我们来啦！"但我没喊，我不想听到没有回应。

我扛起一个旅行包沿着船坞走着，然后登上陆地，走向那座小屋，踏上那条小径，沿着砌在山坡上的台阶拾级而上。劈开的杉木堆成一垛，由钉在两侧的木桩固定住。那房子建在一个沙丘上，那是冰川时期遗留下来的山岭的一部

分；只有几英寸厚的泥土和一层稀稀落落的树林遮掩着它。湖那边沙地裸露，很荒凉，那里的沙土一直在崩溃，人们第一次在这里支帐篷时用来建炉子的石头和炉子里的木炭早就不见踪影了，而边缘地带的树木渐渐倾倒，我记得有几棵曾是笔直的树现在也倾斜了。那儿的红松，树皮正在脱落，树梢上的松针已弯曲结成了团。一只翠鸟站在其中一棵红松树上，正在那里用它那断断续续象闹钟一样的声音叫着；它们在悬崖上筑巢，在沙土上打洞，这就加速了沙土的流失。

房子的前面，鸡圈似的栅栏依然立在那儿，虽然有一端几乎趴在地上了。他们从未把它毁掉；甚至那副秋千也还在那儿，绳子由于风吹日晒已经磨损，松松垮垮地耷拉着，而且污迹斑斑。他们似乎并不保留不再有用处的东西，或许他们是期待孙儿们的来访。他过去一直希望象保罗那样建立起一个王朝——众多的房屋，成群的后代围绕着他。那栅栏是一种谴责，它指出我的失败。

但我无法把孩子带到这里来，我从未把他当做我自己的孩子；我甚至没象别的母亲那样在他出生前就给他起一个名字。他是我丈夫的孩子，是他把它强加给我的，当它在我的体内生长时，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孵蛋器。他安排我的饮食，他是在我身上哺养它，他想要一个他自己的复制品；孩子生下来了，我便不再有用处了。尽管我无法证明这一点，他是很聪明的，他总说他爱我。

那座房子现在变小了，因为（我意识到）它周围的树木已经长成了。在九个年头里这座房子也变得更加灰白，就象头发一样。杉树原木是竖立的，而不象以前那样横着放。竖着的原木较短，人也容易对付它们。杉木不是最好的木料，

它腐朽得非常快。我父亲曾说："我不是建造一幢永远不朽的小屋。"而当时我想为什么不呢？你为什么不呢？

我多么希望那扇门是敞开的，可是它挂着锁头，正如保罗说的是他给锁上的。我从兜里掏出那把他给我的钥匙，小心翼翼地走上前去。不管我在里面找到什么，那都是线索。要是保罗锁上门后他返回来却进不了门，那么怎么样呢？可是还有别处可进屋的呀。他可以砸碎一扇窗户。

乔和大卫已经带着行李和啤酒来到了跟前，安娜在他们的后面，提着我的箱子和纸袋，她又唱上了"讽刺鸟希尔"这支曲子。

我打开大门和里面的纱门，仔细地察看了一遍房间，然后踏了进去。桌子上铺着蓝色的油布，另一条长凳是由一个木箱做的，紧挨着墙壁。用金属框架做的铺有薄薄一层垫子的沙发展开而成为一张床。那是我母亲经常躺的地方；她整天都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盖着一床褐色的编织毯子，她的脸无一点血色，紧缩着。我们常常小声说话，她看上去是那样异常，如果我们对她说话，她会听不见；而第二天她又会象往常一样。

当时我们相信她能摆脱疾病——不管是什么疾病——而恢复健康；我们不再把她的疾病当作一回事，就象蚕茧一样，那些疾病是自然而然的，而当她去世的时候，我们对她充满了失望。

一切都是有条不紊。水滴从树上掉落到屋顶上。

他们跟我进了屋子。"这就是你过去住的地方吗？"乔问道。他询问有关我个人的问题，这很不寻常；我说不清他是高兴呢，还是失望。他走向墙上挂着的雪地鞋，把其中的

一只拿下来，握在手里掩饰他自己的心境。

安娜把杂货放在台子上，双手抱着自己的身体。"这一定是不可思议的，"她说，"就这样中断了联系。"

"不，"我说。对我而言，那是正常的。

"按你们的习惯而言，"大卫说，"我想那是很规整的呀！"但他并不敢肯定。

还有两个别的房间，我迅速地打开那两个房门。每个房间里各有一张床，橱架，衣服都挂在衣钩上；夹克衫、雨衣，它们总是放在那地方的。还有一顶灰白色的帽子，他实际上有好几顶这样的帽子。右手的房间有一张当地地区图，钉在墙上。另一间房里有几幅画：水彩画，我现在想起来了，那是我十二、三岁时画的；唯一使我感到不安的就是我竟然把它们给忘了。

我走回起居室。大卫已把旅行包放到地板上了，并且四肢张开躺在沙发上。"上帝呀，我不是被用来擦沙发了吗？"他说，"哪位给我打开一瓶啤酒。"安娜拿给他一瓶，他在她的后背上拍了拍，并说："这就是我所需要的服务。"她给她自己和我取出罐头，我们坐在长凳上喝了起来。因为我们不再走动，这房子倒显得有点冷。

就是这味儿，它来自杉木，火炉和沥青，来自填塞在木头之间的用来驱赶耗子的麻絮，我看了看天花板和框架；在灯旁有一摞纸，或许就在事情发生之前——即在他离去之前，他还在上面写什么呢。也许上面给我写了些东西，纸条，信或遗嘱。我母亲死后，我一直期待得到一些那类东西。不是钱而是一件东西，一件礼物。有一段时间我一天两次地去我曾经给过他们地址的信箱去取信，但什么也没来，

恐怕她去世得太仓促了。

没有脏碟子，也没有乱扔乱抛的衣物，没有任何迹象。这房子不象是整个冬天一直有人住。

“几点钟了？”我问大卫道。他抬起手表，差不多是五点了。我得去准备晚饭了，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我是这里的主人，他们是我的客人。

炉子后面的箱子里有点火物，还有几块白桦木柴；那种树病没有袭击这个地区。我找到了火柴，在炉子面前跪下来，我差不多忘了怎样做这等事了，点了三、四根火柴后我把炉火点着了。

我从挂钩上取下搪瓷圆碗和一把大刀。他们看着我，谁也不问我上哪儿去，虽然乔似乎有些担心。或许他一直期待着会有一些歇斯底里的发作，他很焦虑，因为我一点也没有这个迹象。“我到园子里去。”我说这话让他们放下心来。他们知道园子在那儿，乘船来这儿的时候，他们可能已经看到了。

小径上和园门前长满了杂草；野草已有一个月没整理了。通常我会花几小时拔这些野草，但现在不太值得，因为我们过两天就得离开这里。

青蛙在我的脚边跳来蹦去，它们都喜欢这个地方。园子离湖水很近，地面潮湿，我的帆布鞋都湿透了。我摘了些莴苣叶子，它们还没有开花，还有苦味，接着我拔了一棵洋葱，把松散在外面的黄皮去掉，雪白，象一粒眼球似的。

这个园子被重新整理过，以前有些红花菜豆缠在一边的篱笆上。它们的花比别的园子里任何东西都红，蜂鸟飞向它们，在它们上面盘旋，翅膀快速扇动，使人看不清其形

状。豆子总是在第一次霜打之后变黄并裂开。里面是水晶状的东西，呈紫黑色，怪吓人的。当初我的想法是，要是我能摘取一些，并为自己而保留它们，那么我会非常有力气的；后来当我的个头足以够得着摘取这些豆的时候，我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同样，我想，我当时一旦摘到了它我也不知道我的那份力气会用来做什么；要是我也象别人那样有力气的话，我就会成了一个坏东西了。

我来到胡萝卜畦地上拔了一棵胡萝卜，但它们尚未变细，它分岔，并且又粗又短。我把洋葱叶子摘掉，把胡萝卜头削去，把这些东西一同扔到肥料堆上，然后把洋葱和胡萝卜放进碗里，返回园子门口，在我的脑子里闪烁着越来越多的过去的光景。六月里旬的时候他肯定在这里，他在这里不可能比那个时间更长些。

安娜在篱笆外面，她是来找我的。“厕所在哪儿啊？我的肚子都快胀破了。”

我把她领到那条小径的入口处，并向她指明了去处。

“你没事吧？”她问道。

“当然啦。”我说，那问题使我感到吃惊。

“很遗憾他不在这里，”她很悲切地说，用她那双圆圆的绿眼睛注视着我，彷佛这是她的忧伤，是她的灾难似的。

“没关系。”我告诉她，以示对她的安慰。“径直朝前走，便会找到厕所的，尽管远了点。”我笑着说，“不要迷路了。”

我走到船坞上，在湖里把这些菜洗干净。我脚下的水里有一条水蛭，那种背上有红点的良种水蛭，象一艘一头被缚住并被摇晃的汽船一样扭动着。不是良种的水蛭呈灰白色或

黄色。这些合乎情理的区分是我哥哥做出来的，在某种程度上他对它们简直着了迷，他一定在它们打架时把它们抓起来的。什么东西都分好的和坏的。

我做了汉堡包，大家吃完，我在有缺口的洗碗盘里把碟子都洗干净，安娜把它们揩干，这时天已快黑。我把床垫从墙上拉出来，铺就一张床，安娜可以铺他们的床。他一定在大厅里的沙发上睡着了。

天一黑就上床睡觉他们是不习惯的，我也一样。我恐怕他们会感到厌烦，因为这里没有电视机，或其他可供观看的东西，我开始寻找娱乐物品。我找到了一副娱乐骨牌、一副扑克牌，这些东西都在折叠着的毯子下面放着的。卧室的搁架上有许多简装书，大部分是侦探小说，娱乐性读物。它们旁边是关于树木的技术书刊，以及其他参考书，如《可供食用的植物和嫩芽》、《缚住枯干的苍蝇》、《常见的蘑菇》、《木屋建筑方法》、《鸟类指南》、《照相机探密》，他相信适当的指导性书本，能使人干所有的事情；他的正经藏书是：《圣经钦定本》，他说他只由于它的文学价值而喜欢它的，《彭斯全集》、伯斯威尔的《生活》、汤姆逊的《四季》，还有歌尔史密斯和考柏的选集。他很羡慕他所称的十八世纪的理性主义作家，他把他们看成是避开了“工业革命”带来的腐败的人们，他们懂得极富于价值的中庸和平衡生活的秘诀，他断定他们都履行有机的农业生产。过了很长时间我才非常吃惊地发现这样的事实；实际上我的丈夫对我说的那个彭斯是个酒鬼，考柏是个疯子，约翰逊博士是个狂躁低沉的人，而歌尔史密斯是个穷光蛋，而汤姆逊也有点不对劲；逃避现实的人，这是他用的措词。从那以后，我就更

喜欢这些人了，因为他们不再是完人。

“我点上灯吧，”我说，“我们可以读些东西。”

但大卫说，“不、不、不，在城里可以读书，何必在这里读呢？”他在捻弄着他的晶体管收音机上的按钮，他什么也收不到，收来的只是静电的嗡嗡声和一种尖叫声，这些声响可能是音乐，一会儿出现，一会儿消失，传来了象小虫子的声音那么大的法语。“他妈的。”他说：“我希望能收到比赛的广播。”他指的是棒球比赛，他是个球迷。

“我们可以打桥牌。”我说，但谁也不想打。

过了一会儿大卫说，“好啦，孩子们，是出去踏青的时候啦。”他说着打开他的旅行袋，在里面摸了起来。安娜说，“这也不是放东西的地方呀。他们首先会看到它的。”

“放到你的屁股上，”大卫边说边朝她微笑。“那才是他们首先要看的地方，当他们看见一件好东西时，他们会拿它的。用不着担心，亲爱的，我知道我在干什么。”

“有时候真闹不懂。”安娜说。

我们大家走出来，下到船坞上，在潮湿的木板上坐下来，观看落日，抽了一会烟。西边的云彩呈黄色和灰白色，正渐渐地消褪，月亮正从我们东南面的晴朗天空上徐徐升起。

“太美了，”大卫说，“这比城里要好得多呀。要是我们能把法西斯式的蠢猪美国佬和资本家们赶出去，这将会是个非常美好的国家。但那时，还有谁留下来了？”

“噢，上帝呀。”安娜说，“别说那种话了。”

“怎么做呀？”我问道，“你怎样把他们赶出去呢？”

“把河狸组织起来。”大卫说，“把他们嚼成碎片，这

是唯一的方法。这个美国股票经纪人正沿贝亚大街行走，河狸埋伏在他的身后，它们从一根电话线杆跳到他的身上，嚼啊，嚼啊，一会儿就完了。你听说关于最新的国旗的事了吗？九只河狸往一只青蛙身上撒尿。”

那是老式而且效果差的笑话，但我还是笑了。一点啤酒，一个小锅，开开玩笑，略谈政治，还有那有价值的中庸之道；我们是新的资产阶级了，这也是一个娱乐室了。我还由于他们和我在一起而高兴，我不想一个人在这个地方；失落空虚随时都可能向我突然袭击，而他们则帮我避开了这些。

“你意识到没有，”大卫说，“这个国家是建立在死亡动物的尸体上吗？死鱼，死海豹，从历史上讲是死河狸，河狸对这个国家就象黑人对美国一样。不仅如此，在纽约‘河狸’是个肮脏的词。我想这极富有意义。”他站了起来。透过朦胧的夜色注视着我。

“我们不是你的学员。”安娜说，“躺下吧。”他头枕着她的大腿，她抚摸着他的前额，我能看见她的手来回移动着。他们结婚九年了，安娜告诉我，他们一定和我是同时结婚的；但她比我年纪大。他们肯定有某种特殊的方法——那公式化的东西，某种我没掌握的知识；或者他是个错误的人选。我当时想，即使我什么也不做，这事照样发生，我会成为夫妻中的一员，两个人连在一起，象保罗家里的晴雨表上那一对木头男人和木头女人一样保持彼此平衡。起初他对我很好，但我嫁给他，他娶了我之后，他变心了，得为那张纸承担义务。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在那张纸上签名就会使生活发生变化，但他开始期待这、期待那了，他要取悦，我们必

须在一起睡觉，并且必须坚持下去。

乔用一只手搂着我，我抓住他的手指。展现在我眼前的是过去常在湖上漂浮的黑白相间的拖船或者是象一艘平坦的驳船一样的船，它拖着木排慢慢地来到水坝边，每当我们乘船经过的时候我都会向它招手，而船上的人们也招手回敬我们。驳船上有一座小房子，这些人可以住在里面，屋子上有窗户，还有一个烟管从屋子顶端伸出来。我当时感到那种方式是生活中最好不过的了——在漂浮着的船上，带着你所需要的一切，还有一些你所喜欢的人们；你要是想到别的地方，那是再容易不过了。

乔来回摇晃着，这也许意味着他很舒坦。又起风了，它吹拂着我们，空气又热又凉，并且流动，我们身后树上的叶子在婆娑作响，荡起声音的涟漪；湖水散发出冷冰的光亮，象是镀了锌似的月亮在细浪上被晃碎了。潜鸟的叫唤使我身上的每一根毫毛都倒竖起来；回应声此起彼伏，把我们包围起来，这里的一切都处在一呼百应之中 。

第 五 章

鸟叫声把我吵醒了，那是黎明前时分，城里交通这时候还没有繁忙拥挤起来，但我已学会用睡眠来度过这段时光。过去我能够辨别各种鸟类；我侧耳倾听，可是我的耳朵已经不灵敏了，听到的只是吱吱喳喳的声音。鸟的鸣叫与汽车按喇叭有同样的理由，都是为了让别人给它们腾出地盘，这是一种最基本的语言。我应该研究的是语言学，而不是艺术。

乔还在半睡半醒之中，正在打呼噜，床单就像是僧侣的头巾似的裹在他的头上。他把整床毯子扯到上身，瘦削的脚露在外面，脚趾的形状活象在口袋里生了芽的土豆，我不知道他记不记得天还没亮时他弄醒了我。他坐起来问我："这是什么地方？"我们每次到一个新地方他总是问这样的问题。"没关系，"我说，"我在这儿哪。"但他仍旧说："你是谁？你是谁呀？"象猫头鹰似地叨念着。他允许我安慰并扶他躺下。这种时刻我害怕去触摸他，他或许会把我当成他恶梦中的敌人；但他开始逐渐信任我的声音了。

我看了看他脸部裸露的地方，我看见他的眼睑和鼻子的一侧，他的皮肤苍白，象是一直生活在地窖里似的，不过我们的确一直在那样的地方生活着；他的胡须是深褐色的，近乎于黑色，胡须一直长到脖颈周围，和床单底下后背上的毛发连在一起。他后背上的毛比大部分男人的浓重，一块暖绒

绒的织物，象玩具熊的毛皮，但当我对他谈起这事的时候，他好象把这看成是对他人格的一种污辱。

我正努力作出决定该不该爱他。这当然不碍什么事，但对于他们而言，好奇心总是让他们无法宁静。他们总想问起这件事，虽然他们还没问过此事。事先找出答案来是最好不过的：不管你是回避还是讲出实情，至少你不会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受窘。我给他作了总结，把他归入好几种类型；他多愁善感，但不让人讨厌。我们平摊租金，他对此并未牢骚满腹，这就是他的优点。当他建议我们该住在一起时，我也没有犹豫。与其说那是一个真正的决定，还不如说象是买一条金鱼或者买一种盆景用的仙人掌植物，不是因为你事先需要一件，而是你恰好在商店里面，并且你看到它们正摆放在柜台上。我喜欢他，我极愿意他伴在我的左右；如果他对我来说远不只这些的话，那就更好了。有这么个事实，他不会让我伤心，自从我丈夫死后，还没有别人使我伤心过呢。离婚象是截断肢体那样，你活下来了，但你已比原先少了点什么。

我睁着眼躺了一会儿。这儿曾经是我的房间；安娜和大卫睡在有地图的那个房间里。我这个房间有几幅画。女士们穿着奇异的服装，香肠一样的卷发横过她们的前额，鼓着红红的嘴唇，睫毛就象牙刷上的毛一样，我十岁的时候相信魔力，那是一种宗教，那些人则是我的圣像。她们的手臂和腿强装出流行的姿势，一只带手套的手放在臀部，一只脚伸在前面。她们穿着帕迪尼亚猪蹄状的鞋子，有直立的高跟，她们的服饰有象利德·海维斯威的罗马甜瓜状的无带帽子，芭蕾舞女演员穿的裙子，上面点缀着代表装饰物的黑斑点。我

当时画得并不好，比例欠妥，脖子太短，而肩膀又太宽。我一定在模仿他们城里人用纸做的玩具，卡纸电影明星，珍尼·波维尔，艾绪尔·威廉斯，她们身上印着两件式游泳装，还有一个剪下的衣橱，里面放着全套衣服和有饰边的女人长睡衣。穿着灰短上衣和白罩衫的小女孩，她们用几个粉色的塑料条状发夹将头发拢住，她们将它们带到学校去，休息时炫耀它们。我把这些画钉在破损的墙壁上，她们脚踩在雪地里，纸糊的服装抵御不住刺骨的寒风，我这是为她们的跳舞晚会、庆祝活动和不断变化的衣装款式而发明的，享乐的奴隶。

画像下面床脚边有一件灰白色的皮夹克挂在衣钩上。它很脏，并且上面的皮革已经开裂、脱落。我看了好一会才认出它来！很早以前它是我母亲的，她把衣兜用来装葵花籽。我当时认为她早已把它扔了；它不应该还在那个地方，他该在葬礼之后把它扔掉。死者的衣物应该随它们一起葬掉。

我转过身来，又推了乔一把，把他推到靠墙的地方，这样我可以蜷曲起我的身子来。过了一会儿，我又露出头来；乔已完全醒了，他从床单底下钻出来。“你睡觉时又说胡话了。”我对他说。有时候我认为他在睡梦中说的话比不睡觉时说的还要多。

他十分含糊地叫了一声。“我饿了。”停了一会儿，他问：“我说什么了？”

“还不是跟平常一样。你想知道你在哪儿，我是谁。”我喜欢听听关于梦的内容；我过去常常做梦，可现在不再做了。

“真烦人。”他说，“就这些吗？”

我把被子一掀，双脚着地，地上让人难受得很；即使仲夏时节这地方的夜晚仍然很冷。我尽快穿好衣服，走出去生火。安娜已经在那里了，她仍旧穿着无袖尼龙睡衣，光着脚，站在那面有波纹的发黄的镜子前。她前面的台子上放着一个带拉索的盒子，她正在化妆。我意识到我从未见她不化妆；由于脸上没有胭红和加深的眼圈，她的脸令人吃惊地难看，一张破损的布娃娃的脸，她的假脸是自然的脸。她的手背已长出了鹅肉丘疹。

"你在这地方用不着化妆，"我说，"没有人会看你的。"我母亲说过的话。那是对十四岁的我说的话；她当时注视着我，样子很不快；我正往嘴唇上涂抹口红。我告诉她我只是练习练习而已。

安娜低声说，"他不愿意看我不化妆。"然后又自相矛盾地说："他不知道我脸上化着妆。"我微微感到这一定是个托词，或者说那是一种忠诚：每天早晨在他醒来之前她都得蹑手蹑脚地溜下床来，而在晚上则熄灯后才上床睡觉。也许大卫在吹大牛呢；但她的化妆技术高超，色调弄得那样柔和，他或许真地没注意到呢。

炉子加热时我出去了一会，首先我去了厕所，接着又到船坞去洗手洗脸，然后打开冰箱，一个埋在地下的金属垃圾桶，上面是个防浣熊的严丝合缝的盖子，再上面是一个沉甸甸的木头盖子。每当渔猎监督官乘警艇而来时，他们每年来一次，他们从来不相信我们没有冰箱，他们常常到处搜查隐藏的非法猎获的鱼。

我蹲下来取蛋，猪肉在小屋下面有沙窗盖着的盒子里，通风良好，还能防止苍蝇和老鼠。在一个移居者家里这些地

方会被当作蔬菜窖，或鱼肉熏制厂。我父亲在一般的主题上是个即兴诗人。

我把食品端了进去，开始做早饭。乔和大卫都已起来，乔坐在靠墙的长凳上，看起来似醒非醒的样子。大卫已在镜子里审视着他的下颌。

“我可以替你烧热水，如果你想要刮胡须的话，”我建议说，但镜子里面的他笑了笑，摇了摇头。

“不，不，不，”他说，“我准备把我的胡须蓄得长些。”

“你敢吗？”安娜说，“他蓄起胡须后，我可不喜欢他来吻我。他使我联想起阴部。”她马上用手捂住了嘴，好象大吃了一惊。“太恶心人了，是吧？”

“我的妻子，说得真下流。”大卫说，“她没有教养，太粗俗了。”

“噢，我知道，我也总是这样的。”

那是一场短暂的滑稽戏，乔和我是仅有的听众，但乔还是沉湎于他大多数时间置身期间的那种心不在焉的状态之中，而我则在炉子旁翻转猪肉，我不看他们俩，于是他们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我在炉子前蹲了下去，打开燃烧室的门，好让面包放在煤火上。不再听得见脏言秽语了。它们被阉割了，现在它们只是谈话的一部分了；但我在回味着那种感觉，当我发现有些话不堪入耳，有的话则说得很文明时，一种迷惑不解，莫名其妙的感觉会向我袭来。就法语而言，不堪入耳的话语是宗教性的语言，在任何语言中，最不堪入耳的话语是人们最害怕的东西，在英语方面那是指身体，那甚至比上帝还可

怕。你也可以说“耶稣·基督”，但那意味着你很生气或者感到恶心。我学习有关宗教的知识如同大部分孩子当时学习有关性的知识一样，不是在贫民区学会而是在以砂砾混凝土铺就的学校院子里，那是在真正的学校的冬季学期之间。那时他们总是聚成一群，戴着连指手套的手握在一起，小声地说着。他们告诉我天上有一个死人在注视着我所做的一切，他们以这种方式来吓唬我，而我则通过说明婴孩来自何处来进行回报。有些孩子的母亲打电话向我母亲抱怨，尽管我认为我当时要比他们更感恼火：他们不相信我，我却相信他们。

我烤好了面包；猪肉也煮熟了，我把它盛在盘中，把油倒在火堆上，尽量使自己的手远离火焰猛烈升起的地方。

吃过早饭后，大卫说：“有什么日程安排没有？”我告诉他们我想去找湖岸边一条约摸半英里长的小径；我父亲可能沿那条道去砍柴了。还有另一条折回来的小径，它几乎和那片沼泽地一样远，但那是我哥哥的地方，并且是秘密的，到现在为止，它仍然难以辨认。

他不可能离开了这个岛，两条独木舟都在工具棚里，铝合金造的摩托艇仍旧扣锁在船坞附近的一棵树上；发动机油箱是空的。

“不管怎样，”我说，“他可能去的只有两个地方：在岛上或在湖里。”我的头脑则在反驳自己；有人可能把他接走，把他带到湖的另一岸的村庄，那才是离开这地方的最好方式；也许他整个冬天压根儿就不在这里。

但这又被排除了。一个人在林子里失踪是正常的，这种事一年可发生好几次。所有发生的情况都是由于小小的疏

忽。在冬天走到离家太远的地方去了，暴风雪来得太突然，或者把脚给扭了，无法走出那林地，春天里黑头苍蝇可以要你的命、爬进你的衣服里面，一天之内可把你弄得满身是血或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尽管我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他知道得实在太多了，他也非常小心谨慎。

我把大砍刀给了大卫，我不知道那条小径会是什么个样子，我们很可能不得不砍出一条道来；乔拿起那把短柄小斧子。在我们出发前，我在他们的手腕和脚踝上涂了一层防虫剂，也给我自己涂上了一层。我过去曾经不怕蚊子咬，我被咬的次数太多了，但现在我丧失了这样的免疫力：我腿上和身体上留着昨晚被咬的几处发痒的红肿块。北方的爱的声音、亲吻、击打。

天上浓云密布，乌云低垂；东南边吹来了一阵微风，天可能会下雨，也可能淋不着我们。这里的雨象油那样不会下得太大。我们穿过园子和湖之间夹杂着野悬钩子新枝的齐肩高的草丛进入小径，经过柴堆和肥料堆。我应该把那肥料堆掀开，看看它到底堆了多久了；那里有一个坑，烧过的锡罐被砸扁埋上了。这个小坑可以被挖开。我父亲很重视考古问题。

我们来到森林里的小径上；小径的开端处很宽阔，虽然我们不时地经过大树墩，有的平整，有的用锯锯的，在这个地区被从森林中开辟出来之前，这些树木的残骸就已有了。树木再也不可能长得象先前那么高了，它们刚刚长成就被砍下，大树就象鲸鱼那样所剩无几了。

森林开始浓密起来。我在寻找那堆火焰，十四年之后它仍然清晰可见；人们在树上砍过的伤口周围已长出了鼓起的

伤疤组织。

我们开始爬山，我脑海中又出现了我丈夫的影子，短暂的露面，他所精通的框形记忆：被一面空白的墙所围起的水晶一样透明的映像。他在栅栏上刻写他名字的首字母，优雅卷曲的笔法告诉我怎样去写，写字母是他教授的一个内容。栅栏上还有别的大写字母，但他把自己的刻写得大些，留下他的印记。我分辨不清日期和地点了，那是一座城市，是我们结婚以前的事了；我斜靠在他身上，欣赏着他那冬日阳光照耀下的颧骨和雕像一样的鼻子，那样高贵，倾斜得恰到好处，就象罗马钱币上的侧面像；那是他所做的一切都好到无以复加的时期。他手上拿了一只皮手套。他说他爱我，那是极富魅力的字眼，人们认为那足以使一切都大放异彩，我现在再也不会相信那个字眼了。

由于他而产生的痛苦让我感到惊讶不已：我当时是作为被告一方而为人所知的，是出走的人，而他并未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他需要一个孩子，那是正常的，他需要我们俩结婚。

早晨我们洗碟子时，我决定问问安娜，她正擦干一个盘子，哼着《大冰糖山》这支歌的片断，“你怎么处理这桩事？”我问她。

她停住了哼哼唧唧，“处理什么事啊？”

“结婚，你是怎么把两个人拴在一起的呀？”

她迅速地瞟了我一眼，好象疑心重重。“我们说了许多的笑话。”

“不全然是吧。”我说，要是有一个秘诀我就要把它学到手。

她对我说着，或者她不完全是对我说的，而是对着挂在她头上的一个隐形麦克风说着；人们要提忠告的时候，他们的声音就通过无线电传播出来。她说你只要作出一种感情的承诺就行了，这与滑雪差不多，你无法事先预料会发生什么事情。但你还得任其发展，顺其自然。任其发展什么，我想问问她；我用她说的话来衡量我自己。那也许就是我失败的原因，因为我不知道让什么任其发展。对于我来说，那不象滑雪倒象是跳崖。那便是我结婚以来一直所有的感觉；悬在空中，往下坠落，等待着在谷底摔得粉身碎骨。

安娜问道："你怎么就没有明白过来呢？"

"我不知道。"我说，"我想我太年轻了。"

她不无同情地点了点头说："你还是幸运的，你没有孩子。"

"是啊，"我说。她自己不是也没孩子嘛；要是她有了孩子的话，她就不至于对我说这番话了。我从未告诉过她有关我那孩子的情况；我也没告诉乔，没有理由这样做。在平常的情况下，他发现不了任何蛛丝马迹，因为在我办公室抽屉里或在我的钱夹里没有一张诸如孩子从有栏杆的小床上，或从窗户上，或从供孩子玩的携带式围栏里探出脑袋来之类的照片，于是他无法从中揣摸出我有孩子，因此他也就不可能有所震惊、痛恨或悲伤了。我必须做出它根本不存在的样子，因为对我来说它不可能存在，它被人从我身边夺走，被带走，被放逐。那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它就象一个连体双胞胎那样被人从我身上撕扯下去，我自己的肉便消失了，消失，再度消失，我必须忘却。

这条小径现在开始弯弯曲曲穿过高地，高地上有些圆圆

的石子从土里冒出来，它们是冰川时期从别处带来留在这里的，上面长着青苔和蕨类植物，这地方气候湿润。我双眼注视着地面，我的脑海里又涌现出那些植物名称来：冬青、薄荷、印第安黄瓜；我曾一度可以列出这地方可被利用或吃的植物名称来。我记得至今尚存的几本手册：《怎样在灌木丛里求生存》、《动物的行踪》、《冬天里的森林》，那时，与我同年龄的城里人正在读《真正的罗曼史》杂志；直到那时我尚未意识到实际上这可能使你迷失方向。谚语在脑海中浮现出来：随时带上火柴，你就不会挨饿，暴风雪中挖个洞穴，千万避开未被认识的蘑菇种类，你的手脚是头等重要的，它们一旦被冻僵了，你便一命呜呼了。无聊的知识；满是那些告诫性的故事的低级刊物，屈膝于他人生出蒙古人种孩子而受罚的妇女，骨折了的脊椎，母亲或男人尸体被他们最要好朋友盗走，这样的杂志也比我刚才提的那些书更为实用。

那小径往下伸展，在一个小水湾的尽头通过一个沼泽地入口。我慢慢地走着，寻找着足印。除了一只鹿的足印以外，没有人的足迹：显然保罗和那些搜寻人员没有来到这么远的地方。蚊子闻到了我们的气味，便蜂拥盘旋在我们头顶；乔轻轻地咒骂，大卫则大声喊叫，我听见安娜在拍打蚊虫。

我们绕开了湖岸，来到了一片森林，树枝横过小径，榛木，枫树和多髓的大块树木。两英尺之外便什么也看不见了，树干和树叶构成了一道坚固而交织着的栅栏，呈绿颜色，绿灰色和绿黄色。没有任何树枝被砍或折过，如果他在这地方，除非他奇迹般地四处转悠，或夹在中间，而方不能

穿过这地方。我站在一边，大卫用手里的大砍刀砍穿那道树墙，他砍得并不熟练；他不是去砍断而是去扯碎，弄弯它们。

我们撞上了一棵横倒在小径上的树。它把几株幼小的凤仙花树一同扯了下来，它们缠绕着倒在一块，木头堵塞了去路。“我想没人在此经过。”我说。乔说：“只往前走吧。”他感到厌烦了：这是很显然的。我往森林深处张望，想看看倒下的树木周围是否辟出了另一条路径，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一点；或者说这样的迹象太多了，因为我太焦急了，每两棵树之间的空缺看起来都象是一条小径。

大卫用大砍刀戳着一根树干，在树皮上挖坑。乔则坐在地上，气喘吁吁，太城市化了，那些苍蝇一个劲地往他那儿扑去，他搔着他的脖颈和手背。“我想就这样了吧。”我说，因为我必须是那个承认失败的人，安娜说，“上帝啊，它们快把我活活地吃了。”

我开始往回走。他仍可能就在这地方的某处，但我知道为他而搜遍全岛是不可能的，长两英里哪。至少需要二、三十人拉开一定的距离，一线铺开，在森林里向前推进，即使这样也可能错过他所在的位置，死了还是活着，事故还是自杀或他杀。或者如果由于某种难以揣测的原因，他有意失踪或者隐藏起来，人们永远也别想找出他来；在这样的野地里，最容易的事莫过于让搜寻你的人走在前头，然后保持一定的距离跟上。他们停你也停，置他们于视线之内，这样无论他们转向哪个方向，你都会一直在他们背后的。如果是我，我也会这样做。

我们走在绿色之中，双脚陷进潮湿而腐烂的树叶中间。

那条小径在我们回返时仿佛变了样：这时我走在最后面。每走几步路我都朝路的两边看，双眼圆睁，生怕错过了地上的任何蛛丝马迹，寻找所有人的痕迹：纽扣，弹药筒，或被抛下的碎纸片。

第六章

谁也不能从我那里得到任何信息，我已检查过所有东西了，我尽了努力；现在我已从了解情况中开脱出来。我应该告诉某位官员，我该填填表，就象你想象的那样，在紧急中求得援助。但这就象是寻找一颗失落在沙滩或者雪地之中的戒指一样，徒劳无益。除了等待，我什么也做不了，明天伊文斯要把我们用船运回村里去，然后我们返回城市，返回到现时。我已完成了此行的目的，我不想在这地方呆下去，我要返回到有电、有消遣场所的地方去。我已习惯于那样的生活了，没有那些东西的生活真是难熬。

别的人则尽量让自己玩得痛快。乔和大卫乘坐一条独木舟出去了，我应该强迫他们穿上救生衣，他们俩都不会驾驶独木舟，他们正用桨来回地划，我可以从前窗看见他们，从侧窗我看到安娜，她有点被树挡住了。她正面朝下躺着，身上穿的是比基尼游泳衣，戴了一副太阳镜，正阅读一本凶杀迷案小说；她身上一定不暖和；天空稍有点晴朗，但云彩飘到太阳前时，热量则被挡掉了。

除了比基尼泳装和她头发的颜色外，她倒象十六岁时的我，躺在船坞上生闷气，气的是离开了城市，离开了男朋友，我以得到他而证实了自己是正常人；我当时戴着他的戒指，但太大了，我的手指没有一个适合戴它的，我把它穿在

一根项链里带在脖子上，象一个十字架或一枚军功章。乔和大卫此时已划远了，距离伪装掩饰了他们的脸和他们的笨拙，他们可能是我的哥哥和父亲。给我留下的唯一的地方就是我母亲的住处；我有一个问题，除了日常家务，即午饭和晚饭之外，她每天下午都做些什么呢？有时候她会把面包屑或种子之类的东西从屋里拿到外面的喂鸟盘子上，等待樫鸟的到来，静静地站在那儿就象一株树似的，有时她在园子里拔草；但有些天压根就见不到她的人影，她独自一人走进森林去。象我母亲那样是不可能的，变得乖戾需要时间；她不是落后别人一万年，就是先于他们五十年。

我在镜子前梳了一下头发打发时光；然后我回到我的工作上去，我的期限，那个我突然发现我拥有的职业，我本不想但又不得不找点我能变卖的东西。我仍然对它不甚精通；我不知道穿些什么样的衣服去参加会见；对我而言，它是一个桎梏，就象一个水中呼吸器或者多余的假肢。但我有一个头衔，一个级别，这能帮我的忙，我是他们称为商业艺术家的人，或者当这职业更加堂而皇之的时候，他们把我称为插图画家。我画招贴画，搞封面设计，还做点广告和杂志上的工作，偶尔也搞搞象这本书这样受人之托的插图设计。曾经有一度时期，我差一点真的成了名符其实的艺术家；他觉得那是很美的差事，不过会误入歧途，他说我应该学些我能够用得上的东西，因为还没有过什么重要的女艺术家的先例。那番话是在我们结婚之前说的，那时我还愿意听他的劝告，因此我就去了设计院，搞起了花布图案的设计。他说的确实没错，还不曾有过重要的女艺术家。

这是我搞的第五本书；第一本叫《劳工部》的雇佣手

册，年轻人脸上带着迟钝的微笑，他们由于自己虚报了职位而狂喜；《计算机程序》、《行政秘书》，《焊接工》、《实验室技术员》。外形设计和几张图表。还有几本儿童书，现在的这本《魁北克的乡间故事》是一个译本。这不是我搞的领域，但我需要钱。这本打字稿已交给我三周了，我仍没有提出最终的插图，一般情况下我比这干得快。

这些故事并不是我所期待的；它们就象德国的童话，只是没有通红通红的铁拖鞋和用大头钉钉成的木桶之类的东西。这种慈悲是来自最初的那些故事叙述人，来自译者或是出版者，我不得而知；或许这是出版者帕西沃尔先生的意图吧，他是个谨小慎微的人，他把他称之为"搅乱人心"的东西统统都删除掉。我们曾经就此事争吵过一番：他说其中的一幅画太吓人了，我却说孩子们都喜欢被吓。他说："不是孩子们自己买书，而是他们的父母。"于是我作了让步；现在我让步在前，接受工作在后，免得浪费时间。我学会了他所需求的一切：优美并具有风格，有着装饰性的色调，象油酥面点心似的。我可以模仿一切的一切：假迪斯尼，用乌贼墨颜料画的维多利亚蚀刻画，巴伐利亚的小甜饼，国内市场需要的人造爱斯基摩人。虽然他们所最喜欢的是一些他们希望也能引发起英国和美国的出版商兴趣的东西。

净水放在一个杯子里，画笔放在另一个杯子里，水彩颜料和丙烯酸则在各自的金属颜料管里。绿头大苍蝇在我手肘旁飞来飞去，象金属一样的腹部熠熠发亮，吮吸物状的舌头似第七只脚趾在油布上走来走去。下雨天的时候，我们就坐在这张桌子旁，用蜡笔或彩色铅笔在我们的剪贴簿上画画，画我们喜欢的任何东西。在学校里，你不得不做和别人一样

的事情。

在大伙都能看见的山顶上
上帝种了一棵红松树

这诗出现了三十次之多，在黑板的顶端连成一条线，每页都粘有一片收藏的枫树叶，夹在蜡纸与蜡纸之间，弄得平平整整的。

我画出一个公主的轮廓，一个极为平常的公主，苗条的时髦模特的身子和一张小孩般的脸，就象我为《最喜欢的童话故事》而作的那些人物。早些时候，他们使我感到厌烦，这些故事从未揭示出与他们有关的基本东西，诸如他们吃什么，或者他们的高楼和城堡建筑里是否有洗澡间，就好象他们的身体只是空气。并不是彼德·潘恩能够飞行这个情节使我对他产生怀疑，而是在他的地下洞穴附近没有一个厕所。

我的公主歪着头；她正在注视着从一个起火的鸟巢上飞起的鸟儿，翅膀张开恰象一位传令官的徽章或象一个防火保险公司的标志：《金凤凰的传说》。鸟的颜色必须是黄色的，这样火的颜色也只能是黄色的，他们必须减少花费，因此我不能用红色；这样我也无法用橙色和紫色了。我要求用红色而不是黄色，但帕西维尔先生需要“冷色调”。

我停下画笔审视了一番；那公主看上去很愚蠢，根本看不到一点惊异。我便把她扔掉了，又重新开始画，但这次，她成了斗鸡眼，一只乳房比另一只大些。我的手指很僵硬，也许我得了关节炎。

我把那个故事的另一章节大致地看了一遍，但是没有可

作画的内容。很难相信这里的任何人，甚至那些祖母们，曾经知道这些故事：这不是个有着许多公主的国家，“青春泉”和“七大奇观”的“城堡”都不属于这里。她们一定是夜间围坐在灶台边讲述一些故事的；也许是关于施了魔力的狗和恶毒的树，以及那些互为对手的政治候选人的神秘力量，选举期间，她们把这些政客用草编织而成的肖像付之一炬。

事实是我不了解那些村民们所想的或者所谈论的东西，我和他们隔得那么远。我们经过的时候，那些年岁大的村民偶然阻挡在路的中间，很可能是因为我母亲穿的是便裤，但即使是这样，也从未有过解释。虽然我们作客时也得和保罗和保罗太太的那些正儿八经而不十分友善的孩子们玩耍，但那些游戏都是短暂的，并且没什么可说的。我们从来也无法了解到他们在星期天排成纵队而进去的半山腰上的小教堂里的那些情况：我父母不允许我们偷偷地溜进去，也不许我们从窗户往里窥探，这就使其违法并具诱惑力。在冬天时节，我哥哥开始上学，他告诉我那里叫做“弥撒”，他们在里面所做的事情就是吃东西；我把它想象成一个生日晚会，有冰淇淋——生日晚会是我当时所有的唯一一次人们聚在一起吃东西的经历。但我哥哥告诉我说，他们只吃苏打薄脆饼干。

当我们自己也开始上学的时候，我请求和别人一样也去主日学校；我希望去发现教堂里的秘密，也希望不那么与众不同。我父亲没有同意，他的反应就象我要求去的是一个游泳池。基督教是他避而远之的，他希望保护我们不致于受到它的扭曲。但几年之后，他认定我已长大成人，可以明辨是非了，理智会保护我的。

我知道当时穿的是什么衣服：煞白的长筒袜，一顶帽子、一副手套；我和学校里的一个女孩一起去学校，她的家人对我有着嘶嘴的传教兴趣。那是个联合教堂，它和一条很长的灰白大街上的块状建筑物并排矗立着。在那尖塔上放的不是一个十字架而是一个旋转的洋葱状的东西，据说那是一个通风装置，塔内散发着香粉气味和潮湿的毛裤的味道。主日学校的校址是在那儿的地窖里，它象所正规学校那样有黑板，其中的一块上面印着“克卡普可口饮料”的字样，是橙色粉笔写的，下面用绿粉笔写着那几个神秘的大写字母G·G·I·T，这是一个可能的线索，直到他们给我翻译说，那是“加拿大训练中的女子”之意。老师穿的是栗色的熠熠发亮的衣服；戴一顶蓝色的薄煎饼似的帽子，帽子用两枚夹子夹在头上；她告诉我们许多有关她的追求者和他们的汽车的事。最后，她拿出基督的画像来，这画上的他没有刺儿，没有肋骨，而是活着的，身上裹着一块被单，样子很倦怠，显然难以创造奇迹。

每次做完礼拜，和我一起去的那家人便会驱车到火车站上面的一座山上看火车来回转轨；那是他们星期天的娱乐。然后他们让我与他们一起吃午饭，午饭老吃同样的东西：猪肉、豌豆和作为甜点心的罐头菠萝。开始吃饭时那位父亲总是作感恩祈祷：“为了我们即将获得的东西，愿上帝允许我们表示竭诚的谢意，阿门。”那四位孩子则你拧我我拧你，或在桌子底下互相踢来踢去；最后他总是说：

猪肉和豌豆是音乐的果实，
你吃得越多你号角就吹得越好。

那家人的母亲头上有一绺开始发白的头发，嘴巴周围长了一层皮刺，活象一个傻瓜，她总是皱着眉，问我当天早晨我都学了哪些有关基督的东西，而那位父亲则微微露齿而笑，大家都不理会他；他是一家银行的职员，星期天的火车是他唯一的消遣，那小小的节奏是他唯一感到的不得体的地方。有一段时间我有一种错觉，那罐装凤梨的确会产生乐感，会使你唱得更好，直到我哥哥帮我纠正了这种错觉。

“我也许会成为一个天主教徒，”我对我哥哥说；我不敢在我父亲面前提及此事。

“天主教徒都是疯子，”他说。那些天主教徒的学校设在我们那条街的下面，冬天的时候男孩子们向走在上学路上的他们扔雪球。秋天和春天则向他们掷石块。“他们相信死后升天的处女玛丽。”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他也不知道，因此他说，“他们相信假如你不去作弥撒，你就会变成（B·VW）一条狼。”

“你信吗？”我问。

“我没去呀。”他说，“我们也没变成狼呀。”

大概这就是他们不愿花力气去寻找我父亲的缘故，他们害怕，他们以为他已变成了一条狼；他会是一个主要的候选人，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去做弥撒。“该死的英国佬”，他们的意思就是这样；他们相信，我们实际上都该死。《魁北克民间故事》里应该有一个关于狼人的故事，也许的确有，帕西维尔先生把它删掉了，因为它对他来说简直是太粗鲁了。但在一些别的故事里他们采用另一种手段加以处理：那些动物都有人类的五脏六腑，它们剥下它们的皮就象是脱衣服那样易如反掌。

我想起了乔背部的毛，退化的器官，象阑尾和足趾一样，我们不久便会进化成光秃秃的了。我喜欢那毛，还有那粗重的牙齿，宽厚的肩膀，十分窄小的臀部，那双我们可在皮肤上感觉出组织的手，由于泥土而变得粗糙和坚韧。我所珍视的他身上的东西看起来都是肉体方面的，别的东西不是不可得知，或令人讨厌，就是荒唐可笑。我不喜欢他的气质，他一会儿粗暴，一会儿阴郁，我也不喜欢他那些众多的泥罐罐，他在行车之中那么熟练地把那些罐子扔掉，然后又做了许多，在它们上面挖洞，掐死它们，把它们劈得粉碎。那是不合理的，他从不使用刀，只用他的手指，许多时候他只是弯曲它们，把它们对折过来，即便这样，它们还是有那种令人不快的奇异的特征。没有人喜欢它们：那些每周两个晚上来向他学习陶器制造术和制陶术432－A的有抱负的家庭妇女们，只想做一些印有雏菊图案的烟灰缸和盘子，但几家手工艺品商店根本就不卖这些东西，而且也不贮藏它们。因此，它们越来越多地堆在我们那已经杂乱不堪的地下公寓里，就象那些零碎的记忆或者被谋杀的替罪羊一样。我甚至无法把花插到那里面来，水会从半腰处流出来。它们的唯一功能就是确认乔那用语言表达出的高级艺术的严肃性：每次当我画出一幅招贴画或得到一项新的委托事项时，他就损坏另一个罐子。

我想让我的第三个公主轻轻地跑过草地，但那张纸太湿了，于是她失去了控制，长出了一个大臀部；我试图把它画成一个穿裙撑的公主来挽救这画，但没有多大说服力。我放弃了，心不在焉地乱画一气，在上面加了尖牙和一副八字胡子，在她周围画了月亮、鱼、还有一只颈上长着短而硬毛的

正在咆哮的狼，但这只狼画得也不象，它更象一只超重的牧羊犬。公主们的选择是什么呢？家长们会为他们的孩子们买些别的什么呢？具有人的特点的熊和会说话的猪，新教培养那些得分并获成功的人。

也许我不只喜欢他的躯体，也许我还爱他的失败；因为那也有一种纯洁。

我把第三个公主揉成一团，把有画料的水倒入脏水桶里，然后把画笔洗干净。我从窗口上再往外看；大卫和乔仍在湖上，但他们好象在往回返。安娜正从半山腰沿着阶梯走上来，毛巾搭在肩上。我看了一会被纱门刻画的她，而后她就走进来了。

“喂，”她说道，“做什么事了么？”

“不多。”我回答。

她来到桌子边，把我已揉成团的三位公主平展开来，“画得好啊。”但她的话无法令人信服。

“这些都是画糟了的。”我说。

“噢，”她把那几张纸翻过来，面朝下。“你小时候就相信那东西吗？”她说。“我相信，我认为我是个真正的公主，我会在城堡中度完我的人生。他们不应让小孩有这样的东西。”她走到镜子前，按摩她的脸，然后踮起脚尖站着，看看后背是否发红。“他当时在干什么呢？”她突然问道。

过了一会我才明白过来她的意思。我父亲，他的工作。“我不知道。”我说，“你是知道的。”

她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好象我犯了天条似的。同时我也感到不解，她曾经告诉过我你不应根据工作来给自己作出定

论，而应该依你是谁。当人们问起她做什么工作时，她会谈到流动性是什么，她是怎样的，并不是她做什么；虽然如果她不喜欢那个人的话，她就说："我是大卫的妻子。"

"他当时还活着。"我说，这差不多是对的，这使她感到满意，她进卧室换衣服去了。

突然我对他那样消失感到一种愤怒，让人感到好不蹊跷，当他们问及此事时，我无言以对。如果他要死去的话，他应该在人们的眼皮下去死，死在外面，这样人们就可以为他立一块碑，并了结此事。

人们可能会觉得此事很离奇。一个象他这个年纪的人，整个冬天都呆在方圆十英里之外没有人家的一个小屋里；对此我从未有疑问，对我来说，那是合理的。人们总想一旦他们可以，他们便永久移居此地。他退休之后，孤独是他所想望的东西。他并不是不喜欢人们，他只是觉得他们没有理性；动物更为始终如一，它们的行为至少是可以预测的。对于他来说，那是被希特勒所证明的：不是罪恶的胜利，那是理智的失败。他觉得战争也是没有理性的，我父母都是和平主义者，但他会参加战斗也许是为捍卫科学，如果他被允许的话；这一定是唯一的把一个植物学家看成是国家防务的关键人物的国家。

事实上他让步了；我们一年到头都可在公司所在的城镇里生活，但他却用敌对双方——城市和林地把我们分割开来。在城里我们居住在一连串的公寓里，在林地上他挑选了一个他所能找到的最为偏僻的湖区，我哥哥出生时，还没有通向这地方的路呢。对他来说那个村子也是人口密集，他需要一个岛，一个地方，在那儿他可以创造一种生活，那不是

他父亲的稳定的农场生活，而是最早的开拓者们的那种生活，当他们来到这儿的时候，除了森林以外，什么也没有；除了他们所带来的思想以外，没有别的思想。当他们说“自由”一词时，他们所指的不完全是自由，他们指的是不受干扰的自由。

那叠纸还在灯旁的架子上面。我一直避开它，假如他还活着，我就不能看它，不然的话，那就是侵犯。但此时，我承认他死了，我也许应该知道他给我留下了什么。遗嘱执行人的职责。

我在期待着诸如报告一样的东西，树木的生长情况，或者疾病的发展情况，还有尚未完成的生意；但在头一页上粗略地画着一只手，是用一支毛笔或画笔写的、还有些眉批；数字，一个名字。我翻了以下的几页。更多的是手，然后有一个僵硬的小孩身段，没有脸，没有手和脚，接下去一页有一个类似的生物，有两根象树枝或鹿角一样的东西从其头部长出来。每页纸上都有号码，有些还有几个潦潦草草的字：“莱芬斯红色服装尚未售完”。我无法弄明白其中的含义。那手迹是我父亲的，但跟以前不同了，写得更快或更漫不经心了。

我听见外面传来木头的嘎吱嘎吱的声响，那是独木舟靠上了船坞，他们进船坞的速度也太快了；接着我听到他们的笑声。我把那堆纸放到架子上去，我不希望他们看见它们。

这是他整个冬天里所做的一切，他把自己关在这屋子里，画这些难以辨认的画。我坐在桌子边，我的心跳加快，仿佛我打开了一个我认为是空的橱柜，而发现自己正面对一个不应该在那儿的东西，一只魔爪或一根骨头。这是被忽视

的可能性：他或许精神失常了，发疯了，成了傻瓜。当你独自一人在森林中呆上好长时间后，那些设陷阱捕猎的人们会把它称为不知所措。

安娜走出卧室，又穿上了工装裤和衬衫。她在镜子前梳她的头发，她的发梢是淡色的，而根部则显得很黑；一边梳头一边哼哼唧唧地唱着《你是我的阳光》；烟雾从她抽的烟卷上袅娜升起。“帮帮忙吧，”我冲着她静静地思考着，“说话吧，”她果然说起话来。

“晚饭吃什么？”她说。然后她挥挥手，“他们回来罗。”

第七章

晚饭时我们喝光了啤酒。大卫想去钓鱼，因为这是最后一个晚上，所以我把碗碟留给安娜去洗刷。我自己拿了一把锹和一个装过豌豆的锡罐来到园子。

我在肥料堆旁草长得最多的地方挖了起来，把泥土掀起来，敲碎，用手指滤出蚯蚓来。这泥土很肥沃，蚯蚓纷纷爬出来，有红的，也有粉的。

谁也不喜欢我
人人都讨厌我
我要到菜园吃蚯蚓去

他们休息时反复地唱这首歌。这是令人恶心的，但也许它们是可吃的。到了季节，它们就象苹果那样在路边被兜售，五美分一条呢。有段时间五美分，后来涨价了，涨到十美分一条。在法语课上我第一次把“verslibre”译成“免费蚯蚓”，她当时还以为我在卖弄聪明呢。

我把蚯蚓放到罐里，并给它们添了点土。当我走回小屋时，我用手掌捂住罐子盖；这些蚯蚓已经攒动着它们的头爬到罐口附近，试图爬出来。我用一张从包装带上撕下来的纸做了一个盖子，并用一条橡皮筋把它固定在上面。我母亲是

个收藏东西的人：橡皮筋、绳子、安全别针、果浆瓶子她都收藏。对于她来说大萧条永远都没有结束。

大卫正把他借来的钓鱼杆一节一节地连接起来；这鱼杆是用纤维玻璃做的，我信不过它的耐力。我把挂在墙壁挂钩上的他的金属钓鱼杆取下。“来吧，”我对大卫说，“你要垂钓的话可用那条金属鱼杆。”

“告诉我怎样点灯！”安娜说，“我要呆在这读会儿书。”

我不想撇下她一个人。我所担心的是我父亲，他可能在岛上的某个地方，也许会被这灯光吸引过来，象一只乱蓬蓬的大飞蛾在窗前盘桓；或者，如果他仍然很清醒的话，他会问她是什么人，并且让她离开他的家。只要我们四个人都在那里，他就会远远地躲开。他从来都不喜欢人们三五成群聚在一起。

“多可怜的消遣！”大卫说。

我对她说独木舟里我需要她的额外的重量，那只不过是一个谎话，因为我们俩在一块倒会显得太沉了，但她竟然听信了我的花言巧语。

当他们登上独木舟以后，我回到园子里，抓了一只小小的豹状青蛙以防紧急之需，我把它放到果浆坛子里，在盖子上打了好几个洞，以便透气。

我们带上了用具箱，那箱子充满了以前放的腐鱼气味；蚯蚓罐子和青蛙坛子，还有刀和一堆接鱼血的欧洲蕨叶子。乔坐在船头，安娜坐在后面，穿了一件救生衣，面对着我。大卫也穿了一件救生衣，背朝我坐着。他的腿交叉在安娜的腿之间。我把船撑离湖岸之前，我把一个带有红玉色的玻璃

球的金银旋转匙形诱饵装在大卫的钓钩上，并且还穿上一条蚯蚓。蚯蚓在翻着筋斗，很是好玩，两端缠绕在一起。

“啊呀，”安娜说，因为她知道我在干什么。

“这不会伤害它们的。”我哥哥说过，“它们感觉不到。”“那么，它们干吗会蠕动呢？”我问。他说那是神经紧张的缘故。

“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告诉他们：“千万要呆在船中央。”我们小心翼翼地驶出水湾。我接纳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我已多年没乘过独木舟了，我的肌肉一点也不结实，乔划着桨，他好象用一把长柄勺子搅动着湖水一样。我们不以钓鱼为生倒是一件好事。忍饥挨饿，咬裂手臂，吮吸鲜血，那是人们在救生船上所做的事情；或者是印第安人的做法，如果没有钓饵，就从自己身上弄一块肉下来。

岛岸线向我们后面退去，它不会跟我们来的。在树林上空象鲭鱼一样变幻着的云彩正在空中扩散开来，好象油漆在一张书页上渗透开来一样；湖面没有风，是下雨之前的柔和的空气，鱼喜欢这样的空气，蚊虫也喜欢，但我无法使用任何杀臭虫喷射剂，因为它会粘在钓饵上，鱼儿会闻到它的气味。

我驾着船沿着陆地漂动。一只苍鹭在水湾那边腾空而起，它正在水湾那边抓鱼，后来在我们头顶上空振翅飞翔，脖子和嘴呷向前倾伸，长腿伸在背后，活象一条生有双翅的蛇。它注意到了我们，发出飞龙目动物的呱呱叫声腾空而去，飞得比原来高得多，朝东南方向飞去，那儿有一个它们的聚居地，那地方一定还在。但我现在不得不将注意力集中到大卫身上了。那条铜线斜着插入水中，激起一阵小小的漣

漪。

“有什么动静吗？”我问。

“只是随便跳跳而已。”

“那是匙状转弯处。”我说，“把鱼杆梢往下坠坠，如果你感到有点轻轻咬动的话，稍候片刻，然后猛地一拉，好么？”

“好的。”他回答说。

我的手臂已经没劲了。后面传来青蛙跳跃的扑扑声。那只青蛙正用它的口去顶撞坛子盖呢。

当我们快到那陡峭的悬崖边时，我告诉他把钓线卷回来。我们将停船垂钓，他可用他自己的鱼杆。

“安娜，你躺下。”他说，“我要用我自己的鱼杆。”安娜说：“噢，上帝，你什么事都得那样做，是不是？”

他抿着嘴轻声地朝她微笑，然后收回钓线，线收回来了，水则从钓线上滴落；匙状假饵发出的苍白的光亮在露出湖水的一瞬间摇曳了一下。就在它露出水面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发现蚯蚓已经不见了。鱼钩上只剩下一层蚯蚓皮；我过去常常觉得纳闷，粗糙的非洲幽灵眼睛一样的诱饵怎么可以欺骗得了鱼儿，但它们也许已经学精了。

我们正好在峭壁对面，灰白色的石板笔直树立着，就象是一块纪念碑，轻轻地悬挂着；壁架象是一个半悬着的阶梯，棕褐色的石苔藓长在裂缝里。我把一个铅坠子、另外一个匙状假饵和一条新鲜蚯蚓穿在大卫的钓线上，然后把它抛出去。那蚯蚓往下坠落，起初是粉红色，然后粉红夹带着棕褐色，一会儿消失在峭壁下的阴影中。黑色鱼雷状的鱼儿看见了蚯蚓，嗅了嗅它，然后用鼻子去戳它。我就象别人信奉上帝那

样信奉它们。我看不见它们，但我知道它们一定在那儿。

“坐好，别动，”我对安娜说，这时候她正开始移动着身子，看样子很不舒服。鱼是能听见响动的。

天渐渐地暗下来，四周静悄悄的。在森林另一面传来了飘忽的鸫鸟的鸣叫，这种鸟在黄昏时分才鸣叫。大卫的手上下移动着。

我看一点动静都没有，于是我就让他把钓线收回来，蚯蚓又不知哪去了。我抓出那只小青蛙，那是最后的一招了，我把它牢牢地钩住，尽管它一个劲地挣扎。以前总是别人帮我做这件事。

“该死的，你是冷血动物呀？”安娜说。那青蛙钻入水中，恰似一个不会游泳的人一样乱蹬乱踢。

大家凝神屏息、甚至安娜也这样：他们感觉到这是我最后的招数了。我往水中注视着，这种时刻总是沉思的。我哥哥钓鱼凭技巧，他猜得透它们。而我钓鱼凭祈祷，凭倾听。

在天国的我父
请让鱼儿上钩

后来，我知道那样行不通，只是诸如“请上钩”这样的咒语或者催眠术是行不通的。他钓得较多，但我能装出我的鱼儿愿意上钩，它们选择了死亡，而且它们已事先原谅了我。

我开始想，青蛙也不起作用了，但它仍然富有魔力，这时钓杆就象占卜者的杆变得弯曲起来，安娜由于吃了一惊而大喊起来。

我说："紧紧抓牢钓线。"但大卫却不在意，他就象一个糊涂专家一样把钓线收回来，嘴里叨念着："呜，呜，"结果一条鱼露出了水面，鱼儿正蹦跳着，清晰可见，它被吊在空中就象是横杆上面装有镜框的照片，一个劲地上窜下跳，它向下拉动钓线，钓线显得很松弛。鱼往回挣脱身子，试图把钓线给松开。但当它再跳的时候大卫猛拉了一下钓杆，鱼顺势飘了过来，掉进独木舟里，鱼落在安娜身上，安娜东倒西歪，尖叫着："把它拿开！把它拿开！"我们差一点没把船倾覆。乔说，"真他妈的该死，"说着抓住了船舷，我则向另一边倾过去，才算使船保持住平衡，大卫赶紧去抓那条鱼。那鱼在船的肋梁上不住地滑动，噼哩啪啦一阵乱响。

"来，"我说，"打它的眼睛后面。"我把带刀鞘的刀递给他，我自己不愿意亲手杀死这条鱼。

大卫朝它砍过去，但没击中；安娜蒙住双眼，嘴里喊着"哎呀，哎呀。"它噼哩啪啦朝我跳过来，我一脚踩了上去，同时夺过刀来，迅速地用刀柄使劲打它，一下把脑壳给砸碎了。眼看着它浑身痉挛，这下子解决了它的生命。

"这是什么鱼？"大卫问道，被他所抓到的东西惊呆了，但同时也很自豪。他们都笑了起来，那是由于胜利，轻松而欣喜若狂，就象战争结束时那种游行短片上的情景一样。这使我感到很高兴。他们的声音回荡在悬崖峭壁之上。

"眼珠暴突的鱼。"我说，"小狗鱼，我们把它当早饭吃好啦。"

好大的一条鱼啊，我把它捡起来，手指钩在鳃下，紧紧地把它抓在手上。这样的鱼就是死了也还会咬人或突然挣脱。我把它放到欧洲蕨叶上面，然后洗净我的手和刀子。它

的一只眼睛暴突出来，我感到有点恶心，那是我亲手杀死的东西啊，我已把它致于死地了；但我明白，这种感受是不合理的，杀死某种东西没什么了不得的。譬如食物和敌人，鱼和蚊虫；再譬如蚂蜂，当它们太多的时候你会把开水灌入它们的地道。“你不惹它们，它们也不会惹你。”我的母亲在给我们点油灯时总是这样说。那还是在那房子没建成的时候的事，我们住在外面的帐篷里。我父亲说它们是轮流着走进洞里的。

“漂亮吧？”大卫对另外两人说；他很兴奋，他要别人称颂他。“啊，”安娜说，“它又粘又滑，我一点也不想吃它。”乔咕哝了几声，不知道他是否嫉妒了。

大卫还想再钓一条；好象是赌博似的，输了才善罢甘休。我没提醒他我已没那种具有魔力的青蛙了；我拿出一条蚯蚓，让他自己把它放到钓钩上。

他又钓了一会，但运气不佳。正当安娜又开始烦躁不安的时候，我听见了轰鸣声，那是摩托艇发出的声响。我倾听着，它也许是到别处去的，但它绕过一个山头，那声音变成了吼叫，它向我们驶过来，那是一艘大机动艇，雪白的湖水从船头呈V字形翻滚开来。引擎停了下来，那条船就在我们旁边刹住了，它掀起的水浪使我们的船急剧地摇晃。一面美国旗插在前面；后面也插了一面，船上有两个面相似哈巴狗但装束极漂亮的商人，他们怒容满面，还有一位衣衫褴楼面容瘦削的乡村向导。我知道那是汽车旅馆的克劳德，他沉着脸看着我们，他觉得我们是在他的禁地上进行偷猎。

“钓到什么了吗？”其中一个美国人喊道，牙齿暴露，象鲨鱼那样友好。我说，“什么也没钓着。”然后我用脚轻

轻推一下大卫。他想要说出来，如果他想激怒他们，他就会说出来的。

另一个美国人把雪茄烟头抛出舷外，“这看上去不是什么好地方，”他对克劳德说。

“过去可是个好地方呢。”克劳德回答说。

“明年我打算去佛罗里达，”第一个美国人接着说。

“把钓线卷起来。”我对大卫说。现在呆在这里已没有什么意义了。要是他们抓着了一条，他们会整个晚上都泡在这里，如果十五分钟内他们什么也没捞着，他们就会起动他们的船，他们会加大马力在湖里转圈子，把湖里的鱼都震晕过去。他们抓鱼不只是为了吃，要是他们能躲开的话，他们还会用炸药炸鱼的。

我们过去总是认为他们是不会伤害他人，能逗人乐，不伦不类，但又有点可爱的人，就象爱森豪威尔总统那样。我们在去椴树湖的路上曾经遇见过他们俩人，他们当时正在两条水路间的陆地上运送摩托艇和发动机，他们一旦到了内陆湖上，他们就用不着划船了。当我们第一次听见他们穿行于低矮的灌木丛中发出沙沙声的时候，我们还以为他们是熊呢。另一个人手里拿着绕线轮出现在我们面前，并来到我们的篝火旁，结果篝火把他的靴子都烤焦了；当他试图撒网时，他按了一下按钮，把一个包在透明塑料袋里作钓饵的小鱼抛到了水湾另一边的灌木林里。我们在他背后取笑他，问他是否在抓松鼠，但他不在乎，还给我们看他的自动打火机和带有可折把手的炉盘和可折叠的沙发。他们喜欢任何可折叠的东西。

回家的路上我们紧靠湖岸而行，避开开阔的湖面以免那

些美国人故意使他们的船发出嗡嗡声在离我们最近的地方驶过，他们有时以这种方式取乐，他们的船掀起的浪足以使我们的船倾覆。但在我划行了一半路程以后，他们却飞快地移动开了，就象在一部最新的影片中的“火星人”那样，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感到一阵轻松。

当我们回到住地后，我将把那条鱼挂起来，把鱼鳞去掉，同时用肥皂把我胳肢窝上有盐味的东西洗去。之后我将点亮灯火，并开始起火，再后来做些可可。呆在这地方对我来说第一次感到惬意，我知道那是因为我们明天就得离开这里。我父亲将独自一人拥有这个岛；发疯是个人的私事，我对此很尊重，然而他也许还活着，这里比一个慈善机构要好得多。在我们离去之前，我要把他的画烧掉，它们是发疯的证据。

太阳已经西沉了，我们沐浴在黄昏之中慢悠悠地往回走。远处传来潜鸟的声音，蝙蝠在我们旁边飞来飞去，在湖面上忽而下降，忽而升起，这时候的湖水相当平静。湖岸上的东西，灰白色的岩石和枯树在那面黑色的镜子上重重叠叠。一望无垠，或根本不存在空间的感觉环绕着我们，我们自己和我们似乎可以触摸的依稀可辨的湖岸笼罩着我们，介于虚无之间的水。独木舟的倒影和我们相伴而行，船桨在湖水里成了叠影。仿佛是在空中游荡，底下没有什么可以支撑住我们；我们飘飘逸逸，飘浮在空中。我们向家的方向飘去。

第 八 章

第二天一大早乔就把我弄醒了，他的双手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极机敏的，象盲人读盲文一样，它们在我身体上轻轻地抚摸着，非常娴熟。它们把我的身体当成花瓶似地捏着，它们正在想了解我；它们重复着他先前试过的那些花样。它们已发现了能起作用的地方，我的身体也应和了它们，期待着他，象是受过教育似的，干净利落得象位打字员。要是你不了解它们，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了。突然我想起一种说法，当时还是一个笑话，但现在却让人伤心。那还是一次高中舞会后，一个坐在车子里的人说了这么一句话："头上蒙个纸袋，谁还不是一样。"那时我没理解其中的意思。它实际上差不多就象一件有袖子的上衣那样简单：两个人用纸袋蒙住头作爱，这个纸袋上连一个小孔也没有。谁去管它好还是坏呢？

我们作完爱，休息了片刻之后，我起床穿好衣服，出去准备做鱼吃。鱼挂了一整夜，一条绳子穿透了鱼鳃打了一个环扣把鱼挂在了一条树枝上，食腐动物、浣熊、水獭、水貂、黄鼬都够不着它。一粒挤出的鱼粪，象一粒鸟粪那样，只是更显棕褐色一点，正在肛门上滴着水。我把绳子解开，把鱼拿到湖水里去清洗，把它切成鱼肉片。

我蹲在湖边的一块平石上，刀和装鱼肉片的盘子就搁在我身旁。我从未动手干过这样的工作；过去总是别人做这件

事，我哥哥或是我父亲。我把鱼头和鱼尾巴都切去了，然后把鱼肚子剖开，把它翻开两半。鱼肚子里面是一条没被消化完的水蛭，一些小龙虾的碎片。我沿着脊梁骨把鱼劈成两半，而后沿着两条侧边把鱼切成了四块。鱼肉白中带蓝，呈半透明状。鱼内脏将被埋到园子里去，它们还是肥料呢。

我正在洗鱼片时，大卫蹒跚着来到码头上，手里拿着牙刷。“嗨，”他招呼道，“是我钓的鱼吗？”他饶有兴致地看着盘中的鱼肉片。“把它拿起来。”他说。这是“随意取样”。他去找乔并拿来相机，他们俩人非常庄重地把鱼的内脏、萎缩的膀胱，输卵管和韧带都给拍摄下来，把它们重新摆布了一下，使这些鱼肉片形成一个更好的拍摄角度，大卫从来没想到会有人帮他用一台布朗尼照相机拍下他抓着鱼尾巴高高举在空中，并龇牙裂嘴大笑的镜头；他也从未充填一条鱼并把它制成标本。然而他要使其不朽，而且还是以自己的方式使其成为不朽。相册上也有我的位置，我不断出现的身影就象是夹在字典中的那些花朵一样被保存，并被压得平平整整；那是她保存下来的另一本书——一本皮革相册，一本木制的书，象是那些日记。我过去讨厌一动不动地站着，等待相机的咔嚓声。

我把鱼肉片和进了面粉里，然后把它们煎熟，我们把它们和猪肉条一起吃了。“美味佳肴啊，好家伙，让我们吃吧。”大卫说，然后咂着嘴说，“城里哪能享用这等好肉哪。”

安娜说，“当然可以，可以吃冻肉。现在，你可以在那儿买到应有尽有的东西。”

早餐后，我走进我的卧室，开始打点行装。隔着胶合板

墙我听见安娜在踱步，又有倒咖啡的声音，还有大卫在睡椅上伸懒腰时发出的吱嘎吱嘎的响声。

也许我该把所有的床上用品、毛巾和丢下的衣服都卷起来，把它们绑成捆，并且把它们带到家里去。谁也不会在这里居住了，飞蛾和耗子迟早会搬进来的。要是他决定再也不回来了，我想这些东西都归于我的名下，或者一半归我，另一半归我哥哥；但我哥哥决不会做这等事情，他离开之后，就象我一样尽可能避开他们。我哥哥建立起了更为美满的家庭，他尽可能地走得远些：如果我把一枚织毛衣用的钢针笔直地扎进地里，另外的一头便是他现在所在的地方，他已在内地安营扎寨了，那是无法到达的地方。他甚至没有收到我的去信。他在为那些大国际公司勘探矿产开采权，他是一位勘探专家。但我无法相信这些，自从我们长大以后，他从来没做过一件使我觉得真实的事。

"我喜欢这儿，"大卫说，其他两人一声不吭。"让我们在这儿再呆一段时间吧，一周怎么样，那太棒了。"

"你不是得参加那次讨论会吗？"安娜怀疑地说。"《人类和他们的电环境》，是不是这个项目？"

"那是《电气化》，不过那要等到八月份呢。"

"我想我们不该待到八月份。"安娜说。

"你怎能总不让我们做我想做的事呢？"大卫说。过了一会儿，他接着说，"你是怎么想的呢？"乔说，"好啦，由我决定吧。"

"好极了，"大卫说，"我们可以再钓些鱼。"

我坐在床上。他们也许要事先问问我的意见，这是我的房子。尽管他们也许会等到我出去，然后再问我的意见。如

果我说我不想继续钓鱼，他们也不会十分想留下来；但我该找出什么理由来呢？我不能告诉他们这是由于我父亲，我不能违背我父亲的意愿。但无论如何，他们也许会认为那是我编造的谎言。此外，还有我的工作，但他们知道我有工作在身。我可以独自一人和伊文斯一同离去，但我最远也只能到达村里；汽车是大卫的，我得把钥匙偷出来，再者，我提醒我自己，我从未学过开车。

安娜作了最后一次无力的尝试。“我的烟都快抽没了。”

“那才对你有好处哪。”大卫兴高采烈地说，“令人讨厌的习惯，这样可以恢复你的健康。”他比我们仨都大，他已是三十多岁的人了，他开始为此感到担心；他经常拍打自己的肚子，然后说：“优柔寡断的人。”

“我的脾气会变坏的。”安娜说，但大卫只是笑，然后说，“试试吧。”

我可以告诉他们吃的已所剩无几了，但他们会发现那是个谎言，因为那儿有园子，在架子上还有一排排的罐头，腌牛肉，罐头猪肉，焙豌豆，鸡，奶粉，应有尽有。

我走到门口，打开门说，“你得给伊文斯付五美元呢。”

他们顿时吃了一惊，他们明白我已偷听到他们的谈话了。大卫接着说，“别太费劲。”他迅速地瞥了我一眼，脸上漾起胜利的喜悦，好象他刚刚赢得什么似的：不是战争，而是彩票。

当伊文斯在约定的时间里来到时，大卫和乔走到码头去和他一起安排事情。我告诫他们不要说任何与鱼有关的事。

如果他们说及此事，这片湖区就会涌入无数的美国人来，他们传播消息的方式不可思议，就象成群的蚂蚁涌向糖块或大螯虾一样。几分钟后，我听得那船又发动起来，一会儿加快了速度，再一会儿便消声匿迹了。他走了。

我去到厕所把自己闩在里面，因此躲开了伊文斯，也回避了向他作任何的解释。厕所也是我躲开我不想做的事的地方，譬如上园子拔草。这间厕所是新建的，旧的那间已废弃不用了。这间是用木头搭起来的；我和我哥哥挖的坑，他用铁锹挖，我用水桶把沙土掏出来。有一回一头豪猪掉了进去，豪猪总喜欢咬嚼斧头柄和马桶坐圈。

在城里我从来也不躲到卫生间里；我并不喜欢它们，它们惨白得让人难受。在城里我唯一记得躲过的地方是生日晚会上躲到开着的门背后。我讨厌那些纯紫色的上面带有去吗卡油饰带领子的天鹅绒服装，也讨厌那些礼物，我讨厌打开礼物时听到带着羡慕的咿呀咿呀的乱喊乱叫，也不喜欢没有目的的游戏，即找顶针之类的游戏，也不喜欢托盘磕碰到一起时发出的那种声响。这样的时候你不是得胜者，就是失败者；母亲们努力为此临时赶制手工艺品，结果人人都获得奖品，但她们却想不出更好的主意来对付我，因为我不愿玩。刚开始时，我干脆就跑开，但后来母亲说我必须去，我不得不学会礼节；正如她所说的“有教养”。因此，我躲在门后面看。最后我参加一场叫“音乐椅子”的游戏时，我由于得胜而受到欢迎，象个宗教皈依者或一个政治上的叛徒那样。

有些游戏让人失望，他们发现我寄居蟹式的习惯很逗人，他们发现我总的来看还是挺风趣的。每年十月或十一月我都在不同的学校里。第一场大雪飘落到湖里时，我便成了

那位最不懂当地风俗习惯的人，好象是一位来自不同文化地区的人一样。人们可以随便开我的玩笑，不过他们早已用完了那些让人心烦的小把戏了。开学后男孩追逐着女孩玩，并把她们逮住，然后用她们的跳绳把她们捆起来，我便是他们故意忘记松绑的人。许多个下午我被绑在栅栏上、门上以及方便的树上，等待着经过那地方的好心人把我的绳子松开。后来我成了一名逃避现实的艺术家，特别擅长于解扣结。逢年过节时他们总是聚在一起，和我展开竞赛。

“亚当夏娃和我”，他们喊道：
到河边游泳去，
亚当夏娃掉下去，
结果你认为谁得救了？

“我不知道。”我回答说。

“你必须回答。”他们说，“那是规矩。”

“亚当和夏娃，”我不无灵巧地说。“他俩都得救了。”

“如果你做不对的话，我们就不跟你玩。”他们说。交际的迟钝就象是心理迟钝一样，在其他人心里会引起反感，引起怜悯，同时引起折磨和改过的渴望。

我哥哥当时更不好过；母亲告诉他说打架是不对的，于是他每天回家总带有被人打起的肿包。母亲最后作了让步，说：他可以打架，但只是当别人打了他时，才可与之对打。

星期天我在学校呆的时间不算长。有个女孩告诉我她已祈祷要求得到一双花样滑冰鞋，衣服上有天鹅绒饰物的巴巴拉·安·斯格特的玩偶，结果她生日时果真得到了一个。于

是我也决定祷告，不过不象对上帝或向鱼儿进行祷告那样，而是祈祷得到实实在在的东西。我祈祷别人看不见我，然而翌日早晨大家仍然看得见我，我知道他们有了一位错误的上帝。

有只蚊子飞到我的手臂上，我让它咬我，直到它吮血后腹部胀得象个球时才用我那象粒葡萄那样的拇指去摁它。它们需要血液才能孵蛋。这时从挂有窗帘的窗上徐徐吹进一阵轻风。这里的确比城市里要好，因为城里到处充满着那些由排气管排出的难闻的烟味，潮湿的热浪，地铁上烧焦的橡胶味。只要你到外面走上一走，你的皮肤上就会凝结上一层黄褐色的油脂状物。我怎么在城里竟住了那么长时间呢，那是不安全的地方。我总感到这里才是安全的，甚至夜里也是安全的。

那是撒谎，我听着自己大声嚷道。我极力地想这一问题，仔细思考这问题，那是一个谎言。有时我感到害怕极了，我总是到小径上晒会儿太阳。我常常听见林子里传来沙沙声，心里明白那是一只浣熊，或是一只狼，或别的叫不上名称的东西在跟踪着我，那种情形是很糟糕的。

我打量着墙壁、窗户，它们还是老样子，一点也没有变化。虽然所有的东西都有点歪歪斜斜了，但那些形状仍然非常清晰可辨。我便更仔细地品味我的记忆。我必须断定一定是我自己的记忆，而不是别人告诉我的那些感觉，不是那些告诉我如何行动，如何言语的那些人的回忆。如果事件本身是错误的，我记起它们的感觉也定会是错误的。我要开始虚构出它们，同时我还无法纠正这种虚构，可用来帮助记忆的事件已无影无踪了。我迅速地回顾了一遍对此的看法，我的

生活，就象对托辞进行核对那样。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所有的感觉都停留在那里，直到我离开时为止。然后象一条跳过去的壕沟那样平静。一会儿我就失去了这样的感觉。毫无保留，我准确的年龄，我闭起双眼，是什么呢？有过去没现在，那意味着你变得衰老了。

我不愿意去想那些可怖的事情。我强迫自己睁开双眼，我的手上刻印着我的生活，参照符号：我伸展手掌和手纹，它们象潺潺的细流那样。我全神凝注在窗户旁边的蜘蛛网上，被缚住的苍蝇蝇壳在太阳反光下熠熠发亮。我在嘴里反复地唠叨着自己的名字，象是念咒语一般。

就在这时，有人敲门，“准备好了没有？人家得来揪你才行，”传来的是大卫的声音。我辨认得出他的声音，我感到如释负重，赶紧恢复到原来的模样。

“等一会儿，”我说，他又敲了敲门说，“大便得干脆点。”然后传来了一阵啄木鸟似的笑声。

午饭前我告诉他们我准备去游泳。别人都不想去，他们说那会太冷了，是太冷了，象冰水一样。我不该自己去游泳，我们曾被这样告诫过，我可能会痉挛的。一阵心脏病发作或如闪电一样的感觉从我周身掠过，当我朝湖里走去的时候，我发现我已不再有那份勇敢了。过去我习惯于跑到船坞边上跳下去，那就象心脏病发作或闪电一样。

这儿是他溺水的地方，他是偶然被救起的，要是当时没有风，她就听不到他的声响了。她当时倾出身子，向下伸手抓住了他的头发，把他拽了起来，然后把水从他的肚子里呕出来。他的受溺不象我想象的那样对他产生大的影响，他甚至都记不起这件事来。如果此事发生在我身上，我就会觉得

我身上会有特殊的感觉，因为正是这样他才从死亡中被抢救出来的。

我要带回许多秘密去，我知道了许多别人不知道的东西。

我母亲说完那故事后，我问她如果她没把他救活的话，他会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她说不知道。我父亲什么事都会作出解释，但我母亲却不会这样做。这使我确信她心里有底，只是不愿意说出来而已。“他会不会在坟墓里了呢？”我问。当时在学校里流行着一首有关坟墓的诗歌：

把他搁在面包盘上吧，
猛击一下他的下颚，
现在他躺在坟墓里了，
呜呼！呜呼！呜呼！

“谁也不知道。”她说。她当时正做着馅饼面皮，于是塞给我一块面团子就把我打发开了。我的父亲肯定会说是的。他说你的脑袋死了，你也活不了。我不知道他是否仍然相信这一点。

我走下船坞，从湖岸边走入水中，不紧不慢地把水溅到肩上和颈上。这时候我的大腿感到一阵寒冷，我的脚掌触摸着沙子，树枝和沉积的叶子。过去我总是潜入水中，张开双眼；沿湖底而游，游得远了，我的身体变得脏污起来，并受着腐蚀，再往外游，我会从独木舟上或木伐上往水里跳，然后在水中翻转背来，看着水泡从我嘴里冒出来。我们常常待到皮肤有点麻木或变成了怪颜色——紫青色时我们才止住不

游。那时候我一定是个超人。我现在可不行了。也许我早就变得老了，可能吗？

我站在那里，全身发颤，看着我水中的影子，透过水底我看到那双脚，象沙地上的鱼肉片一样雪白，我呆在水里直到有这么种感觉：呆在水面比呆在水中更为难受，我弯下腰好不情愿地扎入湖水中。

第 九 章

麻烦都是出在我们的头颅。我对身体和头颅并不反感。只是脖子使人觉得身体和头颅相分离。我们所使用的语言是错误的，不应该对这些部位给予不同的称呼。如果人的头颅象蚯蚓或青蛙的一样直接和肩膀连在一块，没有中间的那道阻隔，他们就不会低下头看到自己的身体，也不可能象机器人和木偶那样把头转来转去；他们一定意识到了一旦头颅和身子分了家，那么它们两者都必死无疑。

连我自己也尚不清楚我何时起怀疑我自己和它们的存在。我当初是什么，而它们当初正在转变为什么。这种感觉的一部份象旗子，象磨菇一样迅速袭来，一点点地展开，又突然变大起来，但它就在我身体内部，那迹象只需要进行诠释罢了。从我现在的处境看，我似乎与生俱来就知道世间所有的一切。时间就象在渐暗的卧室里我放在膝盖上的拳头那样，越来越紧迫。我掌心所握着的是为我目前必须要做的事的线索，决心和力量。

我的视力极差，翻译进展很糟糕，那是由于方言的问题。我本该使用我自己的方言。在那些用孩子做实验的实验室里，人们把孩子们和那些又聋又哑的保姆们关在一起，把他们锁在小房间里，不让他们有说话的机会，他们发现过了一定的年龄，人脑便不再能够接受任何语言了。但他们又怎

能断定那些孩子自己又形成了一种语言了呢？那种实验在高中课本《你的健康》中还附有呆小病症、甲状腺缺乏症、跛足和畸形症病人的照片，它们是些病例。他们的眼睛圈上有了一层黑框，就象被判了刑的罪犯似的。这些照片是唯一被认为我们看还算适宜的裸体照片。其余的是图表，用箭头标示的透明图片和海洋生物状的紫色卵巢，梨子一样的子宫。

我听见其他人说话、洗牌和甩牌，声音透过关着的门传了过来。他们的笑声瓮声瓮气，他们怀里的某个地方揣着一盘小磁带，一会儿就倒带。

伊文斯离去的那天，我感到很不是滋味：这小岛并不安全，而我们却被困在这上面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可我知道这一点。我对他们负有责任。我觉得他用双眼注视着我们。他就潜伏在那绿色的叶屏后面，做好了猛扑和起跳的准备。谁也料想不到什么时候他就出现了。我现在正想方设法使他们置身于危险之外。只要他们不单独出门就准保安然无恙。他也许不会伤害人，但我无法肯定。

吃过了午饭，我拿着面包屑放到喂鸟的托盘里。那些樫鸟已发现这小屋里住着人；它们很聪明，知道托盘旁边有人影就意味着有东西可吃，或许其中的几只鸟年纪稍大些，它们还记得我母亲伸着手站在托盘旁边的情形。两三只鸟正在放哨，小心翼翼，站在抓不到它们的地方。

乔跟着我走出来，看着我把面包屑散开来。他把手指头放在我的臂膀上，皱着眉望着我，看样子他有话对我说。说话对于他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象是一场搏斗似的，单词堆集在他胡须后面，他说话是一字一板的，就象坦克一样既笨重又一本正经。他用开始痉挛的手抓住了我，而大卫手里拿着

斧子站在那里。

"嘿，太太，"他说："我看你的柴堆越来越矮了。你用得上个帮手嘛。"

他要干些有益的事，他是对的，我们要是在这里呆上一周，我们就需要些新的给养。我告诉他去找些未倒下的枯树，不要那些死得太久而腐烂得厉害的。"好的，太太，"他说着，向我行了个滑稽可笑的礼。

乔拿起那把短柄的小斧跟他一起去了。他们都是城里来的人，我担心他们不小心砍了自己的脚；不过那样也未偿不是个出路。我想要是真的，我们就会不得不回家了。但我不必提醒他们去对付他，因为他们手中有家伙。要是他看到了家伙，他自然会跑开去的。

他们在通向森林的小径上消失后，我准备到园子去拔草，拔草是另一项必须完成的工作。我想一直忙个不停，至少得保持井然有序的样子，以便掩盖我心里的恐惧。象爱一样，恐惧也有它自己的趣味。

安娜看得出我需要她的帮忙。于是她放下谋杀案之谜，掐灭了才抽了一半的烟卷。她现在抽烟有了节制。我们扎上头巾，然后我到工具棚取草耙。

园子里阳光普照，热得象要冒蒸气，潮乎乎的象是在温室里一样。我们蹲在地上开始拔起杂草来；那些杂草长得很牢固，拔不出来；一旦拔出来的也要带着一大块泥土，要不就折断茎柄，根须留在了泥土里，指望再生长出来。我在热乎乎的土里挖着它们的根须，手上满是野草的绿色浆液，不久蔬菜便显露出来，大多都矮小苍白，只不过没有被压死。我们把除下的草耙在一起，堆在地垄之间，眼看着它们慢慢

地枯萎，渐渐地死去，过不了多久这些草就会象巫婆一样被烧死，这样它们就再也长不起来了。有好几只蚊子和几只专门吸吮鹿血的苍蝇飞来飞去，瞪着七色彩虹似的眼睛，尾部的刺象加热了的针。

我时不时地停下来，查看着篱笆和菜地的边沿，可是那里什么也没有。也许他会变得让人认不出来了。从前的样子由于年龄、疯颠和这森林而变了样，穿着一身破布片似的腐烂衣服，脸庞的皮肤上贴着朽叶，一切都过去了，过得真快，我思忖着。

他花了多少年的功夫才建成了这座菜园，原来的泥土多沙而贫瘠。这块长方形的园子是人工筑成的，是技巧和一锹锹混合肥料的产物。从沼泽地里挖来的腐殖土，用小船从冬季伐木场运过来的马粪，当时人们还在用马在结冰的湖面上拉圆木。我的父母把肥粪装在蒲式耳篮子里用手推车运回来，这辆手推车两端横钉着的木板，两端都翘起一头。

我还能记起在那之前的事，当时我们住在帐篷里。大约就是在那个地方我们找到了装猪油的桶，象一个纸袋一样被撕成了两半，爪子的抓痕还留在上面，漆皮上仍有牙印。我们的父亲出远门去为造纸公司或某个政府部门调查木材情况，我从来也无法断定他到底是为哪一家工作。我母亲只有能维持三周的食品。熊从食物棚后面闯了进去，我们夜里听到它的声响，它踩烂了鸡蛋和蕃茄，把所有的储藏罐都撬开了，蜡纸包着的面包被弄得满满一地，还打破了果浆瓶。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尽量做补救工作。早餐我们围着篝火吃土豆，土豆是熊唯一放过的东西。我们正在用早餐的时候它突然出现在那条小径上，拖着扁平的脚一边走一边嗅，就象是

一块巨大的长着尖牙的挂毯，来回寻找更多的食物。我母亲站起来，迎着它走了过去；它犹豫了一下，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母亲冲它大喊了一声，“滚开！”喊时还挥动着手臂，它于是转过身去，扑腾扑腾地走回森林里去了。

那是我记忆中所保存的景象，我们从后面看到母亲高举着手臂，象是要腾空而起的样子，还有那被吓坏了的熊。后来当她讲起这段故事时她说她当时吓得要死，可我却怎么也不相信。她当时那么坚定，信心十足，她仿佛懂得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具有魔力的公式：手势加语言。当时她穿着那件皮夹克。

“你在服避孕药吗？”安娜突然问道。

我看了看她，样子很吃惊。她为什么想知道这个？从前人们管这叫个人隐私。

“不。”我说。

“我也不。”她闷闷不乐地说，“我不知道有谁还在服用那玩艺。我腿上长了个血块，你长了什么没有？”她的腮帮上抹了一块泥，她粉红色的脸象沥青那样在炎炎烈日中开始发软。

“我的眼睛看不清东西，”我说，“东西看上去模模糊糊，他们说几个月之后就会好起来，可并没有。”我的眼睛上就象是抹了一层凡士林，不过我并没有这么说。

安娜点了点头，她拉扯野草的样子就象拔头发。“这群杂种，”她说，“他们聪明得很，你以为他们能弄出点什么既好使又不致于要了你的命的东西吗？大卫想让我重新服药，他说这对我不会比服阿斯匹林更有害，可下面准是心脏什么的出了毛病。我是说，我可不想冒此风险。”

爱没有恐惧，性行为没有风险，这就是他们真正想要得到的东西。他们差不多做到了，我想他们的想法几乎已经实现了，可就象魔术师的把戏或者窃贼没能偷盗成功那样又失败了。于是我们便回头想别的办法。爱随时都要有所戒备，你采取了预防措施了没有，他们的预防措施是在那种事发生之后而不是发生之前。过去性往往就象胶皮手套那样的味道，现在又恢复如初，它已不再象信手拈来的绿色塑料包那样了，而是成了月牙形，这样女人们便仍然可以装出很自然的，周期性强的样子，而不是象自动售货机那样毫无变通。可是人们很快就会有人造子宫，我不知道我到时感觉如何。有了一个孩子之后，我再也不想要孩子了。受了太多的苦还不够，又什么都得不到，他们把你关在医院里，给你剃毛，把你的手捆在下面，什么也不让你看见。他们不想让你理解，而只想让你相信那是他们的力量，不是你的。他们给你扎针，好让你什么也听不见。你还不如干脆是头死猪，你的腿搁在金属架上，他们俯身围绕着你，技术员、机械师、屠夫、见习生笨手笨脚，窃笑着在你身上进行实习。他们用一把叉子把孩子取出来，就象从腌菜缸里取出一把咸菜来。然后他们在你的血管里注满红色的塑料制品，我亲眼所见，看着它从管子里滴落下来。我再也不允许他们如此对待我了。

他当时没在那儿陪我，我记不清为什么；他本该在那儿的，因为那是他的主意，他的错。可他后来开车接了我，我没有不得已而坐出租车。

从我们身后的树林传来了零星的砍伐声：几声敲击、回应、停顿，又是几下，还传来了他们中一个人的笑声，以及

那笑声的回应。那条山路是由我哥哥开辟出来的。那是在他离开的前一年，他沿着湖岸，用斧头和大刀连劈带砍，低矮的树丛都记载着他的业绩。

“我们干得还不够吗？”安娜说，“我敢打赌我都快中暑了。”她坐在脚后跟上，拿出那支抽了一半的香烟。我想她要和我说些知心话，她想谈谈她的别的什么病症，可是我还是继续除我的草。土豆、洋葱；那块草莓畦是一点指望都没有的丛林，我们不会去给它除草。不管怎么说，季节早已过去了。

大卫和乔出现在围栏外长得很高的草地上，二人站在一根略显细长的圆木的各一端。他们很自豪，因为他们毕竟砍了些东西回来。那圆木上有很多个凹口，象是他们敲打过它似的。

“嗨！”大卫叫道，“老种植园的工人们干得怎样？”安娜站了起来，“得了吧，”她说，对着太阳眯缝着眼睛看他们。

“你们什么也没干哪，”大卫说，看起来遏止不住感情似的，“你们把它叫做菜园？”

我以我父亲对某事做结论时的那种神情打量着他们砍来的柴禾。要是在城里父亲会同他握手，非常精明地衡量他们的业绩：他们用得了斧子吗？对肥粪都了解些什么呢？他们会站在那儿，窘得不知所措。他们的肤色就象郊区人那遭日晒的肤色一样，穿着高中生的衣服，不知道别人要他们干些什么工作。

“太棒了。”我说。

大卫让我们去取摄像机，拍几段他们两个举着圆木的镜

头，好为“随意取样”增添些照片。他说那将是他的象浮雕徽章一样的形象。乔说我们不会使用那摄像机，大卫说只要按一下按钮就行，就连白痴都会使用。再说要是焦距对得不准或感光过度的话，没准效果会更好，那样就会引入机率的因素，象画家把颜料泼向画布，那会更加显出有机的结合。可是乔说，我们要是把相机给毁了怎么办，谁花钱赔。最后他们几经试拍之后，把斧子扎在圆木上，然后轮流拍摄对方站在木头旁的镜头，胳膊交叉着抱在胸前，一只脚踩在上面，好象那木头是头狮子或者犀牛似的。

晚上我们打桥牌，用的是一直放在那儿的略显油腻的纸牌。一副是蓝色的，另一副是红色的。大卫、安娜和我们打对家。他们很轻易地就胜过了我们。乔并不会打牌，而我已多年不玩了。我从来没打过好牌。唯一使我感兴趣的部分就是抓牌，然后把它们整理好。

之后我等着安娜跟我一起到屋外的厕所去，通常我自己先去。我们拿了两把手电筒，打出微弱的黄色的光亮，形成了一个保护圈，走路时，光线一直跟在我们脚边。藏在干树叶里的蛤蟆发出沙沙声响。有只野兔飞也似地跳了过去，样子很警觉。只要我辨别出那些声音是什么东西发出的，我就明白我们是否安全。

“我真希望有件暖和点的毛衣，”安娜说，“我没想到会变得这么冷。”

“有几件雨衣。”我说，“你不妨试试。”

当我们回到小屋时，那两位已经躺下了。他们懒得天黑后去那么远的厕所，因此他们就直接尿在地上了。我刷了牙，安娜借着蜡烛和直立手电的光在卸妆，他们已把灯熄灭

了。

我走进我的房间，脱了衣服。乔咕哝着，他已经半睡半醒了；我用胳膊环抱住他。

外面刮着风，树在风中摇动着，再也没有别的什么声音了。安娜黄色的手电光打在天花板上，光线移动着，她走进他们的房间。我能听得见他们的声音，安娜的呼吸声，还传来了一阵又急促又惊慌的声音。好象她在跑似的。然后又是她的声音，不是她本来的而是被扭曲的嗓音。我还听到不顾一切的哀求声。一定和她脸上的表情一样："求求你，求求你。"我把枕头压住头，不想听，我希望它就此结束，可那声响仍然不绝于耳。"住嘴，"我低语着，可她却不愿意。她在自言自语地祈祷，就仿佛大卫根本没在那儿一样。"耶稣基督噢，我求求你啦，耶稣。"然后情况变了样，不再是言语，而换成由于疼痛而发出的呻吟，象水一样清澈，仿佛是动物刚被夹在夹子上那一刻发出的叫唤一样。

这就象死亡一般，我想到，糟糕的不在于事情本身，而是做为见证人。我猜想从前他们也能听到我们。可我从来也没说过什么。

第十章

落日的余晖是红色的，红得近乎发紫。第二天太阳正如我所猜想的那样，一直高悬在空中。在既无收音机又无晴雨表时只好自己作天气预报。那是那个星期的第二天，我在心里一天天地数着日子，就象囚犯在墙上划着记号；我觉得自己紧张过度，象一根被拉紧的凉晒衣物的绳子，他至今尚未出现的事实只不过增加了他将要出现的可能性，第七天似乎还很遥远。

我想让他们离开这个岛，以免他们受到他的伤害，也免得他们伤害他，使他们彼此不知道对方。他们也许开始了探险，开辟新的林中小径；现在他们已经是坐立不安的了。火种和食物这两项生活必须品都已安排停当，剩下的事也就不太多了。太阳升起来了，它缓缓地划过天空，影子自然而然地由长变短，空气平静，没有明确的界限，远处偶尔出现一架飞机把空气给搅动了，这飞机拖着雾一样的条带，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景象就象是生活在吊床上一样。

早晨大卫到船坞上去钓鱼，结果一无所获，安娜读书，这是她所读的第四或第五本简装书。我扫了地，苕帚上缠着长长的头发，有深色的，有浅色的，它们都是从我和安娜梳头的镜前扫起来的，而后我试着干活。乔呆在墙边的长凳上，胳膊抱着膝盖，样子很象草扎的矮人那样，他看着我。每当

我抬起眼看东西时，都会遇着他的目光，他的眼睛蓝得象园珠笔一样，或者说他简直就是个超人。即使我转过头去我也还能感觉到他那 x 射线一样的眼光在我的肌肤下进行扫描，我感到有一种轻微的刺痛，他仿佛在跟踪着我。我难以集中我的心思，我又读了两个民间故事，一个是关于一位学习与动物交谈的国王的故事；一个是关于生命家的故事。可是我得到的只是一幅象橄榄球运动员一样的粗糙的素描。它本该是一幅巨人的。

“出什么事了么？”我最终还是问了他，扔下画笔停止了作画。

“没什么，”他说。他把黄油碟子上的盖揭了开来，用手指在黄油上戳着洞。

我应该很久以前就意识到事情的进展，当我们仍旧在城里时我就应该摆脱出来。我和他在一起是不公平的，他已经习惯了，难以摆脱了，可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也不曾意识到。当他无法区分自己的快乐和痛苦的时候，你便是上了某种瘾了。我就是那样做的，不加限制地提供给他想入非非的东西，他对此毫无准备。他的欲望太强烈了，要想填满这种欲望，他就得象独自一人呆在房间里看范例一样毫不掩饰地加以临摹。

午饭后他们围坐在一起，等待着什么，就象等待我分发彩色铅笔或粘土似的，或等待我去组织演唱会那样，要我告诉他们玩点什么。我想了想过去：从前当阳光和煦又无所事事时，我们都做了些什么呢？

“你们觉得，”我说，“去采点浆果怎么样啊？”我把这件事出其不意地提了出来。以其它形式掩盖的工作，实际上

它还不外乎是一种游戏。

他们一拍即合，并为这建议的新颖而感到高兴。“妙极了”，大卫说。安娜和我做了花生奶油三明治作为当天下午的快餐；我们用安娜的防晒液抹了鼻子和耳垂，然后便出发了。

大卫和安娜上了绿色的独木舟，我和乔登上较沉的那条独木舟。他们仍旧不太会划桨，好在风不太大。我花了好大的精力去使船笔直前行，由于乔不知道如何掌舵，而他也不太肯承认这点，这就使事情更为困难。

我们从小径经过的那块石头标记旁划了过去，来到了一片群岛，它们是由沉入水中的山形成的，这些山的顶部仍露在水面上。在湖水还没漫起的时候，这里也许是一条山梁。它们中没有一个大到足以该得到一个名字的，有些只是岩石块。前方远处的一个岛是苍鹭的聚居地。我得尽量睁大眼睛才能看见它。鸟巢里小鸟们蛇形的脖子和扁平的头一动不动，象是在模仿枯树枝的形状。鸟巢全都筑在一棵白松上，就象郊区的平房那样鳞次栉比，这样好随时有个照应。如果苍鹭们离得彼此都够得着的话，它们便会打起架来。

“看见它们了？”我问乔，一边用手指点。

“看见什么？”他说，他正冒着汗，那是由于劳累过度了。我们是逆风而行的。他皱着眉抬头望去，可是一直都看不出它们来，后来有一只苍鹭站立起来，然后又稳坐下去，翅膀舞动着，为的是保持平衡。

位于苍鹭岛后面，有一个稍大而平坦的岛。几棵红松象水面上的桅杆直立其上并和浆果丛夹杂在一起。我们登上岸，系好小舟，然后我给他们每人一个锡杯。浆果刚刚开始

成熟。一颗颗掩隐在绿叶之中，就象雨点打在湖面上一样斑斑点点。

战时或在战后，人们从我们那边买一分钱一杯的浆果，那时没地方去花钱，我起初还不明白那些圆圆的金属片是做什么用的。正面是树叶，背面是从脖子上砍下的人头像。

我想起了从前来这里的其他人。即便在那个时候，这湖上的人也不多，政府把他们送往别处去了，是用车辆把他们集中起来运走的。不过，有一家人却留了下来，每年的浆果季节便出现在这个湖上，象我们一样来到这个好地方，似乎从天而降，五六人乘坐一艘几经风吹雨打的独木舟；父亲坐在船尾，瘦削而皱缩的头象干树根，母亲身体象葫芦，头发向后梳到脖子后，其余的便是孩子们或许是孙儿们。他们查看一番那里的浆果有多少，面容安详，和我们保持着距离。可当他们发现我们在采摘浆果时，便继续向前走去，不慌不忙地向岸边走去，转而消失或进入一片水湾里了，宛如他们从未在这个地方出现过一样。谁也不知道冬天他们住在哪里；不过有一次我们看见他们的两个小孩拿着锡罐站在路边卖浆果。我直到现在才想到当时他们一定很恨我们。

岸边的树丛沙沙作响：是乔从后面走过来的声音。他蹲坐在我身边的一块石头上；他的杯子里只装了三分之一多的夹着叶子的白色和绿色的浆果。

“休息一会儿吧。”他说。

“等一会儿，”我几乎摘了一满杯。天很热，湖上闪着耀眼的光；阳光下的浆果看起来湛蓝湛蓝，就象从里面点了灯似的。掉入杯中的时候象水珠一样发出叮当的声响。

“我们该结婚，”乔说。

我小心地把杯子放在岩石上，然后转过头去看他，用手遮着眼睛。我想笑出来，此刻，这样的问题提得不是时候，那不是他此次旅行所要达到的目的。那些法律术语，书面表格，以及誓言，尤其是最后的结局让人后怕；况且他把位置给搞错了，他本该事先问问我是否爱他，然后提结婚的事。我本该准备好回答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说，“我们反正住在一起，用不着证书证明结婚这件事。”

“我想我们还是结婚好。”他说。

“可这不会带来任何不同之处，”我说，“所有的一切都会和现在一样。”

“那为什么不干呢？”他靠了过来，此刻他思维极富有逻辑性，他正用某件事来威胁我。我四处打量着，寻求帮助，可他们在岛的另一端，安娜粉红色的衬衫只显得很小的一点儿，象加油站的旗子闪着光。

“不，”我说，这是合乎逻辑的回答。主要是因为我不想那样做，那会是使他满意的原因，那将是我勉强的，不情愿的牺牲。

“有时，”他故意一字一句，有板有眼地说，“我有种感觉，你对我毫不在意。”

“我在意得很，”我说，“我对你蛮在意的。”我用跳绳一样的节奏重复了一遍。不知道这样说是否相当于说我爱他。我在计算我银行里还有多少出门花的钱，我在计算需要多少时间打点行李，从而离开这泥土和灰尘，地下室发霉的气味，以及那可怕的、象人一样的坛坛罐罐，我还计算着多久以后才能找到新的地方。证明你的爱吧，人们说。你真地

要和我结婚，就让我和你上床吧。你真想上床，还是让我和你结婚算了。只要还有胜利的存在，我可以为此高擎起大旗，走在游行的队伍里，此刻我脑子里就是这样想的。

“不，你不在乎，我看得出来，”他说，不是生气，而是不高兴；那是很糟糕的事。我知道怎么对付他的恼怒。他的形体开始膨胀似的，从各方面看他都与往常不同了，于是我不由得惊慌起来。

“你瞧，”我说，“我从前结过婚，可没能行得通。我也有过孩子。”那是我的王牌。我说话语调耐心。“我不想重新经历那样的事了。”这是真的，可这些话从我嘴里说出来就象是电声娃娃嘴里说的机械语言一样，那种背部装有录音带的娃娃；所有的话题都不绕弯子，讲话内容都按部就班，象是一个卷轴。我有能力说出刚刚说过的话：我累了，失败了，我被注射了疫苗，得以保全下来，归到伤员那一类。并不是我没有忍受过痛苦，我诚心诚意地那样做了，我有资格说这些话。可婚姻就象在玩垄断独占的游戏，或是填字迷。你的想法要么象安娜的一样，要么就不是；而我已经证明我的想法不是那样，只是处于中立状态。

“我们在一起会不同的，”他说，无视我所提到的有孩子这件事。

婚礼上我们填了表格，姓名，年龄，出生地，血型。那是在一个邮局里进行的，一个地方官主持了仪式，以前的邮政局长的油画排列在米色的墙壁上。我还能回想起那些气味，胶水味，潮湿袜子的气味；穿了两天的衬衣的味道，烦躁的秘书用的结晶除臭剂，以及从另一扇门飘来的杀菌剂那令人发颤的气味。那是个热天，当我们走到阳光下，有一瞬间

眼睛什么也看不见；然后，那里有一群慢慢吞吞的鸽子在邮局喷水池旁那被人踩踏的草坪上啄食。喷水池上有几只海豚和一个小天使，小天使脸上有一部分缺损了。

“都结束了，”他说，“感觉好些了？”

他用胳膊拥住我，保护着我，防备着什么，是未来，然后在我额上吻了一下。“你身上冰凉，”他说。我的腿在抖，几乎站不起来了，而且有种疼痛的感觉，缓缓的象呻吟。“来，”他说，“我们最好把你弄回家去。”他抬起我的脸，在阳光下仔细地查看着，“也许我应该把你抱到车那边去。”

他象对待一个残疾人，而不是对待一位新娘那样对我说话。我一只手拿着钱包或是旅行包；另一只手紧握着。我们从鸽子中间穿过去；它们从我们周围飞了起来，象五彩纸屑。在车里，我没有哭，我不想看他。“我知道这很不容易，”他说，“可还是这样比较好。”他灵活的手放在方向盘上。方向盘整整转了一圈，车档则连锁反应起来，接着开始旋转，马达象钟表一样哒哒响着，那是理性之声。

“你为什么这样对我？”我说，控制不住自己，“你会毁了它的。”然后我便感到后悔和遗憾，好象我不小心踩了一只小动物，他是那么痛苦，他放弃和背叛了我曾一度认为是他的原则的东西，这样做为的是从我这里得到解放，可他什么也没有得到。

我抓住他的手，他让我握着它，冲我皱眉头，象块门前的擦鞋棕垫一样，闷闷不乐，“我配不上你，”我说，格言警句的词语印在打着卷的有吉祥物的小甜饼上。我吻了他的面颊。我在拖延时间，而且我也害怕他：他起身时，他看到

我眼神带着一种受挫之后的狂怒。

我们坐在外面鸡圈的围栏里，乔半背着我们坐在玩具沙箱里，慢悠悠地堆积着沙子，他吃完了馅饼，我们其余三人还在继续吃着。在屋里吃饭太热；我们不得不让火炉连续烧两个小时。他们一说起话或发起笑来，嘴上便露出紫色，牙齿也暴露出来。

“这是我吃过的最好的馅饼，”大卫说，“就象从前妈妈做的一样，”他咂着嘴摆出姿势，装出电视广告上的那副样子。

“得了吧，”安娜说，“你连一句小小的赞美之词也不会说，是不是？”

大卫咧开了发紫的嘴，“噢，”他说，“那是赞美呀。”

“去你的，”安娜说，“我遇到过你妈妈呢。”

大卫叹口气，向后靠在树上，转着眼睛看着乔，象是寻找同情似的，可他并没得到，于是抬头望着天空。“这便是生活，”过了一会儿他说，“我们该开辟一个聚居地，我是说在这儿组办一个团体，和其他人在一起，从城市单一家庭中独立出来。如果我们能把该死的猪一样的美国佬赶出去，这将会是一个很不错的国家，嗯？那样我们就能安静一会儿了。”

没有人回答他。他脱下一只鞋，开始若有所思地挠起脚心来。

“我想那意味着一种逃避，”安娜突然说。

“怎么会是逃避？”大卫说，非常宽容的样子，仿佛她打断了他的话似的，“赶走那些蠢猪吗？”

“胡说，”安娜说，“你根本不会。”

“你到底在说什么？”他说，假装受了伤害。可她抱膝坐着，鼻孔里冒着烟，我起身开始收拾盘碟。

“她每次俯下身我便会兴奋起来，”大卫说，“她的臀部很漂亮。我真他妈为她的整个屁股着了迷，乔，你不觉得她臀部很漂亮吗？”

“要就拿去，”乔说，他正把堆好的沙堆弄平，他仍然生着气。

我刮下碎屑扔进炉子里，洗了盘子，水变得蓝里透红，静脉管里血的颜色。其他人轻松自在地走进来；他们不愿意玩桥牌，围着桌子坐下，读着侦探小说和旧杂志，《迈克林之家》和《国家地理》，有一些已是十年前的了。我所有的都读过了，于是我拿根蜡烛走进大卫和安娜住的房间去找出更多的一些书来。

我得爬上床才够得着书架。那上面有厚厚的一堆书；我把它们搬到放蜡烛的地方。最上面一层是平装书，普通的那种，不过书底下有些东西放得不是地方：棕色的皮影集和母亲未用过的结婚礼物，变得发暗的银碗以及带花边的桌布一起放在城里的箱子里，还有从前下雨时我们画画用的速记本。我本以为她把它们扔了，不知谁把这些东西带到了这儿，是他们中的一个人。

那儿有好几本速记本，我坐在床上，随便打开了一本，那感觉就象我打开了什么人的私人日记。是我哥哥的；红色和桔黄色的爆炸物，悬在半空中支离破碎的士兵，还有飞机和坦克；他那时一定在上学，还知道在旁边画上纳粹标记。再往下是画在漫画本上的穿着斗篷的飞人，以及另一个星球

上的探险者，他花上好几个小时向我解释这些图画。那些棕色的丛林我已经不记得了，带着七个红色月亮的绿色太阳，长着鳞片、脊柱和触角的动物，还有一种吃人的植物，吞咽着一个不小心的受害者，嘴里还挤出一个泡泡糖一样的带有“救命”字样的气球。其他的探险者拿着武器在营救他：喷火器、喇叭型手枪、辐射枪。背影上是他们的宇宙飞船，布满了各种装置和设施。

下一本速记本是我的，我仔细地翻阅着，寻找着我自己的痕迹，希望能找到我来自何方或者从哪里开始走错；可那里面根本没有画，只是一些从杂志上剪下粘贴的插图。各种各样的女士：拿着清洁剂、编织毛衣的、微笑着的、摆弄着没有脚趾的高跟鞋，以及带有深色接缝的尼龙衣，还有药盒状的帽子和面纱。万圣节前夜，当你想不出该装扮成什么，又不想做鬼怪时才打扮成一位女士；这也是在学校里当他们问你长大以后想做什么时你的回答，“做个女士”或“当母亲”，两种回答都很安全；而且这也不是谎话。

我是想成为那样的人，其它书页上是一些从信件预约目录上剪下的女式裙子，里面没有身体支撑着它们。

我打开另一本，也是我的，早些时候的，画上的都是装饰华丽的万圣节彩蛋，单张的，集体的。有一些上面画有沿着绳梯向上爬的人形兔子；看来这些兔子住在蛋里面，顶端有门，它们上去后可以把梯子拉上去。较大的蛋旁边是一些由小桥相连结的小蛋，一页挨着一贡都是彩蛋和兔子，普通的，绿色的草和树环绕着它们，鲜花盛开，太阳在每张画的右上角，月亮对称地画在左面。所有的兔子都是微笑的，还有一些在狂欢和大笑；还有几只在蛋顶端安全地带吃着冰淇

淋。没有怪兽，没有战争，没有爆炸，没有英雄行为。我记不得曾经画过这些画。我对自己失望了，小时候我一定是个快乐至上的孩子，我想到，而且也很墨守成规，只对社会福利感兴趣，也许那是一种对天堂的幻想。

我身后有人走了进来，是大卫。“嘿，太太，”他说，“你在床上干什么呢？你是个顾客还是什么呢？”

“对不起，”我说，把影集放回到书架上，但我把速记本拿到了我的房间，藏在床垫下。我可不想让他们偷看这些速记本。

第 十 一 章

晚上乔老是不靠我睡的。他不打算作出让步。我把手指来回地在他那毛绒绒的背上抚摸着，意思是说我要休战。界限恢复到原来的地方，但他骤然从我身边抽开身去，并恼怒地发出呼噜声。我抽回了我的手，蜷曲成一团，思忖着如何挤开他：他只不过是床上的一个物体，就象一个袋子或一棵大萝卜。我父亲过去常说扒猫皮不止是一种方法；那使我感到厌烦，我不明白他们为何要扒猫的皮，哪怕是一种方法我也明白不了。我茫然地凝视着墙壁，我想起了一些人们常说的话：两个人可以玩那种游戏，匆忙结婚，闲暇时便后悔，少说为佳，传统的理智已毫无益处了。

早饭的时候，他对我对别人都毫不在意，只是把头埋在盘子里，含含糊糊地回答问话。

"他怎么啦？"大卫问，他的胡须刚刚长出来，于是他的两腮变成了棕褐色。

"别说了，"安娜说；但她看了看我，询问的神情，似乎是不管缘由何在我都脱不了干系。

乔用汗衫袖子擦了擦他的嘴，然后走出屋子，砰的一声关上了那带帘子的门。

"或许他是便秘吧。"大卫说，"便秘往往让人发脾气，你敢肯定他进行了足够的锻炼吗？"然后他象彼勃埃那

样摆摆耳朵走开去，嘴里叨咕着："哈，哈。"

"真蠢，"安娜嗔怪地说，她把他的头弄得乱乱的。

"嗨，别这样。"他说，"所有头都会掉下来的。"他跳起来走到镜子前，重新梳理了一下掉在他额前的头发；我直到他梳头时才注意到那样的发式是为了掩盖那些长在那里的斑点。

我收集起一些熏猪肉皮和掉落的吐司屑，把这些东西端出去放到喂鸟的盘子里。那些樫鸟都在那里，它们见我有食物，彼此便叽叽喳喳地传递着这一信息。我静静地站在那里，将手伸出来，但它们就是不飞下来；它们在头顶上飞，搜索着叼食的途径。也许我在无意识地晃动，你必须让它们深信你是一件东西，而不是它们的敌人。我母亲当时让我们在屋子里瞅它们，她说我们会把它们吓跑。人们曾经相信鸟要是飞来飞去那意味着有不祥的预兆。

我听见了一种象蚊虫叫唤一样的发动机声正在靠近；我把一大把面包屑放在盘子里，走出去张望。那是保罗的船，漆成百色，略成方形，是手工做的；他从船尾向我招手。和他一起来的还有另一个人，坐在船头，背朝后坐着。

他们把船拉进船坞，我走下台阶去迎接他们；我接住绳子，把船缚上。"当心，"我在他们走出船时告诫他们道，"有些地方已腐朽了。"

保罗给我带来了一大捆从他菜园里采摘的蔬菜，他递我一捆瑞士甘蓝，一篮子绿豆，一捆胡萝卜，还有类似头颅大小的花椰菜头，老人很不好意思地把这些交给了我。好象这些礼物不够体面难以让人接受似的。作为回报我应该拿出一样多或更多的各类蔬菜，但当想到那些已结出籽的花茎甘蓝

和小萝卜就发愁。

他说："这个人是他们派来找我的。因为我了解你父亲。"他向后退了一步，以使自己不被人注意，他差一点儿掉到船坞下面去。

他嘟哝了一句"马尔姆斯特罗姆"，好象那是密码一样；他快速地把手伸给我。我把瑞士甘蓝滑到肘弯处，握住了他的手，他的手则紧紧地握住了我的；让人感到非常有信心。"我叫比尔·马尔姆斯特罗姆，你叫我比尔好啦。"他的头发修剪得整整齐齐，嘴上留着行政长官常有的胡须，看起来象衬衫广告，伏特加广告；他的衣着相当入时，半新半旧，近于一套长官服。吊在他的脖子上的是装在山羊皮袋中的双筒望远镜。

我们朝陆地走去；他拿出一个烟斗，然后点上火。我不知道他是否从政府部门来的。"保罗一直告诉我，"他说，环顾了一下，"你拥有一个好地方。"

"那是我父亲的。"我回答。

他的脸拉长了，恰到好处地向下扭曲着，如果他戴着一顶帽子的话，他一定会脱帽的。"噢，是的，"他说，"真是个悲剧，"我不相信他；我无法辨别他的口音，他的名字听起来象是德国人的。

"你是哪里来的？"我问道，尽量显得有礼貌。

"密执安。"他说着，好象那是值得自豪的东西。

"我是美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底特律分会的一名成员；我们在这个国家有一个分会，一个非常繁荣景气的分会。"他朝我眨了眨眼，有些屈尊的神情。"事实上那就是我要和你讨论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伊利湖上的地位，嗯，正在

濒临灭绝。我相信我代表得了密执安的其余成员这样对你说：我们打算向你提供方便。”

“为什么呢？”我问。他的口气好象要我从他那儿买点什么，一本杂志或一份会员证之类的东西。

他把手中的烟斗画了个半圆，“这片可爱的地盘，”他说，“我们想征用这块地的目的是为了在这里建一个休养小旅馆，在这儿分会成员可以转达消息和进行观察。”他神气活现地说：“观察大自然的美，也许还可以从事一些狩猎或捕鱼的活动。”

“你想看看吗？”我问道，“我的意思是：那座房子和这里的一切东西。”

“我得承认我已经看过了；我们早已经注意起这个地方了。我多年来一直在这个地方捕鱼，好象没有人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能够在这里自由地漫步了。”他做了个动作，动作表现了很高的社会地位。然后他给出一个价码，这价码的意思是足以让我忘掉《魁北克民间故事》，儿童书籍和其他一切，至少可以暂时忘掉这些。

“你是不是要使这儿变样？”我问道，我预想到汽车旅馆和高层建筑将在这里诞生的情景。

“哎，我们当然必须在此地建一座发电站和一个防腐池；但除此之外，不，我希望我们能让这地方保持它应有的风貌。它已经是很特殊的，”他捋了捋他的胡须继续说，“乡村魅力。”

“很抱歉，这地方不出卖，”我说：“不是眼下，也许将来。”如果我父亲死了的话，他也许会接受这个建议，但由于一旦他回来时发现我把他的房子卖了，他肯定会气得暴

跳如雷。我不敢肯定我会成为这里的主人，一定会有隐藏着的契约，财产所有权文件，法律文件，我从来没有跟律师打过交道，我得在表格上或条款上签字的，我也许还得支付死亡税呢。”

“哎。”他带着失败者常有的口吻，诚恳地说：“我肯定这个建议还有考虑余地。你可能说，这是无限期的。”说着他掏出钱夹递给我一张照片，上面写着：“比尔·马尔姆斯特罗姆，特尼镇，儿童服装设计师。

“谢谢？”我说，“我会牢记于心的。”

我拉着保罗的手领他到菜园里去，好象是为酬谢他给我送来了蔬菜。我觉得我得解释解释，至少得对他解释一下，他已经替我受了不少累了。

“你的菜园，长势不怎么样啾。”他一边说，一边察看着菜园。

“不，”我说，“我们才拔完草；但我想给你拿……”我绝望地朝周围看了看，拔起一棵已枯萎的莴苣，递给了他，就连根须之类的也没摘除就递给了他，样子做得尽量得体。

他接受下来，眨了眨眼，很是沮丧，“太太会喜欢它的。”他说。

“保罗，”我放低了声音说：“我不把这地方出卖的原因是我父亲还活着哪。”

“是吗？”他顿时振作起来，“他回来了？他在这里吗？”

“不完全是，”我说，“此时他不在，他是出去旅行了；也许不久他就会回来的。”我所说的话此时此刻他也许一直

在听着，说不定他就躺在悬钩子新枝或燃火的后面呢。

“他朝森林的那边去的吗？”保罗问，他感到伤心的是他竟然没有和他商量就走了。他过去也常常走的。“你看见他了吗？”

“没有，”我说，“我们到这儿的时候他已经走了；但他给我留了一张纸条。”

“噢。”他说。他扭过头去紧张地看着林子里的动静，显然他不相信我。

午饭时，我吃的是保罗送来的花椰菜头和一些熏烤火腿罐头。吃桃罐头时大卫问：“那两个老头是谁？”他一定从窗户上看见他们俩人。

“那是一个买这地皮的人。”我回答说。

“我打赌他是个美国佬。”大卫说，“我可以在拥挤不堪的房间里一眼认出他们来。”

“是啊。”我说，“但他是一个野生动植物协会的成员，他就是为那个协会买这块地的。”

“牛粪，”大卫说，“他是个中央情报局挂名负责人。”

我笑了起来，说：“不。”说着给他看上面写着特尼镇的名片。

但大卫认真起来。“你没有见过我见他们的场面。”他隐晦地说，他回想起了在纽约的过去。

“他们要这个地方做什么呢？”我问。

“窥探基地呗。”他说，“鸟类观察员，双筒望远镜，说明这一点。他们知道这地方是个战时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地方。”

“那是再明显不过啦。他们目前正缺水，特别是干净的

水，他们把他们所有的水域都搞脏了，是不是？而净水我们国家却还有的是，这个国家，只要你看看地图，就会发现几乎都是水域。因此，在近期内，我假设它十年时间，他们就要面临无水危机，所以他们就会努力和政府做交易，让我们极便宜，甚至分文不收地给他们提供水，换来的则是更多的肥皂泡或诸如此类的东西，而政府会作出让步的，他们将象往常一样成为一小撮傀儡。但到那时，民主主义运动就会非常壮大，他们会强迫政府下台；代之于暴乱，或绑架，或诸如此类的行为。那时候美国猪就会派出他们的海军，他们将不得不这样做；纽约和芝加哥的人口就会象苍蝇那样下降，工业停滞，水上清水黑市就会应运而生，他们会用油轮从阿拉斯加运水。他们将取道魁北克进入我们的国家，到那时候就会出现分裂；激进主义分子甚至会帮他们的忙，他们将又闹起笑话来。他们将冲击大城市，切断联系，并占领它们，他们或许会杀死些孩子，而民族运动游击队将进入丛林并开始破坏美国佬所建立的疏水管。”

他好像对此非常肯定，似乎这一切已经发生。我想起了那些保留下来的手册。如果民族运动游击队员都象大卫和乔这样的人，那么他们就甭想度过几个冬天。他们不可能从城市中得到援助，他们实在太遥远了，当地人民也会冷漠下来，他们无所谓改旗易帜的事。如果他们在边远的农村进行努力，那么农民们则仿效他们拿起枪杆子。美国人甚至没有必要等到树木落叶，游击队便会死于饥饿和野外生活。

“你在哪儿弄到食物吗？”我问道。

“‘你’是什么意思？”他说，“我只是设想而已。”

我想着一旦事情结束，这等事将会怎样在历史书上出现

的情形：一个写着日期和对所发生的事情的简短的概括的段落。那就是高中时所学到的历史，一系列长长的战争，条约和盟国，还有人们如何从别人手里获得的或失去权力；但谁也不会去研究那些动机，他们为什么要这样，那样是好是坏。他们用很长的单词，诸如“分界”和“主权”，他们不说这些词什么意思，你也不能问：在高中时，正确的做法就是象看电影屏幕一样盯着老师，对于女生来说，提问题比男生更为糟糕。如果某个男生提一个问题，其他男生便会发出有嘲弄意味的啧啧声来；但要是某个女生提一个问题的话，别的女生会在下课后上厕所时说：“想一想你多么了不起啊！”在《凡尔赛条约》这个章节的书页空白处我画了些装饰品。卷着叶子的植物，心形物和星星，唯独没有画花朵。我不被人注意地画着，我的手指几乎不动。

那些将军和有历史意义事件的画面看起来轮廓更为清晰。如果你把眼睛凑得很近去看那些画片的话，他们便成了支离破碎的黑点点。

安娜在长凳上挤在大卫旁边，她抚弄着他的一只手。“我是否告诉过你有一个杀人犯的拇指？”她问。

“别打岔。”他说，但当她脸露出抱怨时，他便说，“是的，你说过，差不多天天都这么说。”说着轻轻地拍了一下她的手臂。

“他的手指末端平平整整的。”她向我们解释说。

“我希望你不会把这块地卖了。”大卫对我说。我摇了摇头。“好女孩，”他说，“你的心术还是挺正的嘛。”“她其他方面也不错，”他对乔说道，“我喜欢浑圆、充实和饱满。安娜，你吃得也太多了。”

我洗盘碟，安娜把它们擦干，就象往常一样。然而安娜突然说，“大卫是个可鄙的人。他是我所认识的最为可鄙的人之一。”

我环顾了一下她的周围，她的声音就象她的指甲那么细，我从未听她对大卫发这样的牢骚。

“何以见得？”我说，“怎么啦？”他吃饭的时候没说让她沮丧的话呀。

“我猜想你认为他对你过于热乎了。”她的嘴巴象青蛙嘴一样，双唇紧紧地往里抿着。

“不！”我感到迷惑不解地说，“我干嘛要那样想呢？”

“他所说的那些东西，你是知道的，就是有关你的臀部，非常饱满之类的话。”她不耐烦地说。

“我想他只是开开玩笑而已。”我也想过这一点，那只是个象挖鼻孔的习惯了，只是言语之事。

“开玩笑，他总是当我面对别的女人干这种事。如果可能的话他会在我的眼皮下奸污她们。正相反，他在别处和她们鬼混，事后却告诉我有关那种事情。”

“噢？”我说，我没有推想过。“为什么？我的意思是，他为什么要告诉你呀？”

安娜思忖了一会儿，她松开手中的抹布。“他说那叫做诚实。多肮脏的东西！当我发怒时，他说我嫉妒和占有欲太强。我不应该那么坦率。他说嫉妒是小市民的心理。那是合乎道德规范的产物。他认为我们都应该是乱搞男女关系的人，分享其中的乐趣。但我说由于这些基本情感的存在，如果你觉得有点事，你就该把它说出来，对不？”“那是一种信仰。”她注视着我，强烈要求我作出肯定的或否定的回

答。我没有把握，所以我不敢贸然回答。“他只装出他没有感觉到这些东西的样子。他非常冷淡。”她说，“但的确，他只是要在我面前表现出他不仅能做些事，而且还能摆脱它。我无法阻止他，所以为此而建立起理论都是为了掩盖这些无聊至极的废话。”她抬起头来，微笑说，又变得友善起来。“我想我该警告你，让你知道如果他刺伤你，或者与你没多大关系的事情，都由我出面好了。”

“谢谢你。”我说。她告诉我这些，我感到很遗憾，我仍然相信对于某人而言，人们所声称的好婚姻依然是有可能的。但她很善良，有头脑，我知道要是我处在她的境地，我可不能干。我要让她保重自己，我哥的管家老向我提醒动物园和疯人院的事。

第十二章

污水桶满了；我把桶拎到花园，将脏水倒进地沟里。乔脸朝下躺在船坞上；我去清洗桶时，他一动未动。在阶梯上，安娜从我身边走过，穿着她那件桔黄色的比基尼，为了日光浴，她把全身涂抹了一层油。

我把桶放在台子下。大卫正在镜子前面考虑他下巴上的胡子；他用一只胳膊搂住我的脖子，以一种奇怪的嗓音说："跟我一起到外面看看。"

"现在不行，"我说，"我有事。"

他做出一副遗憾的样子。"好吧，"他说，"以后再说。"

我拿出我的大夹子，坐在桌子旁。他趴在我的肩上问："乔在哪儿？"

"在船坞上，"我说。

"他好像有点儿不舒服，"大卫说，"也许他生虫子了；你回城里时，应该带他去看兽医。"过了一会儿，"我的玩笑怎么从来逗不笑你？"

他还呆在那儿不走，我拿出纸和画笔。最后，他说："好吧，大自然在召唤我。"然后象轻歌舞剧表演的结尾一样轻飘飘地走了。

我把油彩管儿的盖又盖上了，我不想工作：眼下他们全

都不在，我该寻找遗嘱、契约、财产所有权凭证。保罗一直确认他死了，这使我对自己的推测产生了怀疑。美国中央情报局一定为得到那块地把他干掉了，马尔姆斯特朗先生并不是没有道理；但那是可笑的，我不能没有理由地怀疑人。

我仔细检查靠墙长凳下的洞眼，又翻动了橱架以及存放着红葡萄酒的床下。他可能早把文件放在某一个城里银行的保险柜里，我将永远找不到它们。或者，他已经把文件都烧了。不管怎么说，它们不在这儿。

除非它们夹在书页之间：我翻动了高德·史密斯和鲍思所著的书，我捏住书脊抖动它们，然后我又想起了他那充满疯狂的图画。这是我认为他未死的唯一线索。那可能是合乎逻辑的隐藏处；他一直是有逻辑性的，疯狂只是你的现状的一种膨胀。

我把那一叠图画拿下来倒着查看。纸张很薄很软，象宣纸一样。上面几张画着手和鹿角状的东西，角落处总是乱划着数字，再往下看是一张很大的画，画面上是一轮半月，四根棍子从月亮里伸出来，顶端都是圆状的。我根据数字的写法将画正过来，于是它就成了上面载人的一艘小船，圆球是人的头。我为自己能读解这幅画而感到欣慰，它的确是有含义的。

但对下一张我却无所适从了。那个物体的形状很长，一条蛇或一条鱼；它有四个肢体或胳膊，一条尾巴，头上有两根角。横着看，它象一个动物，短吻鳄；竖着看，它更象一个人，但只是在胳膊和朝前看的眼睛几处。

彻头彻尾的精神错乱。我不知道这病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一定是由于雪和孤独，他使自己脱离正常越来越远，你

眼睛所看到的是，冬夜阴郁的寒冷，白昼耀眼的阳光，外层空间融化又冻结成不同的形状，你的头脑也开始做同样的事情了。他所画的就是他所目睹的，一种幻觉；或者那可能就是他自己，他以为自己所变成的样子。

我翻到下一张。但那不是一张画，而是一封用打字机打出来的信，我很快地看了一遍。写给父亲的信。

亲爱的先生：

非常感谢您托人转交的照片、摹图和通讯地址。这些资料非常宝贵，如果您允许，我将把其中的一部分用于我下一本该内容的书，它将使我的书生辉。在我这儿，您日后可能获得的任何发现的细节都是受欢迎的。

这儿还有一篇我最近的研究成果文章，你对此可能会有兴趣。

您的忠实的朋友

签名潦草难以辨认，还盖有一个大学的印章。信中夹着半打复印的纸张：《希尔德中部的石壁画》，作者罗宾·M·格罗夫。上面几张是地图、图表和统计数字；我快速浏览了一遍。文章的结尾处有三张照片，其副标题是《美学价值和可能的意义》。

主题分为下面几类：手，抽象符号，人，动物和神话书的生物。它们以拉长的肢体和极度的扭曲使人联想到儿童画。它的静态的刚硬与其它文化的

石壁画形成鲜明的对照，尤其是与欧洲洞穴画相比。

我们可以从以上的形体中推论出：这些画的作者不惜摒弃表达和形式来展示他们对象征意义的嗜好。然而我们只能对这些内容进行猜测，因为没有存留的历史记录。提供信息的人已经表现出与传统的冲突。有些人说这些画的地点是伟大的神灵的住所，这可能对为什么在偏远的地区人们还坚持给后代留衣服和小捆“祈祷”棍这一习俗加以解释。有人用很多事实证明这样一个理论：这些画与产生预言性的伟大梦想的禁食活动有关。

令人迷惑的还有其采用的技法。这些画看上去好象是用手指或粗制的画笔绘制出来的。主体颜色是红色，时而出现白色和黄色；这或许由于红色是印第安人的神圣颜色；也可能是由于铁氧化物的可用性。对粘合剂也进行了试验；可能是熊的脂肪或鸟蛋，也可能是血和唾沫。

这篇学术文章是有理性的；我的假设象沙堆一样坍塌了。这就是解答，解释：他总是可以做出解释。

他的图画不是原作，只是复制品。他一定把绘制这些画当成退休后的消遣，他是一位狂热的业余爱好者：假如他被这些石壁画钩住了魂儿，他会为寻找它们而仔仔细细地把这个地方走个遍，用他的相机收集它们，一旦他发现一个专家，他就会以信件纠缠不休；老年人的还继续有用的错觉。

我将手指用力按在眼睛上，让黑色四周缀上强烈的颜色。松开手，红色重新蔓延开来，象疼痛一样突然。秘密已

经被弄清，它从来就不是秘密，是我把它当成秘密，那容易得多。我的双眼睁开，我开始安排。

我想，也许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我不应该努力查明他是否被害。现在，我有难以辩驳的健康和死亡的证据。轻松，忧虑，我一定感觉其一。空白、失望：发疯的人可以从他们隐身的任何一个地方回来，而死人却不能，他们被禁止这样做。我试图回想起他，勾画出他的脸，他生前的样子，但我发觉我做不到；我所能想起的只是他举起的用来考我们的卡片：3 × 9 =？现在他就象一个数字、一个零一样地消失了，就象答案处的那个问号。未知的数量。他的方式。每件事都要经过衡量。

我低头注视着这些画，它们并列放在桌子上，我的两条胳膊为它们镶了边。我再一次注意看它们。那儿有一个空白，有某个未解释、被遗忘的东西。

我把前六张铺摆在桌子上，用我那阻碍了其它方面、被别人称为聪慧的东西来研究它们。注释和数字显然是一个地方的号码，这就是他留给我的一个谜，一道算术题；他教我们算术，母亲教我们读和写。学几何时，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圆规画花朵。他们曾认为：那样做你就能看见上帝，但我所看到的只是风景和几何形；如果你相信上帝是一座山或一个圆圈，事情还是一样的。他说耶稣是历史人物，上帝是迷信，而迷信是一种不存在的东西。如果你告诉你的孩子，上帝并不存在，他们就会被迫相信你就是上帝，但当他们发现你只不过是一个凡人，你不得不变老、死亡时，情形会是怎样的呢？复活就象植物，今天，耶稣基督又复活了，他们在主日学校唱歌，赞美水仙花；但人们不是洋葱，就象他

们所明智地指出的那样，他们呆在下面。

数字是一个系统，一个游戏；我该和他一起玩，这会使他看上去少点儿死亡。我把纸张排列成行，比较上面的注释，象珠宝商一样细心。

我终于在其中一张画的另一个鹿角形上发现了答案：一个我认出的名字，白桦湖。我们曾在那儿钓过鲈鱼，它以一个陆上运输线与主湖相连。我来到大卫和安娜的房间，那儿的墙上挂着一张地区图。在陆地的位置标着一个×和一个数字，与图画中的数字一致。名字则不同，白桦林湖，政府把所有英语名字都译成法语，虽然印第安的名字还保持不变。画面上散布着×，象一幅珠宝图。

我要去那儿证实一下，让图画与现实吻合；我不能假称这是一次钓鱼旅行，大卫自第一次尝试后还什么也未钓着呢，虽然他一直不死心。我们会有时间去那儿的，然后再回来。

我听见安娜的唱歌声由远至近，声音在爬台阶时减弱了。我回到了大厅。

“嗨，”她说，“我象不象被烤糊了？”

此时，她已通身粉红色，热得够呛，白色从衣服的边缘处显露出来，脖子把身体的颜色与脸的颜色区分开来。“有点儿，”我说。

“听着，”她说，口气变得关切了，“乔怎么了？我到船坞时，他一句话也没说。”

“他不爱说话，”我说。

“我知道，但这次不同。他只是躺在那儿。”她在寻求等待回答。

“他认为我们应该结婚，”我说。

她的眉毛象触角一样立起来。“真 的？乔？那不是……”

“我不想那样。”

“啾，”她说，“那太可怕了。你一定觉得很糟糕。”

她说对了；她把已被太阳晒过的防晒霜从肩上擦下来。“可以吗？”她说，递给我一支塑料管。

我并不感到很糟；我觉得自己对什么都不以为然，这已经很长时间了。也许我的一生都会是这样；但假如真是这样，我该不会注意到此项欠缺。我脖子的某处一定被封住了，可能是在池塘中冻的或是受过伤，于是就把我封闭在自己的脑袋里；从那以后，一切事情都从我身边擦身而过，这就象在一个花瓶里，或是象在这个村子里，在这儿，我能看到他们，却听不到他们说话，因为我听不懂他们所说的话。这也是观察者眼中的瓶内物体扭曲变形：甜酱坛子里的青蛙看上去很宽大，对那些盯着看我的人来说，我一定很奇特。

“谢谢，”安娜说，“我希望我不会脱皮。我想你该去和他谈谈。”

“是的，”我说。但她的眼睛里还流露着责备，我做得还不够，抚慰、赎罪。我顺从地向门口走去。

“也许你会处理好的，”她在我身后说道。

乔还在船坞上，但他已坐在船坞边上了，双脚浸在水里。我在他身边蹲下来。他的脚趾上有黑色的毛，象风仙嫩枝上的刺儿一样分布着。

“怎么了？”我说，“你不舒服吗？”

“你清楚得很，”过了一会儿，他说道。

“我们回城去吧，”我说，“就象以前一样。”我握住他的手，这样就能触摸到他的带茧的手掌，那是被方向盘磨的。

“你在与我兜圈子，”他说，眼睛还是不看我。“我需要的是干脆的回答。”

“关于什么？”我问。船坞的附近有些滑水人，水的压力将他们浮起；他们的双脚所划出的凹沟的一闪即逝的影子投在水下的沙子上，随着滑水人的移动而移动。他那受伤的感情使我窘迫，他还有感情，我应该一直认真对待他。

“你爱我吗？这就是一切，”他说。“我只在乎这件事。”

又是语言，我对语言的使用无能为力，因为它不是我的。他肯定知道自己要表达什么，但那是一个不准确的词；爱斯基摩人有五十多个关于雪的词，因为雪对他们至关重要，爱情也应该有同样多的名字。

“我想是这样，”我说，“在某种程度上，我爱你。”我绞尽脑汁寻找某种与我所说的话相一致的感情，但这就象认为上帝应该存在，而又不能相信一样。

“啾，我的上帝，”他说，抽回了他的手，“只说是或不是，别浪费时间。”

“我尽量说实话，”我说。那声音不是我的，它发自一个穿着我的衣服模仿我的人。

“事实是，”他伤感地说，“你认为我的工作一钱不值，你认为我是一个失败者，我不配爱。”他的脸扭歪了，那是痛苦：我嫉妒他。

“不是这样，”我说，但我无法说清楚，他需要的不只

是这些。

“回屋去吧，”我说；安娜在那儿，她会帮忙的。“我泡点儿茶。”我站起身来，但他没有跟着我。

炉子加热时，我从他们房间的橱柜上拿下皮革封面的相册，把它摊在桌子上。此时，我关心的已不是他的死亡，而是我的死亡了；也许我能弄清楚我以前的脸部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生动了一年、一天，然后凝固了。法国大革命前的一位公爵夫人突然停止大笑和哭叫，这样她的皮肤就不会发生变化或长皱纹，这很奏效，她死后留芳百世。

首先是祖父祖母的照片，远亲的前辈们，陌生人，全都是脸正对着镜头，恰似行刑队的队员：那时照相机还很罕见，他们也许认为他们的灵魂被盗了，就象印第安人认为的那样。照片下面是白色的标签，那是母亲细心的文字书写。结婚前的母亲，另一个陌生人，一头短鬈发，带着一顶手工编织的帽子。结婚照，紧身衣挤出来的微笑。我出生前的哥哥，然后我的照片开始出现。保罗在湖水解冻之前用他的雪撬和马带着我们在湖上游玩。我的母亲，梳着四十年代的怪发型，穿着她的皮夹克，站在盘子旁边喂鸟，她的一只手向前伸着；那儿还有樫鸟，她在训练它们，一只站在她的肩头上，用它那图钉一样圆的聪慧的眼睛偷看她，另一只站在她的手臂上，翅膀拍虚了。阳光透过松林射在她的身上，她的眼睛直视着镜头，一副受惊的模样，缩进脑袋的阴影里，而脑袋活象一个骷髅，那是光的恶作剧。

我看着自己越长越大。母亲和父亲交替在照片中出现，盖房子，墙壁，而后是屋顶，在花园中种植。照片四周镶贴着白纸，每个角都有一块透明胶水纸，它们就象一扇扇灰色

或白色的窗户，透过窗户能看到我所不能及的远处。大多数照片中都有我，被关在这些纸后面；或者没有我，只是不见人影的我。

在学校里拍的照片，我的脸与其他四十张脸排列在一起，身躯庞大的老师鹤立鸡群般地站在我们中间。我总是很快找到我自己，因为我总是因为乱动而被拍虚，或身子转向别的方向。再往后就是彩色照片，已被忘却的男孩，脸上长着丘疹，我穿着硬挺挺的衣服，有衬架支撑的裙子，带着薄纱，层层叠叠，活象商店里的生日蛋糕；最后，我终于出落得文明了，成为一件成品。她会说："亲爱的，你看上去真美。"好象她相信这点；但我并不相信，那时候我就知道她不欣赏平常人。

"那是你吗？"安娜问，放下手中的《斯德布利治的谜案》一书，"啾，上帝，我们竟穿过那种衣服。"

相册的最后几页是空的，黑色的纸张里随意夹着几张纸条，好象母亲并不想完成那项工作。在我穿上正规服装后，我就不再出现了；没有结婚照，当然，我们没拍结婚照。我合上封皮，抚平相册的角儿。

没有暗示，没有事实真相，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那时候，我一定很好；但从那以后，我让自己被割成两半。木箱中被锯成两半的女人，穿着浴衣，微笑着，借用镜子完成的魔术，这是我在一本喜剧书中所读到的；只在我身上发生了变故，我真的被锯开了。被锁起的另一半才有可能活着；我是错误的一半，分离的，末端的。我只是一颗头，不，我只是一根无足轻重的被割断的拇指，没有感觉。他们在学校里开过这样的玩笑，他们带来一个盒子，里面装着棉

花，盒底开了一个洞；他们把手指伸进洞里，假装那是一根死手指。

第十三章

根据大卫的手表，我们十点钟离开了船坞。天空蓝得象水彩画中的蓝天，空中的云，后面是白色，前面的中部是灰色。风从船后吹来，浪花追赶上来，我的胳膊举起、摆动、轻柔、不由自主，好象它们知道该怎么做。我坐在船头，象一座船头雕饰；在我身后，乔在对着水面刮胡子，独木舟破浪前行。

陆地的界线已经过去了，象展开的线性地图一样的地形逐步变成了岩石和树丛密集的地形峰顶，悬崖，东倒西歪的死树，苍鹭的形状恰象鸟的轮廓，乌饭树岛上竖立着松杉的桅杆。在下一座小岛上曾有一个设陷阱捕兽者的小屋，它用圆木搭成，用草来堵塞缝隙，地上堆着一堆曾被当作床的草；除了腐朽的木板，我什么也未发现。

清晨，我们交谈着，毫无意义，却用平静理智的语气，好象是在讨论电话费账单；这一切意味着，这是结束。我们还躺在床上，他的双脚伸出床外。我不能等到我老得不能再干这事的时候再结束这一切。

“等我们回到城里后，我要搬出去。”我说。

“如果你愿意，我搬出去，”他大度地说。

“不，你的陶器和东西都在那儿呢。”

“你可以用它们，”他说，“都归你了。”

他把这看成是一种力量的竞赛，就象学校里的孩子扭住你的胳膊问你服不服？服不服？直到你屈服；然后他们才放开你。他并不爱我，爱我只是他自己的一个想法，他需要有人同他合在一起，谁都可以，我无关紧要，因此我也不必在意。

中午了。我们在湖上一个凹凸不平的小岛上吃午饭。当我们登上小岛时，我们发现早已有人在光秃秃的花岗石突出的部位建了一个壁炉；地上到处都是垃圾，桔子皮、罐头盆，还有一堆臭哄哄的油腻腻的纸，人类的痕迹。这就象狗在篱笆上撒尿，好象这无名的水域和土地的无边无际促使他们要留下自己的签名，划出他们的边界，垃圾是他们完成此举的唯一东西。我把这堆杂乱的东西拣起来堆在一边，以后我要把它们烧掉。

“太恶心了，”安娜说，“你怎么能碰它们？”

“这是自由国家的标记，”大卫说，“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太小了。”

我们无须使用斧头，岛上到处都是树上掉下来的干燥的枝条和树干。我烧开水，泡了茶。我们从旅行袋里拿出沙丁鱼和苹果酱罐头，午饭是鸡汤面。

我们坐在树荫下，当风突然转向时，白色的烟和烧焦的桔皮味围着我们打转。我从火上取下铁罐，倒了一些茶；茶水上面漂着灰烬和草屑。

“先生们，”大卫说，举起他的杯子，“为女皇干杯。还记得在纽约的酒吧里，三个英国佬向我们走来，要和我们打架，他们以为我们是美国佬，冒犯了他们的女王。但我说她也是我们的女王，因而我们也有权力，最后他们给我们买

了酒。”

“我说你这样说会更公正点儿，”安娜说，“你该说‘女士们，先生们，为女王和公爵干杯’。”

“这和妇女解放没关系，”大卫说，他闭上眼睛，“不然的话，你就到大街上去。我可不想在屋子里有女权主义者，她们鼓吹随意阉割，她们成群结队地在街上野疯，手里挥舞着从花园里折下来的木棍。”

“如果你愿意，我和你一起去，”安娜开玩笑地对我说。

我说：“男人应该比女人优秀一点儿。”但他们谁也没听清我到底说了什么；安娜望着我，好象我出卖了她。她说：“你是不是被洗过脑？”大卫说：“什么玩笑？”又对乔说：“听见没有，你更优秀一点儿。”乔只是厌烦地哼了一声，大卫接着说：“你应该给他接上电线，这样，他才能出声。或者给他安装一个插座，戴上一个灯罩，他会成为一盏了不起的台灯。明年我要请他做一个演讲，题目是《陶器怎样交际》，他会走进大厅，两个小时里不说一句话，那会使所有的听众精神异常。”乔终于笑了，惨淡的一笑。

夜里，我一直需要援救，如果我的身体生来就能感觉、反应，就能有力地移动，某些延髓触处、蓝色的神经原、发亮的分子可能会通过紧闭的喉咙和脖腔膜渗入我的头脑里。据说，快乐和痛苦总是相依为伴的，但大多数头脑是中性的；没有神经，如同脂肪。我回想那些情感，逐个点出它们：快乐，安宁，负疚，轻松，爱和恨，反应，联系；感觉什么就象穿戴什么，你看着别人就会想起它。但唯一的是我的惧怕——我不是活着：一个否定，大头针的影子与你把它

扎进胳膊时它的形状之间的区别，在学校被困在书桌旁时，我曾那样做过，用钢笔尖，也用圆规，学英语和几何的工具，知识的工具；他们发现老鼠更喜欢感觉。我的胳膊内侧有斑斑点点的伤痕，象吸毒者的胳膊。他们把针扎进血管里，而我倒下了，这就如同掉到黑暗的水里，下沉到更深、更深的地方去；当我从麻醉的苍白绿色中醒过来，天亮了，我什么也记不起来了。

"别打扰他，"安娜说。

"这回我也许可以讲授一节短课，"大卫说。"对经商者，我要讲授怎样只用左手翻到《花花公子》最中间的一页，而闲着右手干别的；我要对家庭主妇讲授怎样打开电视，怎样改变她们的观念，这都是她们要知道的，然后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但他不会那样做，他需要救助自己，我们谁也不会披上斗篷，穿上靴子和防雷电的衬衣，我们都怕失败；我们背靠背地躺着，假装睡着了，安娜通过胶合板墙向虚无之人祈祷。浪漫喜剧书的封面总是一张流泪的粉面，象一根融化的冰棒；男人的杂志则是关于享乐、汽车和女人的，皮肤光滑如同软管内壁。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解脱，逃离情感。

"你的麻烦在于你恨女人，"安娜狠狠地说；她泼掉剩茶，茶叶离开她的杯子落入湖中。

大卫咧嘴笑了。"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反应迟钝。"

"高兴点儿，你生气的时候真可笑。"他四肢着地爬到她的身边，用他那胡须繁茂的下巴擦她的脸并问她是否喜欢被一头豪猪强暴。"你知道豪猪怎么干吗？"他问。"小心点！"安娜对他微笑着，好象他是一个脑子有病的孩子。

过了一会儿，他爬起身来，在原地跳跃，晃动着紧握的拳头尖叫，“猪猡！猪猡！”尽其音量所能。几个美国人途经这里回村子，他们的船在波浪中上下颠簸，浪花飞溅，旗子摇晃不止。由于风和马达，他们听不见他说什么，还以为他是在同他们打招呼，于是他们就摆手微笑。

我洗刷了盘子，向炉子上泼水，炽热的石头发出嗞嗞声，我们打点行装又出发了。水面比较险恶了，湖面上有白礁石，独木舟在我们身下滑行，我们不得不努力使它不至于船帮翻转过来；昏暗的水面上漂着水沫，那是精疲力尽的波浪。船桨击打水面，耳朵里灌满了移动的空气；呼吸急促，浑身冒汗，肌肉疼痛，不管怎样，我的肌体是活的。

风太猛，我们不得不改变航向；我们驶向下风岸并沿岸而行，尽可能靠近陆地，在礁石和浅滩的迷宫中蜿蜒而行。那段里程很长，但树木为我们遮挡一切。

最后，我们到达有陆地运输路线的那个狭窄的小湾；已是下午四时了，我们被风耽搁了。我希望我能找到那个地方，小径的端头；我知道它在另一侧。当我们转过山峰，我听到了声音，人的声音。开始，它象推进机的起动；然后它成了吼叫。链锯，我可以看到他们了，两个头戴黄色盔帽的男人。他们身后留下了痕迹，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棵树倒向小湾，树干象被刀刮过一样干净。

调查者、规划公司或者政府、能源公司。如果那是能源公司，我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他们要象六十年代那样抬高湖平面，他们测定新的湖岸线。抬高二十英尺。这次他们不会象以前那样砍倒树木，那样代价太高，树木就会躺在那儿腐烂。花园会消失，而小屋会留下来；这个土坡会变成被一片

枯树包围的贫瘠的沙岛。

当我们经过时，他们抬头扫了我们一眼，然后又继续工作，默然、冷淡。先进的人，代理人。树木向下倒时发出沙沙的断裂声，落地时碎枝叉乱飞。他们身旁的地上插着一根柱子，上面的红漆是新近喷上去的。湖对他们无所谓，他们只关心系统；可能是一座水库。战争期间。我什么也干不了，我不住在那儿。

陆地运输路线的靠岸处堆挤着浮木，潮湿，长满藓苔。我们从光腻腻的原木之间挤出通道，尽量向岸边靠，然后爬出船，蹚水前行，身后拖着独木舟，我们的鞋都湿透了。这对独木舟来说太糟糕了，它的龙骨被刮坏了。还碰掉了几处新刷的油漆。

我们从独木舟上卸下东西，我把桨拴在座板上。他们说他们负责帐篷和独木舟，安娜和我负责行李袋和剩下的东西，钓鱼杆，那个装着我早上逮住的青蛙的坛子，还有摄影器材。虽然我警告说，这样会把我们压趴下，但大卫还是坚持这样干。

“我们要把胶卷用完，”他说，“机器的租用期还有一个星期就满了。”安娜说：“但没有什么你要拍的东西。”大卫说：“你怎么知道我要什么？”

“那儿有一处印第安人的石壁画，”我说，“史前时期的。你可以拍拍那个。”这是一个兴奋点，它将连同酒瓶别墅和驼鹿标本一起成为他们搜集的意外收获。

“是吗？”大卫说，“太好了。”安娜说：“看在上帝的份上，别纵容他。”

他们以前都没走过陆上运输路线；我们得帮他们抬起、

平衡好独木舟。我说，他们也许应该猫着腰，两人在独木舟下面掮着船走，但大卫坚持说，他们可以对付得了。我说，你们该小心点儿，如果独木舟滑向一侧，而你又未及时跑出来，它会折断你的脖子。“怎么回事？”他问道，“你不相信我们？”

小径还未消失踪迹，泥地上有很深的脚印，皮靴印。一共有两行，只有往里走的脚印，没有往外出的：不管他们是谁，也许是美国人或者间谍，他们还在那儿。

旅行袋很重，为提防天气变化而使我们陷入困境，我们带了三天的食品；带子勒进我的肩膀，重压之下，我的身体前倾着，走路时，我的脚在湿漉漉的鞋里面咯吱咯吱地响个不停。

走在这条陆上运输线上面，我们首先要爬过一块很陡的岩石，分水岭，然后穿过一片蕨草和幼树丛，再往前是一个长方形的池塘，这是一个我们必须乘坐独木舟才能过去的浅浅泥坑。过了泥坑便是第二个陆上运输线。安娜和我首先到达池塘，我们卸下旅行袋；安娜吸完半支烟后，大卫和乔才赶上来，他们踉踉跄跄，左右乱撞，好象两匹被带上蒙眼的马。我俩扶住独木舟，他们从下面爬出来，呼吸急促，脸色彤红。

“真希望是那儿的鱼，”大卫说，用袖头擦去额上的汗。

“下一个陆上运输线短一点，”我告诉他们。

水面上漂着百合花浮叶，球状的黄色百合，长长的茎从水下伸出来。花周围满是水蛭，我能看见它们在褐色的水下缓慢地上下浮动。当船桨碰到水底时，汽泡从腐烂的植物中

冒上来，发出一股臭鸡蛋和放屁的味。空中蚊子成群。

我们到达第二个陆上运输路线，其标记是设陷阱捕猎者在树上刮下的树皮，由于时间的缘故，它几乎已经和树一个颜色了。我从船上下来，乔向前爬时，我站在那儿扶稳独木舟。

它就在我的身后，在看到之前，我先嗅到了；然后我听见苍蝇的声音。那很象是臭鱼味。我回过头来，它的脚被一根蓝色的尼龙绳缚住，头朝下被吊在一根树枝上，它的翅膀垂落张开着。它用被捣碎的眼睛望着我。

第十四章

“那是什么？”大卫问。

“一只死鸟，”安娜说，她用两个手指捂住鼻子。

我说：“是一只苍鹭。你不能吃。”我说不清楚它是怎么死的，子弹，石子砸的，还是用棍子打的。这儿对苍鹭来说是一个好地方，它们可以到浅水区去捉鱼，一条腿立着，用长长的尖嘴戳鱼。还未等鱼浮上来，它们已经逮住了它。

“我们需要它，”大卫说，“我们可以把它编排在鱼内脏那部分之后。”

“胡说，”乔说，“它太臭了。”

“在电影里看不出来，”大卫说。“你只须忍受五分钟，它看上去太棒了，你应该承认。”他们开始安装摄像机；安娜和我坐在行李上等着。

我看见它上面有一个甲虫，深黑椭圆；当摄像机喀嚓喀嚓地响时，它钻到苍鹭的翅膀下面。食腐肉的甲虫，死亡甲虫。他们为什么把它象一个私刑处死的受害者那样挂在那儿？他们为什么不把它象扔垃圾一样扔掉？他们可以这样做，他们有杀戮的权力。再者说，它是没有价值的：远距离看，它很漂亮，但不能驯养、烹饪或训练其讲话，他们与这样一个东西的唯一联系就是毁了它。食品、奴仆或尸体，受限制的选择；带犄角和毒尖的头被砍下来摆放在弹子房的墙

上，制成标本的鱼，战利品。一定是美国人干的；他们此时就在那儿，我们会遇见他们的。

第二条陆上运输线稍短一些，但上面的植物更稠密：树叶抽打，树枝伸向小径上方的空中，好象在阻拦我们。新近断裂的树桩，灌木和木髓象破碎的骨头一样伸出来，蕨草被践踏，他们就在这里。在我面前，他们的拖拉机压出来的凹痕恰象坑穴，火山口。透过树的缝隙可以看见湖水在闪光。我不知道我该向他们说什么，当我问他们为什么这毫无意义时，他们会说什么呢？但当我们走完陆上运输线时，他们根本没出现在视野里。

湖呈窄窄的月牙形，另一端是看不见的。白桦湖，岸边生长着一片片的白桦，最终会死于树癌，树的疾病，但不是现在。风摇动着树梢；风是从湖上吹过来的。水面荡起波纹，湖水拍打着滩岸。

我们又爬上独木舟向湖湾处荡去；我记得那儿有一块可供我们宿营的空地。途中碰到一些遗弃的河狸穴，其形状象是被损毁的蜂箱或木柴堆；我很熟悉它们，鲈鱼喜欢水下绞缠物。

我们到达的时间比我预计得要晚些，太阳已变红变弱了。大卫要马上去钓鱼，我说我们首先应该支起帐篷，拣些柴草。这儿也有一堆垃圾，但它们已在那躺了很久了，啤酒瓶上的标签已无法辨认，罐头盒已经腐蚀。往回走时，我拣了一个啤酒瓶，我要用它在树丛中挖茅坑。

厚厚的落叶和松针，厚厚的根须，潮湿的沙土。那曾经是城里最叫我烦恼的，洁净的瓷砖小屋中的圆嘴形的坐便器。有抽水设备的卫生间，真空吸尘器，它们吼叫着使东西

消失了，那时我害怕会有一台机器把人也那样给弄消失了，无影无踪，就象照相机那样，不仅偷走你的灵魂，还有你的肉体。控制杆和按纽，闸板，机器把它们抛向空中就象根茎上长出花朵一样；微小的圆和长方形，逻辑变得真实可见，如果你按一下它们，你不会预先知道将发生什么事情。

我指给他们三人看我挖的坑。"你坐在哪儿？"安娜问，吹毛求疵。

"坐在地上，"大卫说，"对你很合适，可以使你健壮。你的屁股可以大显身手了。"安娜用手指捅大卫的肚脐并说道："囊膪，"模仿着大卫的样子。

我又打开几盒罐头，把它们放在火上加热，我们就着冒气的茶水吃着炒豆子。从我洗涮碟碗的大石旁，我可以看见湖对岸的杉木丛中有一架帐篷，但我只能看见帐篷的一部分：他们的城堡。双筒望远镜瞄向我，我能感觉到通过手枪瞄准器向我的额头直视的眼波，那是为了防备我做出危险的举动。

大卫已经不耐烦了。他要对得起他为来此地的目的所花的钱，安娜说她愿意留在帐篷里；她对钓鱼不感兴趣。我们把防虫喷雾器留给她，我们三人带着钓鱼杆爬上了绿色的独木舟。我把装青蛙的坛子放到我可以够得着的船尾。这次，大卫与我面对面坐着；乔坐在船头上，他也要钓鱼，虽然他没有钓鱼许可证。

风减弱了，湖水呈粉红桔黄色。我们沿着岸边荡舟，白桦象冰柱一样悬在我们的头上。我感到头晕目眩，太多的水光和阳光，我脸上的皮肤象燃烧了一样闪着光。当我闭上眼睛时，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倒悬的苍鹭的影子。我本该把它烧

掉。

独木舟驶向最近的一个河狸穴，他们把独木舟缚到穴上。我打开工具箱，从里边拿出一些鱼饵递给大卫。他很高兴地吹着口哨。

“嘿！也许我能钓着一只河狸，”他说，“国徽。这才是应该放在国旗上的东西，而不是那片枫树叶，一只被劈开的河狸；我要向那样的旗致敬。”

“为什么它要被劈开？”我问。这就象活剥一只猫，我弄不懂。

他看起来很生气。“只是开个玩笑，”他说，看见我没笑，他又说：“你怎么会不明白？这是性生殖器的习惯说法。《永恒的枫树河狸》，那才叫妙呢。”他把钓鱼线沉到水里，开始唱起走调的歌：

从前，英国海岸上
走来勇敢的英雄沃尔夫；

“你们的学校也唱过这支歌吗？”

“鱼会听见你说话的，”我说，他闭上嘴。

身体的一部分，一只死动物。我不知道苍鹭属于他们的哪一部分，他们这么急切地杀了它。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漂浮的拖船，那种以前在湖上漂浮的拖船，船后拖着原木，人们在船舱中挥手，阳光和蓝天，美妙的景象。但这景象持续不长。有一年春天，我们去那个村子，发现它已紧靠政府建的码头，它被荒废了。我想看看那些小房子是什么样子，他们曾经怎样生活；我确信那儿有微

型桌子和椅子，折叠起来的床，花窗帘。我们爬进去；门是开着的，但里面只有木柴，甚至没刷油漆；根本没有家俱，炉子也不见了。我们所能发现的唯一的东西便是窗台上两把生锈的剃须刀，还有墙上的铅笔画。

我们以为它们是植物或鱼，其中一些的样子象蛤，但我的哥哥笑了起来，这就是说，他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我缠住他，一直到他向我作了解释。我震惊了，不是由于这些身体的部分，我们曾经听说过这些，而是由于它们可以从必须与之连在一起的身体上割下来，就好象它们可以使自己分离开去，只靠自身来爬行，象蛇一样。

我把这些已经忘掉了，虽然它们象洞穴画一样神奇。你把自认为重要以及你所捕猎的东西画在墙上。他们有足够的食物，没有必要去画豌豆罐头和阿根廷咸牛肉，而这些则是他们这次乏味的、毫无浪漫色彩可言的湖边旅行所必需的东西，除了打牌，无所事事，他们一定对来来去去被缚在原木上极为憎恶。如今，他们或老或死，他们可能互相厌恶。

两根鱼杆上同时有鲈鱼咬钩。它们奋力挣扎，鱼杆几乎对折。大卫钓上来一条，而乔却让他的鱼逃向木棍的迷宫，在那儿，它使鱼线绕在一根树枝上，拉不上来了。

“嗨，”大卫说，“替我把它杀了。”鲈鱼很凶猛，它在船里乱蹦乱跳。水从鱼腮中喷射出来，发出嘶嘶的声音；它不是害怕就是愤怒，我说不清究竟是哪一种。

“你自己杀吧，”我说，把刀递给他。“我曾经给你示范过，还记得吗？”

金属的碰击声，骷髅，没有脖子的身体，鱼是一个整体，我再也不能干那种事了，我没有权力那样做。我们不需

要它，我们的合适食物是罐头。我们干了这些事，侵犯，为了运动或娱乐，据说这是再创造，这些再也不是站得住脚的理由了。我父亲曾说，那是解释而不是借口，出色的马克思主义者。

当他们欣赏着大卫手下的凶杀、尸体时，我从工具箱中拿出那个装有青蛙的坛子，打开了瓶盖，它们跳进水里，绿中带黑的豹子花斑和金色的眼睛，它们得救了。上高中时，每张桌子上都有一个上面摆着一只青蛙的盘子，散发着乙醚味儿，它象小垫布一样平展地躺在那儿，已被剖腹开膛，内脏流了出来，分离的心脏还象亚当的苹果一样慢慢地吞咽着，上面未刻有烈士的字样，有趣的混乱的线。医院里，被腌制的猫贴了一身塑料，红色表示动脉，蓝色表示血管。如果你能找到虫子的大脑，把你的身体献给科学。他们对动物所做的一切也可以施用于我们相互之间，我们先在它们身上试验。

乔把他的断鱼杆甩给我，我在诱饵中寻找，找到了铅锤，另一个钩，替代物。

美国人已经转过山峰，银色的独木舟上坐着两个人，他们向我们划过来。我估价着他们，估价着他们的伪装，他们不是已经发胖的中年人，不是那些必须使用机动船和向导的中年人，他们年青，注意仪表修饰，具有杂志封面人物所具备的坦率和优雅的宇航员气质。与我们靠近时，他们启齿向我们微笑，露出两排牙齿，洁白得象假牙。

“钓到什么了吗？”前边的那人用中西部口音问道，传统的打招呼方式。

“好多呢，”大卫微笑地回答。我原本预料他会说点什

么来冒犯他们，但他没那样做。他们太硕大了。

“我们也一样，”前面那人说。“我们已到这儿三、四天了，它们不住地咬钩，每天都超过限定数量。”他们的独木舟船头上插着一面满是星星的旗子，微型移画印花法的玩意儿。这是在向我们显示：我们正在一个被占领的国土上。

他们的独木舟超过我们驶向下一个河狸穴。

射线枪鱼杆，面孔象宇航头盔般难以穿透，狙击手的眼睛，是他们干的；罪恶象锡纸一样在他们身上闪光。我回想起有关美国人的传说：他们在水上飞机的浮筒里装满走私鱼，他们的车装有假车底，干冰上有二百条湖真鳟，渔猎监督官偶然抓到了他们。“这是一个讨厌的国家，”当那位渔猎监督官拒绝接受他们的贿赂时，他们这样说，“我们决不再来这儿了。”他们喝得醉醺醺的，坐在他们的机动船上以追赶潜鸟来取乐，当潜鸟俯冲进水里时，他们又返回来，不给它起飞的机会，直到它被淹死，或被船的螺旋桨劈成碎块。愚蠢的杀戮，只是一场游戏；战争之后，他们活腻了。

落日褪色了，黑色从天空的另一半升上来。我们收拾好鱼往回划，共有四条，我削了一根丫形树枝来穿鱼腮。

“天哪，”安娜对我们说，“你们的味道活象鱼市。”

大卫说：“我真想喝点啤酒。我们也许能从美国佬那儿要一点儿，他们是那种人。”

我拿了一块香皂去湖边洗沾在我手上的鱼血。安娜跟了过来。

“啾，上帝，”她说，“我该怎么办？我忘记带化妆品了，他会杀死我的。”

我审视她：暮色中，她的脸泛着灰色。“也许他不会注意，”我说。

“他会的。也许现在发现不了，因为化妆品还未褪尽，但早晨时他会注意到的。他让我时时刻刻看上去都象一只雏鸡，如果不是，他就大发其火。”

“你可以把脸弄得脏兮兮的，”我说。

对此她未做回答。她坐在石头上，把额头抵在膝盖上。“他会为此而整治我的，他订了几条制度，如果我违反了其中一条，我就会受到惩罚，除非他不断地改变它们，因此，我向来拿不准。他疯了，他好象缺点什么，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高兴看我哭，因为他自己哭不出来。”

“但这回不会很严重，我是说化妆品的事。”

她的嗓子里发出一种声响，咳嗽或者是笑。“问题不仅限于此；他只是借题发挥。他时时刻刻盯着我，寻找借口。然后他不是不予理睬就是伤人地大作文章。我想，我这样说太可怕了。”冥冥暮色中，她的白眼球转向我。“如果我向他谈起这些事，他就会说一通挖苦人的话。他说我的头脑象日间电视节目里有关家庭问题的连续剧，他说那是我发明的。但你知道，事实不是这样的。”她请求我的裁决，但她又不信任我，她害怕我会在她背后向他提及此事。

“也许你该离开他，”我提出我的解决方案，“或者离婚。”

“有时我觉得他希望我这样做，好象是这样的。这曾经是个好主意，但后来我开始真的爱上他，而他忍受不了这个，他忍受不了我爱他。这是不是很可笑？”她肩上搭着我母亲的皮夹克，因为她没有厚毛衣，她就把它带来了。在安

娜的头边，它显得那样不协调，似乎缩小了。我努力回忆我的母亲，但一片空白；我所能想起的只是她曾讲给我的一个故事：她很小的时候，她和她的姐姐用雨伞为自己做了翅膀；她们从粮仓顶上跳下来，试图飞翔，她摔断了两腿的踝骨。她讲这故事时总是大笑不止，但那时，我却感到那故事使我发冷，使我忧伤，难以忍受的失败。

“有时我觉得他愿意让我死去，”安娜说，“我曾做过这样的梦。”

我们走回去，我燃起火，用奶粉拌可可。除了火焰以外，一切都暗下来，火星呈螺旋状升腾，下面的炭火在夜风的吹拂下闪着红光。我们坐在地上的毯子上，大卫用一只胳膊搂着安娜，我和乔相距有一尺远。

“这叫我想起了《导游女孩》，”安娜用那种我曾经认为是欢快的嗓音说道。她开始唱起来，声音迟疑，颤抖：

空中会有蓝鸟，
白鸽的悬崖，
明天，当世界自由时……

歌词飘进阴影，炊烟稀薄，蒸气飘浮。湖对岸，一只受阻的猫头鹰在鸣叫，急促、柔美，象羽翅拍打耳鼓；她的歌声被打断了，这是对她的否定。她朝后看了一眼：她感觉到它。

“眼下，每个人都在唱，”她说，拍起手来。

大卫说：“好了，晚安，孩子们，”他和安娜走进他们的帐篷。帐篷里亮了一小会儿，是电筒光，然后又黑了。

“来吗？”乔问。

“等一会儿。”我想给他点时间，让他先睡着。

我在黑暗中坐着，夜晚湖水的拍打声围绕着我。远处，美国人帐篷边的篝火还在闪耀，独眼巨人阴郁的红眼睛：敌人的战线。我希望恶魔光临他们：让他们受煎熬，我祈祷着，弄翻他们的独木舟，烧死他们，劈开他们。猫头鹰：回答，没有回答。

我从防蝇网处钻进帐篷；我摸索寻找手电筒，但没敢打开它，我不想打扰他。我用手摸着脱了衣服；他躺在我的身边，朦胧可见，一动不动，活象一根木桩。也许只有在这样的时刻才会有爱情这种情感，也就是说，在他睡着的时候，在他无所企求的时候。我用手轻轻地摸了摸他的肩头，就象触摸一棵树或一块岩石。

他并未睡着；他动了动，向我靠拢过来。

“对不起，”我说，“我以为你睡着了。”

“好了，”他说，“我服输，你赢了。让我们忘掉我说的一切，还象以前一样，好不好？以后我干什么都听你的。”

太晚了，我做不到。“不，”我说，我已经抽身出来。

他生气地紧紧抓住我的胳膊；而后，他松开了手。黑暗中，他的轮廓高了起来，我赶紧伏下身，他要打我；但他转了一个身离开了我，用睡袋把自己裹了起来。

我的心砰砰跳，辨析着粗帆布那边的声音。吱吱声，干树叶上的脚步声，呼噜声，夜间活动的动物；没有危险。

第十五章

帐篷顶是半透明的牛皮纸，早晨的露水打湿了它们，使它们看上去斑斑驳驳。鸟的歌声在我耳边鸣啭，宛如潺潺流水，空气中充满了液体音乐。

午夜的时候，乔大吼起来，他在做恶梦。我碰了碰他，这很安全，他被束缚在紧身睡袋中。他坐了起来，还未完全清醒。

"这间屋子不对，"他说。

"怎么了？"我问他；"你梦见什么了？"我想知道，也许我能记住这个梦。但他又钻回睡袋睡着了。

我的手就在我的身边；它上面还遗留着炊烟、汗水和泥土搅和在一起的味道，垂钓，过去的味道。那时，我们会把穿过的衣服浸泡在水里，洗掉森林的气味，用香皂和润肤露把自己覆盖起来。

我穿好衣服，走出帐篷，来到湖边，把脸浸到湖水里。这儿的水不象湖的主流的水那样清澈：它是褐色的，这是由于这儿有更多种类的生命更紧密地拥挤在一起，水似乎也更凉一些。水里的暗礁垂直向下，锋刃湖。我叫醒了其他人。

我把四条鱼洗干净、浸泡了一下，然后开始煎烤，我还煮了咖啡。鱼的肉是白色的，蓝色的是血管；味道象水面下的水和芦苇。他们吃着，不怎么讲话；他们都未睡好。

日光中，安娜的脸由于没抹营养露薄膜和胭红而显得干燥，甚至有点儿折皱；她的鼻子被阳光晒得脱了皮，眼睛下面有小碎褶。她一直避免与大卫面对面，但他好象并未注意到她的脸，他什么也没说，只有当她的脚碰到他的杯子，并将杯子里的咖啡洒到地上一些时他才说了一句："看着点儿，安娜，你越来越粗心了。"

"今天早晨你还想钓鱼吗？"我问大卫，他摇了摇头说："我们去拍摄那块大岩石吧。"

我把鱼骨烧了，鱼脊脆得象花瓣；鱼内脏种在森林里。它们不是种子，春天里不会长出活的小鱼。我们在岛上发现了鹿的骷髅，上面还有一片一片的肉。他说，狼群在冬天杀了它，因为它老了，这很自然。假如我们猛追它们，用牙齿抓住它们，在它们的土地上战斗，那将是公正的，但鱼钩是替代物，空气也不是它们的地方。

他们俩人不停地摆弄着摄像机，调整、讨论；然后我们出发了。

根据地图，石壁画是在靠近美国人帐篷的小湾上。看起来他们还未起床，他们的炉子还未冒烟。我想，诅咒可能奏效了，他们死了。

我寻找一个俯角，一条可以与地球上的线吻合的线。它在那儿，X的位置上，毫无疑问，具备垂直平面的悬崖，那种他们选来作画的岩石，视野内看不见其它平滑的岩石。他曾经在这儿，而远在他之前，第一批探险家在其身后留下了他们的踪迹，文字，但未留下其文字的含义。我倾身浏览悬崖表面；我们任独木舟左右摇摆，直到它撞到石头上。

"它在哪儿？"大卫问，而后又对乔说："你得把独木

舟弄稳点儿，岸上没有拍摄的好角度。”

“刚开始可能不容易看清，”我说，“褪色了。它应该在这儿的某个地方。”但它不在这儿，没有长鹿角的人，没有象红漆的东西，甚至一点斑痕都没有，岩石的表面在我手下延伸，纹理很粗，象月球表面似的，只有在横穿其上的石英岩脉处才有一条粉红色的断缝，一条对角线标志着陆地缓坡的开始；没有人的痕迹。

或者是我没有很好地记住地图，或者是他画在地图上的东西都是假的。我已经悟出其中的奥妙，按照他教给我们的方法解开了他的谜底，但它们却把我领到了死胡同。我觉得他好象欺骗了我。

“谁告诉你这儿有那种画？”大卫盘问道。

“我只是认为它就在这儿，”我说，“有人提到过它。也许是另一条湖。”过了一会儿，我恍然大悟：当然了，这条湖涨水了，它应该在水下二十英尺的地方。但那是另一条湖，这条湖是支流的一部分，分水岭分开了它们。地图显示：他是在湖的主流上找到它们的；根据那封信所讲，他已经给它们拍了照片。但我未在屋子里发现照相机。没有图画，没有照相机，我做得不甚对，我该重新查看一下。

他们很失望，他们希望找到好看或奇特的东西，找到他们可以利用的东西。他没有按规矩办事，他在欺骗，我要与他当面对质，要求他作出解释：是你说的它在这儿。

我们转了回去。美国人已经起床，他们还活着；他们已乘坐独木舟外出，前面那个人在船头处拖了一根鱼杆。乔和我坐在前面，我们从他们的右边迎上去。

“嗨，”前面的那人对我说，苍白的微笑。“运气好

吗？”那是他们的盔甲，温和无知，头脑空空象气球：以此他们可以保卫自己不受任何欺骗。绝对纯的毒品，他们直接把它注入静脉；我想象着他们触到了电流，一个个象倒栽葱的飞机一样倒下去。由于他们的存在，诚实被扼杀，我想他们的内心根本就没有可以限制他们的凶杀行为的情感，没有良心，没有怜悯。对他们来说，唯一有生命价值的就是他们那种类型的人，由适当的服装和鬼把戏组成的人，用薄片叠成的人。在那些以为某种动物是某一祖先的灵魂，或某个小孩是某个神的灵魂的国家里，一切都是不同的，至少，他们会感到内疚。

“我们没钓鱼，”我一字一句地说。我的胳膊要抡起船桨劈开他的脑袋：他的眼睛会开花冒出来，他的头颅会象一鸡蛋似的破裂。

他的嘴动了一下。“欧，”他说。“你来自美国的哪一地区？从你的口音听不出来。弗莱德和我猜想你们是俄亥俄州人。”

“我们不是美国人，”我说，为他们把我误认为是他们中的一员而愤怒。

“你不是在骗人吧？”他的眼睛一亮，好象他看见了一个真正的当地人。“你是这儿的人？”

“是的，”我说。“我们全都是。”

“我们也是，”后面那人出乎意料地说。

前边那人伸出手来，虽然我们之间有五英里宽的水隔着。“我是萨尼亚人，弗莱德是多伦多人，他是我的内弟。我们以为你们是美国人，从你们的头发和其它方面看。”

他们简直使我发疯，他们在伪装自己。“那你们船上的

那面小旗是怎么回事？”我问道，我的嗓门很大，这使他们很惊奇。前边那人缩回了他的手。

“那面旗呀，”他说着，耸了耸肩。“我是麦慈的拥护者，已经好几年了，我总是为劣势者鼓劲加油。那年，我去看比赛时买了这面旗，那年他们得了三角旗。”

我更仔细地看了看那面旗，那根本不是旗，而是蓝白相间的长方形，上面写着红字：“胜利属于麦慈”。

大卫和安娜从后面赶上来。“你们是麦慈的拥护者？”大卫问道。他把独木舟划到他们旁边，他们互相握手。但他们杀死了苍鹭。他们来自哪个国家无关紧要，我的头脑在说，他们还是美国人。他们正把我们引向歧途。他们象病毒一样蔓延，它们钻进大脑，取代细胞，细胞是从内部发生变化的，有疾病的细胞分不清是非。就象最近的一部科幻电影，来自外层空间的生物，这些肉体劫持者进入你的身体，取代你的头脑，墨镜后面的眼睛没有眼球。如果你外貌与他们一样，谈话与他们一样，思维与他们一样，那么你就是他们。我是说，你和他们讲同一种语言，你所做的一切就是语言。

他们是怎么进化的，第一个人是哪儿来的，他们不是来自其它星球的入侵者，他们是地球人。我们是怎么变坏的。对我们来说，当我们很小的时候，希特勒是起源，他是伟大的邪恶，象魔鬼一样魔爪挥舞、诡计多端、不可战胜。我听说他的时候，他已成为灰烬，只留下一颗牙齿，但这无所谓；我肯定他还活着，他在哥哥冬天带回家的书中，他在哥哥的剪贴簿中，他是坦克上的卐字饰，假如他能被摧毁，那么每个人都被拯救了，平安无事了。当我们的父亲点燃篝火烧

杂草时，我们就往火里扔木棍并唱道："希特勒的房子烧塌了，我美丽的女士，欧，"我们知道这很有效。为了对付他，人们使用过各种各样的恐怖手段。希特勒没了，但他却留下了一些东西；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尽管他们还在傻笑、摆手，我们还是驶离了他们，我还在问：美国人是否比希特勒还坏。这就象被割断的绦虫，断裂的几段还在生长。

我们回到帐篷边，卷起睡袋，拆卸帐篷，打点行装。我把茅坑填平，弄平上边的土，用树棍和松针伪装它。什么痕迹也未留下。

大卫想留下来与美国人一起吃午餐，一起谈论棒球比赛，但我说，我们要逆风划船，因而要抓紧时间。我催促他们。我要离开，离开我自己的愤怒，离开友好的金属宰杀器具。

十一点时，我们到达第一个陆上运输线。我的双脚在岩石和泥泞中行走，踩着昨天的脚印，原路返回；在我的头脑里，细丝和小径重新连结分支，除了希特勒以外我们还杀了其他人，我哥哥上学前听人讲起希特勒，于是游戏就变成了战争游戏。我们装扮成动物，我们的父母是人类，是可能向我们射击并抓住我们的敌人，我们需要躲避他们。但有时动物也有力量：有一次，我们是一群蜜蜂，我们咬掉我们最不喜欢的洋娃娃的手指、脚和鼻子，撕开棉布做的躯体，扯出里边的填充物，那里边与床垫的里边一样是灰色的棉花；然后我们把她扔进湖里。她漂浮着，他们发现了她，她问我们她是怎么丢的，我们撒谎说我们不知道。杀戮是错误的，我们曾被这样教导：只有动物和食物可以被杀。洋娃娃当然没有受伤，它不是活物；虽然孩子们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是活

的。

途中的池塘边还挂着那只苍鹭，灼热的阳光下，它象肉店橱窗里的什么东西，被亵渎、被辱骂。味儿更难闻了。头部周围，苍蝇在震颤，留下了它们的卵。一个故事说，一个能与动物交谈的国王吃了一片有魔力的叶子，是动物们泄露了珍宝，这是一个阴谋，它们救了他的命；它们会说什么呢？谴责，恸哭，愤怒的长嚎；但它们没有发言人。

我产生了同谋犯的感觉，我的手上沾有血迹，象胶水一样粘，好象我曾站在那儿旁观而未说“不”或做点什么来予以制止；人群中一张静默谨慎的面孔。有些人的麻烦在于他们是德国人，而我的麻烦则在于我是人。一般来说，一只死鸟所引起的烦恼比报纸上的战争、暴乱和凶杀所引起的烦恼还要强烈，这看起来很愚蠢，但战争和暴乱总有可解释的理由，人们著书论证它们发生的原因；而苍鹭的死却是不折不扣的没有理由。

实验室，他已经老了。他从未逮过鸟，它们对他来说速度太快了，他所抓到的都是速度很慢的东西。他把它们装在坛子和罐头盒里，放在森林后面、沼泽附近的一排木板架上；通往那地方的小径是秘密的，一种密码。有时候，他忘记去喂养它们，或者是由于晚上太冷，因为有一天我独自走到那儿，一条蛇已经死了，还有几只青蛙已是皮肤干裂，黄色的肚皮鼓得圆圆的；蝌蚪漂浮在混浊的水面上，腿象蜘蛛一样向上伸着。我把这些瓶子里的东西都倒进沼泽里。另外一些东西，还活着的那些东西，我把它们放生了。我把这些坛子和盒子洗刷干净，把它们排列在木板上。

午饭后，我藏了起来，但我最终还是得出来吃晚饭。他

不能在他们面前说什么，但他知道那是我干的，不会是别人。他气得脸色发白，他的眼睛扭曲着，好象它们难以看见我。“它们是我的，”他说。后来他又逮了一些，并且改换了放置的地点；这次，他不会告诉我了。我还是找到了那个地方，但我害怕再把它们放跑。那是由于我害怕它们被残杀。

我不希望有战争和死亡，我希望根本不存在这两种东西；我只要兔子和它们多彩的蛋形房子，太阳和月亮依次悬在平坦的地球上方，长久的夏日，我希望每个人都快乐。但他的画更确切，武器、支解的士兵；他是现实主义者，这对他有保护作用。他曾有一次差点儿被淹死，但他不允许那样的事再次发生，当他要离开人世时，他准会一切就绪。

水蛭还呆在微热的池水中，一群群幼水蛭象手指一样附在百合浮叶的茎上，大一点儿的在游动，象面条一样平滑柔软。我不喜欢它们，但反感不能成为什么理由。在湖对岸，我们游泳时它们从不打扰我们，而我们却逮住色彩斑驳的那种，他称其为糟糕的种类，当我的母亲看不见的时候，他就把它们扔到篝火里，她严禁残忍行为。我对此并不十分在意，假如它们只是去死；但它们却痛苦地扭曲着爬出来，身上沾着灰烬和松针，往湖里游去，好象它们能嗅出湖水的位置。他会用两根木棍把它们夹起来再放回火焰中。

这并不是那座城市的毛病，我们并不比校园中的调查官好，我们只是有不同的受害者。再次成为一个小孩，一个野人，一个破坏者；这也存在于我们之中，这是天生的。某种东西锁闭在我的头脑里，手，神经原触处，它截断了我的逃跑之路；那是一条错误的路，是入口，赎罪无所不在，我一

定是忽略了它。

我们到达湖的主流，又往独木舟上装东西，然后把独木舟随意放在原木堆上。小湾上倒伏的树木和无数的树墩显示出调查者曾涉足于此，那是能源公司。我的国家，被卖或被淹，变成了一个水库；人也和土地、动物一起被卖掉，讨价还价的买卖。他们称其为买卖、售缺，洪水会取决于谁被当选，不是这儿，而是另外什么地方。

第十六章

这是第六天了，我要查出个究竟：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明天伊文斯要来接我们了。我的头脑在急速运转，它抑制住败兴的事情，用深思熟虑和数字充填空白处，我要了结这件事，我从未干成什么事。更准确地说，要把自己凝聚成一个针尖，刺穿事实。

我迫不急待地又翻阅了一遍地图。X就是在那个位置，我没有弄错。我只能停留在猜测上了；即，有些X可能表示他认为适合作画而尚未查看的地方。我的手指掠过湖滩，寻找最近的标记处；那是第一天晚上我们钓鱼的那块峭壁，它可能在水下，我得潜水了。如果我能找到什么，那就能为他辩白，我就会明白他是对的；如果找不到，我就试第二个X，靠近苍鹭岛的那个地方，然后是下个X。

我已穿好泳装；我们刚才一直在洗衣服，在带棱的洗衣板上揉搓，用过期的黄肥皂去尘，站在湖边漂洗。现在这些衣服被衣服夹夹着挂在小屋的后面风干着，衬衣，工作裤，袜子，安娜的花内衣，我们抛甩的皮肤。安娜看上去最放松，歌声从新涂抹的化妆品外壳下传出来。她蹲在湖边用洗发精洗去头发里的烟味。为了防备美国人，我披了一件衬衣。离开之前，我再一次找寻他的照相机，那架他想必用来拍摄那些照片的照相机，但它不在这儿；他一定把它带走

了。在那一次，最后一次。

还未等我走下台阶我就看见了他们。他们三人正在船坞上，透过树缝我看见了他们的部分身躯。安娜穿着比基尼跪坐在那儿，头上蒙着一块手巾，活象一个尼姑；大卫站在她的旁边，双手叉在腰上，乔手里拿着照相机坐在稍远的地方，两腿悬在半空，头歪向一边，好象客气地等他们走过去。当我听见他们的话时，我站住了。独木舟就在那儿，我需要其中的一条，但那太危险了。那是风平浪静的一天，谈话声传了过来。

“来，把衣服脱掉，”大卫说，用他那轻飘飘的幽默语气。

“我没惹你。”安娜声调柔和地说，躲避着。

“伤不着你的，我们需要一个裸体女人。”

“该死的，干什么？”安娜有点发怒了，带面罩的脸扬了起来；她的眼睛一定眯着。

他们拍摄了世间万物，此地已没有什么可让他们拍照了，除了相互拍照，下一个该轮到我了。“我把你编排在死鸟旁边，这是你成为明星的机会，你不是总期待成名吗？你会上电视教育节目的。”他说，好象这是特殊的贿赂。

“啾，看在上帝的份上，”安娜说，她又拿起身旁的凶杀小说，假装读起来。

“来吧，我们需要一个大奶头大屁股的女人，”大卫继续用柔和的语调说；我听出了那种带有威胁的温柔，在学校时，每当他施诡计之前，他都要使用这种语调说话。

“听着，你能让我独自呆一会儿吗？”安娜问道。“我在做我自己的事，你为什么不能去做你的事呢？”她起身站

起，毛巾滑落下来，她想从他的身边走过去，但他从旁边赶上去拦住了她。

“如果我是你，她要是不愿意，我可不强迫她，”乔说。

“这是假装拒绝，”大卫说，“她愿意，她从心底里愿意展览自己，她喜欢性感的身体，是不是？尽管她已有点太胖了。”

“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安娜说，好象她在解一个谜底。“你要羞辱我。”

“我们为什么要羞辱你的肉体，亲爱的？”大卫抚爱地说。“我们全都喜欢它，你为它感到难为情吗？你也太小气了，你应该分享财富。”

此时，安娜已气得发疯，遭到刺痛，她的嗓门提高了。“滚开，你什么都想要，是不是？别在我身上打主意。”

“为什么不能？”大卫平静地说，“赶快象一个好女孩那样脱了衣服，不然的话，我替你脱。”

“别碰她，”乔说，晃动着他的腿，是厌烦还是兴奋，没法分清。

我想跑过去制止他们，打架是错误的，我们没有权力这样做，如果打了起来，双方都要受到惩罚，就象在真正的战争中一样。因此，我们秘密地战斗，从不声张，而过了一阵以后，我也不会再打下去，因为我从未赢过。唯一的手段就是逃跑，踪影不见。我在台阶顶部坐了下来。

“住嘴，她是我的妻子，”大卫说，他的手紧紧钳住她的手臂。她跳开身去，然后我看到他用胳膊搂着她，好象要亲吻她似的，她被举了起来，头朝下趴在他的肩膀上，潮湿

的头发象一根根绳子一样垂落下来。“说吧，”他说，“脱还是被扔进湖里？”

安娜的手紧紧抓住他的衬衫，“如果我掉进湖里，你也跟着，”声音从垂落的头发中喷射出来，她在乱踢，我看不出她是在笑还是在哭。

“快照，”大卫对乔说，又转向安娜，“我数十个数。”

乔把照相机对准他们，就象把发射筒或奇怪的刑具对准他们一样，然后按下了快门，邪恶的嗡嗡声。

“好哇，”强制之下安娜说道，“你这个杂种，该死的。”他放开她，走到一边。象一只四脚朝天的甲虫一样，她的胳膊忙乱地寻拢衣带，乳罩已被扯下来了：她的两个乳房从一棵细树两旁露出来。

“下面的也掉了，”大卫好象在和一个倔犟的孩子说话。安娜看了他一眼，充满蔑视，她弯下腰去。“看上去很性感；摇一摇，给我们跳个舞。”

安娜站了一会儿，然后她用中指指着他们，向船坞的另一头跑去，她跳进湖里。那是腹部着水的跳水姿势，水花飞溅象鸡蛋掉在地上。她钻出水面，头发一缕一缕地粘在前额上，她向沙滩游去，胳膊拍打水，动作不甚灵活。

“照下来了吗？”大卫回过头问道，口气温和。

“照了一部分，”乔说，“也许你应该命令她再来一次。”我想他那是讥讽，但我不能肯定。他开始把照相机从三角架上卸下来。

我可以听见安娜的击水声，以及跌倒在沙滩上的声音；现在她真的哭了，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树丛沙沙作响，她诅咒着；然后她又出现在山丘顶部，她一定是扯着树枝爬上去

的。她的粉脸已经融化，皮肤上沾着沙子和松针，象一只被烧的水蛭。她径直走进小屋，既未看我一眼，也未说一句话。

我站了起来。乔已经走了，但大卫还在那儿，盘腿坐着。我走过去取独木舟。

“嗨，”他说，“干什么？”他不知道我一直在旁边观看。他脱了鞋，用手撕脚指甲，好象什么事也未发生。

大卫和我有相似之处，我想，我们都是那种不知道怎么去爱的人，我们身上缺少关键的东西，我们生来就这样，商店里一只手的太太，心脏萎缩。乔和安娜很幸运，他们的爱情不成功，并为此而痛苦；但能看见总比瞎眼强，虽然那样做，你不得不允许犯罪和凶残介入。或者我们也许是正常人，而那些有能力去爱的人才是畸形的，他们有额外的器官，象两栖动物额头上那只发育不全的眼睛，它们从未派上用场。

安娜的比基尼扔在船坞上，绉绉巴巴，蜕皮的蝴蝶。他捡起乳罩，开始在带子上打褶，然后又抚平。我并不想就此对他说什么，这不关我的事，但我发现我还是问了他。“你为什么那样做？”我的语调是中性的，我发现我这样做不是为了安娜，我并不是在保护她，这是为我自己，我需要弄明白。

过了一会儿，他才有反应。“什么？”他说，一脸微笑，一副清白的样子。

“你刚才对她干的事。”

他使劲盯着我，看我是否在观察他，但我在解开独木舟的缆绳，我象一面墙似的没有人格，一间忏悔室，这使他放

心了。“你知道她对我做了什么，”他略带牢骚地说。“她自己找的，是她使我那样干的。”他的语气变得油滑起来。“她与别的男人来往，她以为不会被人发现，她太笨了，每次都被我发现了；我可以从她身上闻出来，上帝知道，这并不是因为我嫉妒。”他大度地笑了笑。“但她误入歧途，这叫我受不了。”

安娜没告诉我这事，她有所隐瞒；或者是他在撒谎。“但她爱你，”我说。

“胡说，”他说，“她倒是想把我的眼珠抠出来。”他的眼睛里悲哀甚于仇恨，好象他曾深深地相信她。

“她爱你，”我又重复说，雏菊上落下来的花瓣；这是一个神奇的字眼，但它并未起作用，因为我对此没有信念。我的丈夫曾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句话，就象天气查询台的答语，他曾努力把那句话刻在我心上；他那时也有同样的迷惑，好象我是一直伤害他的人。偶然事故，这是他说的。

“她从来未对我说过那种话，”他说。“我有一种感觉，她要离开，她在等待机会离开。但我还未问过她，我们很少交谈，除了有别人在场。

“也许你该问问她，”我说；我未被说服，也说服不了别人。

他耸了耸肩。“我们谈什么呢？她太笨了，她听不懂我对她说的话，上帝啊，她看电视的时候嘴唇不住地动。她什么也不懂，每次她张嘴说话都使自己成为白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他说，几乎是在申辩，“但我非常赞成妇女平等；但她却碰巧平等不了，那不是我的错，是不是？跟我结婚的是一个傻瓜，我被她摆布而和她结婚，那时我正在为职

业而学习，那个时候，谁懂得都不多。但那是生活。”他摸了摸他的胡子，发出沃蒂·沃德派克式的笑声，他的眼睛令人不解。

“我想你该处理好这件事，”我说。我把船桨支在船的上缘上，爬上了独木舟。我想起安娜所说的有关情感义务的话：他们造就了一个情感义务，他们互相仇恨；那一定几乎象爱情一样使人神情贯注。木房中的气压表夫妇，密藏在保罗门廊的壁龛里，我的理想；除非他们被粘在那里，被罚前后摆动，太阳和雨，没有逃脱。他再看见她时，不会有公开认错，不会有煞费苦心的和好或谅解，他们没能力那样做。他们谁也不会提及此事，他们已达到一种近似和平的平衡。我的父母站在小屋后的锯木架旁边，母亲扶着树干，白桦树，父亲拉锯，阳光透过树叶洒在他们的头发上，神的恩典。

独木舟移动了。“嗨，”他说，“你去哪儿？”

“喏……”我指了指湖。

“要不要尾桨？”他问，“我干得不错，可以说经验丰富了。”

他的语气里带着渴望，好象他需要有人和他作伴，但我不想让人跟着我，我得解释我要做什么，而且他也帮不了忙。“不，”我说，“但还是谢谢你。”我跪下来，将独木舟斜到一边。

“好吧，”他说，“一会儿见，短吻鳄，”他伸直腿站了起来，从船坞上滑下来向小屋走去，他的条格T恤衫在树林间跳跃着，当我的独木舟驶向宽阔的水域时，他向后退去。

第十七章

我向峭壁划去。阳光斜射，还是早晨，阳光不是黄色而是清澈的白色。头顶上有一架飞机，那么高远，我几乎听不见它的声音，它用尾部喷出来的气把座座城市连成一线；空中的一个×，非神圣的十字架。我们第一天晚上钓鱼时看见的那只苍鹭还悬在空中，脖子和腿伸着，翅膀向外张开着。蓝灰色的十字，这也许是另外一只苍鹭，或许就是那只，肢体残损地挂在树上。它是否愿意死，是否赞成死亡，耶稣是否愿意死，所有代替我们忍受痛苦和死亡的东西都是耶稣；如果他们不杀死鸟和鱼，他们就会杀死我们。动物死去而我们可以活下来，它们是人的替身，冬季里猎人杀死的鹿也是耶稣。我们吞吃它们，罐装的或别的；我们是食死亡者，死亡的耶稣又在我们身体内复活，保证我们的生命。罐装的斯伯姆，罐装的耶稣，甚至植物也一定是耶稣。但我们拒绝敬奉；肉体用血和肌肉来敬奉，但圆头中的东西不敬奉，意志不敬奉，脑袋是贪婪的，它只消费但不致谢。

我到达峭壁。那儿没有美国人。我沿着它的边缘划船，测量潜水的最佳地点：它面朝东，太阳正照射在上面，这是一天中最合适的时机；我要在左手处开始。独自潜水是危险的，应该另外有一个人。但我记得以前的事：我自带着独木舟或者用偶遇的木头和木板头做木筏，而它们的绳子会经常

断裂，春天冰雪融化的时候，它们会失踪不见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有时会再次看见它们，象冰川碎块一样漂浮着。

我放好船桨，脱下衬衫。我该在距峭壁几英尺以外的地方潜水：不然的话，我会冒撞坏脑袋的危险，峭壁看上去是垂直伸入湖底的，但水下也许有隆起突出的部位。我在船尾的坐位上双膝跪下来，脸朝后，双脚各蹬船的一侧船缘，慢慢地站起来。我弯曲双膝，然后双腿一蹬，独木舟象弹跳板一样踉跄了一下。我的另一个形状进到水里了，不是我的反射而是我的影子，按透视法来说缩短了，轮廓模糊不清，头部四周射出无数光线。

我的后背象被鞭子抽了一下，我落入水中，双腿踢打着向下沉，穿过湖的水层下滑，由灰色到深灰，由凉爽到冰冷。我弓身闪到一旁，岩石隐隐呈现在面前，灰褐中搀杂着粉红；我绕着它查看，用手指触摸它，蜗牛在细长表面的触摸，水使我的眼睛难以专注。我的肺开始收缩，我卷曲身体浮上水面，象青蛙一样呼气，头发散落在我的脸上，我向独木舟游去，它被水和空气分割开来，调停者和救生筏。我用身体把独木舟压偏，然后翻身爬进去休息；我什么也未发现。我的胳膊由于前一天的劳作和今天新的努力而疼痛，我的身体处于困惑状态，它对动作的记忆是不完整的，就象病愈后学走路。

我等了几分钟，我把独木舟向前划了一点儿，又潜下水去，我使劲瞪着眼睛看着，不知自己要看什么形状的东西，指印或动物，蜥蜴形身体上长有角、尾巴和朝前看的眼睛，鸟或用木棍做船桨的独木舟；一个小东西，一个抽象，一个

圈，一轮月亮或一根长长的变形的身躯，僵硬和孩子气，一个人。气泡冒上来，我钻出水面。不在这儿，它一定在再往前或更深的地方；我确信它就在那儿，他不可能毫无理由地在地图上有条理地作记号和写数字，那是不一致的，他总是遵守他自己的规则、规律。

我再一次潜下水，我想我看到了它，当我向上升时，我看见了一个小凸包，一个阴影。我感到头晕，我的意识开始模糊，休息时，我的肋骨砰砰跳，我应该停下来，至少半小时；但我还是兴高采烈，它就在那下面，我会找到它的。我不顾后果地平衡身体跳下水去。

墨绿色，然后是黑色，过了一层又一层，比以前更深，海底；水好象变稠密了，水下面，针尖大小的光亮轻摇急跑，红色和蓝色的，黄色和白色的，我看出它们是鱼，深渊中的居住者，鳍身上闪着鳞光，牙齿上的氖。我能潜到这么深的地方真是奇妙，我看那些鱼，它们游泳的情景就象闭上眼睛时眼前出现的场面。我的腿和胳膊失去了重量，自由漂浮；我几乎忘记寻找那块岩石和石壁画了。

它就在那儿，但不是画，它不在石头上。它就在我的下面，从没有生命的远处向我飘来，一个肢体拖曳的椭圆体。它朦朦胧胧，但它有眼睛，而且是睁着的，这是我认识的一样东西，一个死东西，它死了。

我转过身体，恐惧的白色物体从我的嘴里涌出，惊恐掐住了我的喉咙，被压抑的尖叫使我窒息。绿色的独木舟在我远处的头顶上，阳光照射着它，一盏航标灯，安全。

但那儿不是一只独木舟，而是两只，那只独木舟有双胞胎或者我把它看成两个了。我的手从水里伸出来抓住船缘，

而后冒出水面的是我的头；水从我的鼻子里流出来，我大口喘气，胃和肺收缩着，头发象杂草一样发粘，湖太可怕了，它充满死亡，它在触摸我。

乔在另一只独木舟上。“他告诉我你上这儿来了，”他说。他一定在我潜水之前就在这儿了，但我没看见他。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我的呼吸急促，我的胳膊几乎不能帮我爬上独木舟。

“你究竟在这干什么？”他问。

我躺在独木舟里，闭上双眼；我不要他在那儿。它又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起初，我以为那是被淹死的哥哥，头发漂浮在脸的四周，这是自我出生前直到今日一直留在我脑子里的场面；但那不可能是他，他根本没被淹死，他在某一个地方。而后，我注意到：那不是我记忆中的哥哥，那是一个假象。

我知道它是什么时候被放在那儿的，它在一个瓶子里，身体卷缩着，象一只被酸淹的猫一样注视着我；它有一双糊状的眼睛，它的鳍代替双手，鱼腮，我无法使它出来，它已经死了，它是在空气中被淹死的。我睡醒之后，它马上就在那儿出现，象一只酒杯一样在我眼前的空中悬着，我想那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用的杯子，不管它是什么，是我的一部分或不相连的生物，是我杀了它。那不是一个孩子，但它曾经是，我不承认它。

水从我的身上流进独木舟，我躺在水潭中。我曾经一直对他们十分恼火，我把它从桌子上扔下去，我地板上的生命，玻璃蛋和散开的血，一切都无济于事。

那是错的，我从未看见它。他们把它塞进桶里，把它随

手扔了，当我醒来时，它正在下水沟里向大海漂浮，我伸出手来抓住它，但它消失了。瓶子一直是纯粹的逻辑，被猎和腐化的动物的残存物，在我的头脑里被神化了，封闭，使我远离死亡的东西。甚至不是一所医院，不是法律性的制裁，官方的程序。那是一栋房子，前面的简陋屋子里摆着杂志，前厅的地板上铺着紫色的地毯，常青藤和花蕾，柠檬香型擦洗剂的味儿，鬼鬼祟祟的门和低语，它们要你马上出去。假装不是护士，她的腋窝酸酸的，脸上蒙着忧伤。踉踉跄跄地走在大厅里，从花朵到花朵，她罪恶的手按在我的臂肘上，另一条胳膊托着墙。手指上的戒指。它太真实了，永远是真实的，我不能接受它，那个肢体残损，我造成的毁灭，我需要新的想法。我尽最大可能地把它拼凑起来，将它弄平，剪贴簿，拼贴画，把错的部分粘贴覆盖上。赝造的相簿，记忆象保障一样具有欺骗性；但纸房子也比根本没有房子好，我几乎可以住到里边去，一直到现在我一直住在里面。

他没有与我一起去他们干那事的地方；他的孩子们，真正的孩子们，正在举行生日聚会。他过后来接我。那天天很热，当我们踏出屋门来到阳光下时，有那么一会儿，我们什么也看不见。那不是婚礼，没有和平鸽，邮局和草地都在城市的另一部分，我去那儿买邮票；海豚喷泉和有半张脸的小天使是从别的城镇弄来的，我把它放进去，因此我就有了属于我的东西了。

“过去了，”他说，“感觉好点儿了吗？”

我被控制，被截肢了；我身上有盐和抗菌剂的味儿，他们把死亡象种子一样种到我的身上。

“你在发冷，”他说，“走吧，我们最好送你回家。”

光亮中仔细观看我的脸，手放在方向盘上，粗鲁，最好是这样。在我膨胀的衣兜里有一个钱包，皮箱。我不能去那儿，回家，我从未再回到那儿去，我给他们寄名信片。

他们从不知晓我为什么离开。他们自己的清白，其原因我不能告诉他们；危险的清白，把他们封在玻璃瓶子里，他们的人造花园、暖房。他们没有教我们有关邪恶，他们不懂得它，我怎么能向他们描绘它呢？他们来自另一个时代，史前时代，那时，每个人都结婚有一个家庭，孩子们象向日葵一样在院子里成长；象爱斯基摩人或柱牙象一样偏远。

我睁开眼，坐了起来。乔还在我的身边；他正抓着我的独木舟的一侧。

“你没事儿吧？”他说。他的声音朦胧不清，好象被捂住了。

他说，我应该这样做，他让我这样做；他谈论它，好象它是合法的，简单的，如同割掉一个疣。他说，那不是一个人，只是一个动物；我应该看出那是没有区别的，它藏在我的身上，就象藏在一个地穴中，我没有把地穴看成是避难所，而是让他们抓住它。我应该拒绝，但我没有那样做；这就使我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一个杀手。屠杀之后，他不相信我不想再见到他了；这使他迷惑不解，为此他讨厌我，他期待感激，因为这是他为我安排的，重新安装我，使我象新的一样好；其他人，他说，不会费此心思的。从那时起，我的身体内部就携带着那个死亡，它的上面是包囊，肿块，黑色的珍珠；此时此刻我怀有的感激之情不是对他的。

我得上岸留下点儿什么：那就是你所要做的，留下你衣服的一小块作为祭品。我为自己负有责任感地在捐款盘子里

扔了五分镍币而后悔，我得到的回报太少了：他们平淡的耶稣油彩画上没留下什么活力，其他人的塑像也是如此，刻板和风格化，神圣的三位一体贬低为咒语。他们的神，在湖上或在水里，未被承认或被遗忘，但他们是唯一曾给我所需东西的神，而且是免费的。

现在，地图上的X和图画看起来有意义了：起初他一定只标出石壁画，推断它们，寻迹和拍摄它们，退休后的爱好；但后来他看出了其中的奥妙。印第安人没有灵魂拯救，但他们曾知道它的住处，他们的符号标志出神圣的地方，那些你可以得到真理的地方。白桦湖上没有画，这儿也没有，因为他后来的画不是记录石上之物的。他发现了新的地点，新的神喻宣示所，他对这些场所的态度与我的态度一样，真正的显圣；最终时刻，逻辑失败之后。但当这第一次发生的时候，他一定吓坏了，恰象走进一扇普通门却发现自己进入了另一个星系，紫色的树，红色的月亮，绿色的太阳。

我挥动船桨，乔的手松开了，独木舟向岸边划去。我穿上帆布鞋和衬衫，走出独木舟，把缆绳拴在一棵树上，然后我爬上坡向峭壁走去，一边是树，一边是岩石晶面，凤仙花的味儿，草木磨擦着我的光腿。那儿有一块暗礁，我在湖上就看见了它，我可以把衬衫扔到上面去。我不知道接受我祭品的东西的名字；但它们就在那儿，有着力量。塑像前的蜡烛，台阶上的支柱，十字路口上果酱瓶里的花朵，对治疗痊愈的感激，不管怎样渴望和癖好。衣服好一些，它更接近，更重要；礼物一直是较大的，远比手和眼睛大，感觉开始回到我的身上，我象发麻的脚一样感到刺痛。

我就在暗礁的对面；它上面布满苔藓，灌木丛枝叉缠

绕，树梢是红色的，在阳光下闪光。它距离陡峭的峭壁只有一臂之遥；我仔细地卷起衬衫，把它扔到上面。

什么东西在我身后笨重地移动。那是乔，我把他忘了。当他赶上我时，他抓住我的肩头。

“你没事儿吧？”他又一次问我。

我不爱他，我与他相距遥远，我好象是透过脏玻璃或光面纸看他；他不属于这儿。但他存在着，他有权活着。我希望我能告诉他怎样改变才能到达那个境界，我的境界。

“是的，”我说。我用我的一只手碰了碰他的胳膊。我的手触碰他的胳膊。手触碰胳膊。语言把我们分成碎块，我要完整。

他吻了我；我站在我的窗户旁。当他头缩回去时，我说：“我不爱你，”我想要解释，但他好象听不见我的话，我肩膀上的嘴，背后抓紧的手指，它们滑下我的肋腹，他象折叠草地上的椅子一样推我，他想让我躺在地上。

我身体内部平伸开来，嫩枝和松针在我的身下，在那一刻，我想，对他来说，我是一个入口，就象湖是我的入口。树林在他身上凝缩，那是中午时分，太阳就在他的脑后；他的脸看不见，太阳的光线从黑暗的中心射出来，我的阴影。

他的手向下滑，拉锁的声响，金属牙齿撞击金属牙齿，他正脱身于毛皮外套，结实、沉重；但衣服与人分离开来，我看见他是一个人，我不想让他进入我，亵渎，他是杀手之一，他身后有被损坏、乱抛的泥土受害者，他没有看见，他不了解自己，他对死亡的接受力。

“不要，”我说，他正向我压下来，“我不让你这样。”

“你怎么了？”他说，很生气；然后他使我无法动弹，

抓住双手，牙齿抵住我的嘴唇，审视我，他正在乱撞我；他的身体象争论的一方一样坚持着。

我用胳膊隔开我们，顶住他的喉咙、气管，把他的头撬到一边。“我会怀孕的，”我说，“正是这段时间。”这是事实，它阻止了他：肉体产生出更多的肉体，奇迹，这使所有的人害怕。

他向船坞走去，把我远远抛在后面，他的愤怒使独木舟象机动船一样快，当我到达那儿时，他已不见了。

第十八章

小屋里没有人。它看上去有所不同，大了点儿，我好象很长时间没去那儿了；我身体开始恢复的那一半对它不适应。我走出屋，把长方形的门摘下来，坐在秋千上，十分小心，绳子还能承受我的重量；我轻缓地前后摇晃着，脚一直没离地。岩石，树木，沙箱，我曾在里边造了一间用石头做窗户的房子。那儿有鸟，红尾鸟和樫鸟；但它们害怕我，它们没受过训练。

我转动左手指上的戒指，纪念品：那是他送给我的，平常的金子，他说他不喜欢铺张，它使我们比较容易地进入汽车旅馆，开门的启子；在调停的时间内，我把它挂在项链上。寒冷的洗澡浴室，可交换的，鞋底感觉到磁砖；身上缠着别人在性按摩时用过的浴巾。他会把手表放在桌子上以确保不会晚。

对他来说，我可能是任何一个人，对我来说，他是独特的，第一的，那是我了解的。我敬奉他，没有孩子的新娘，偶像崇拜者，我象保存圣人的遗物一样保存带有他的笔迹的纸片，他从不写信，我所有的只是他用红笔对我的画所做的评判，C和D，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说他不想让我们的关系来影响他的美学评判。他不想让我们的关系影响任何事；他与生活隔裂开来。墙上挂着一张证书，证明他还年

轻。

他的确说过他爱我，这里面有一部分是真实的；不是我杜撰的。那是一天晚上，我把自己反锁在洗澡间里，打开水笼头，他在门外边喊我。当我不再坚持走出来时，他给我看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们的照片，他的理由，他的大家庭，他们有名字，他说，我应该慎重些。

我听到机动船的钻牙机般的响声由远而近，很可能是美国人；我跳下秋千，走到台阶的中腰处，那儿我可以被树木遮挡住。他们的船的速度慢下来，开进小湾。我蹲伏着观望，起初我以为他们是要上岸来；但他们只是凝望、观察，计划着进攻和占据。他们指点小屋谈论着，望远镜的白光。然后他们加速向神居住的峭壁驶去。他们什么也得不到，他们未经允许。他们在不了解权限的情况下就到那儿去真是太危险了；他们可能伤害自己，错误的行为，金属钩子藏在神圣的水下，它们的威力象电流和手榴弹一样厉害。我能免受其害只是因为我有护身符，父亲给我留下的向导，人形动物和数字谜。

我的母亲也应该给我留下点什么，遗产。他的遗产复杂，头绪难理，而她的则应该象手一样简单，它将是最后的。但还没有全部了结；他们每人还会送给我礼物。

我要去寻找它，但大卫从厕所出来，沿着小路慢吞吞地走过来。“嗨，”他喊我，“你看见安娜了吗？”

“没有，”我说。如果我走回房子或走进花园，他会跟着我，与我闲聊。我站起身，走完下面几级台阶，蹦过高高的草，向小路的另一头走去。

树林中有凉爽的绿意，幼树和树桩，树桩上面有木炭

灰，疮痂累累，终生致残，过去灾难的存活者。眼前的景物在大地上拂动，眼睛渗入物体，东西的名字在记忆中已消褪，但它们的形状和用途还未忘却。动物知道该吃什么，而不必知道所吃之物的名字。六片叶子，三片叶子，它的根很脆，白色的茎弯曲得象一个问号，昏暗的光线下呈鱼色，植物的尸体，不能吃。手指形状的真菌，无类别，我从未把它们全部记住；再往前，一朵标有名字的蘑菇：死亡天使，致命的毒药。它的下面看不见了，线形的地下网，实实在在的花从它身上长出来，象冰柱一样短暂，冰冻的生长物；明天它就会融化，但根茎还会保留下来。如果我们生长在地球上的肉体只从腐殖质中往出长头发，这就会使人觉得我们就是这个样子，细丝植物。

这就是人们制造棺材、将死人关在里边，保留他们的原因，他们往死尸的脸上涂抹脂粉；他们不想让死人扩展或变成别的什么东西。刻有名字和日期的石头只是压在死人身上使他们下沉之物。她会憎恨它，那个盒子，她会努力把它拿出来；我应该把她从那间屋子里偷出来，把她带到这儿，让她自己走进森林里去，她会在某地死去，神智清晰地很快死去，而不是在那个玻璃器皿中。

它从大地上生长出来，纯净的快乐，纯净的死亡，雪白的燃烧。

枯树枝在我身后作响：他一直顺着小径隐身跟着我。“嗨，你在干什么？”他说。

我既没转身也没回答，但他在等待回答，他在我身旁坐下并问道：“那是什么？”

我必须集中精力以便与他谈话，英语词句好象是进口

的，是外国的；这就象同时努力听两个不同内容的对话，一个打扰另一个。“蘑菇，”我说。这是不够的，他会要求专有术语。我的嘴象张吃人的嘴一样一张一合，说出来的却是拉丁语“阿玛尼塔”。

“有意思，”他说，但他并不感兴趣。我请求他离开，他不干；过了一会儿，他把手放在我的膝上。

“可以吗？”

我看着他。他的笑容象仁慈的叔叔的笑容；他的前额下有一张平面图，它弄绉了他的皮肤。我推开他的手，他又放了回来。

“怎么样？”他问，“你需要我跟着你。”

他的手指在挤压，他已掘走了一些力量，我会丧失力量，再次分裂，谎言会再次恢复。“请别这样，”我说。

“来吧，别跟我争论，”他说。“你是一个绝妙的少妇，你知道事实，你还没结婚。”他用胳膊搂着我，侵犯，把我向他怀里拉；他的脖子上布满绉褶和斑点，过不了多长时间，他就会有垂肉，他身上散发着头皮的味儿。他的胡须搔着我的脸。

我弓身跳开身来，站直身子。“你为什么这样做？”我说。“你是在妨碍别人。”我拍打胳膊上他碰过的地方。

他不明白我的意思，他笑得更甚了。“别太紧张，”他说，“我不会告诉乔的。这是件好事，对你有好处，使你保持健康。”

他好象是在谈论练习计划，体育表演，氯气游泳池里的装饰性游泳。“这不会使我健康，”我说，“我会怀孕。”

他的眉毛扬了起来，不相信的样子。“你在骗我，”他

说，“这是二十世纪。”

“不是，”我说。“这儿不是。”

他也站了起来，向我走了一步。我往后退去。他的脸胀红起来，脖子成了火鸡脖，但他的声音还是有理性的。“听着，”他说，“我发现你在无人地区闲逛，但你却不告诉我你不知道乔在哪儿；他并不高尚，他正在树林的某一个地方干那事呢，此时，他正钻入她的身体。”他扫了一眼他的手表，好象在测定时间。他似乎为自己说的话而洋洋得意，双眼象试管一样闪光。

“啾，”我说；我想了一会儿。“也许他们相爱。”这是合乎逻辑的，他们是那种可以相爱的人。“你爱我吗？”我问道。“这就是你要我那样做的理由吗？”

他想，我不是很精明，就是很蠢，他喊了一声“啾，上帝。”然后，他停顿了一会儿。“你不想让他带着爱走开，是不是？”他问。“象他们所说的，针锋相对。”他抱膀站着，寄希望于他的辩论，以牙还牙是他的最高论点：他一定觉得这是公正的，我与他做爱是我的责任，我道义上的责任。几何形状的性爱，他为一个抽象的原则而爱我；如果我们的生殖器能象两套厨房用具一样隔开，并能在半空中交媾，这对他来说就已足够了，这就能完成他的对等感。

他的手表闪着光，玻璃和银；也许是他的调节控制盘，缠在他身上的键盘，开关。一定有一个可以起作用的句子，单词。“对不起，”我说，“但你并未欺骗我。”

“你，”他说，不知说什么好了，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了，“小屁股的淫妇。”

力量进入我的双眼，我能看透他，他是一个骗子，一个

东拼西凑的杂烩，一叠政治传单，杂志里的几页纸，张贴的广告，附在他身上的动词和名词都破碎飘走，原来的表面杂乱地沾着破碎的纸片和布条。穿着一身黑衣服敲门，曾经年轻过，虽然那只不过是化妆制服；现在，他的头发垂落下来，不知道该使用什么语言，他已忘记了自己的语言，他不得不抄袭别人的。他的身上满是劣等美国人的补丁，象苔藓和癞疥一样。他被污染、被篡改，我帮不了他的忙：痊愈需要很长时间，把他从地下挖掘出来，送到他曾是真实的人的地方。

“你自己留着吧，”他说，“我可不想熬夜，乞求一个三等的冷屁股。”

我从他身边绕过去，向小屋走去。比以往任何时候我更需要弄清她对我隐瞒的东西。从父亲的代人祈祷中所获得的力量不足以保护我自己，它只给予我知识，除了他的神以外，还有许多种，他的神是脑袋的神，鹿角根植于头脑中。不仅知道怎样看，而且知道怎样做。

我以为他会原地不动，至少要等到我走远，但他却跟在我的身后。他的声音又变了，此时是恭敬的。“别跟别人说，好吗？没必要向安娜提及这事，是不是？”如果他成功了，他会马上告诉她。“如果你能做到，我会为此而尊敬你，我的确尊敬你。”

“好吧，”我说；我知道他在撒谎。

他们围坐在通常的位置上，我做晚饭。那天没有午饭，但没人提及此事。

“伊文斯明天什么时候来？”我问。

“十点，十点半，”大卫说。“下午过得好吗？”他问安娜。乔用叉子扎了一块土豆放进嘴里。

“好极了，”安娜说。“我晒了一会儿太阳，书也看完了，然后我与乔长谈了一番，还散了步。”乔咀嚼着，闭着的嘴嚅动着，无言的驳斥。“你呢？”

“很好，”大卫说，他的声音飘浮着，膨胀着。他把双臂伸到桌子下，他的手漫不经心地触摸我的手，好象是偶然的，这是做给她看的，我抽回了手，他对我撒谎，动物从来不撒谎。

安娜悲哀地对他微笑着。我望着他，他没有笑，他在盯着她，脸上的皱纹加深松垂。他们知道对方的每件事，我想，这就是他们如此忧郁的原因；但安娜远不止忧伤，她是绝望，她的身子是她的唯一武器，她在为生命而战斗，他是她的生命，她的生命就是战斗：她与他战斗，因为假如她屈服投降，力量的平衡就会遭破坏，他就会走开。继续战斗。

我不想加入进去。“不象你想的那样，”我对安娜说。“他要我那样做，但我没同意。”我要告诉她，我没有做对不起她的事。

她的眼睛从他转向我。“你是纯洁的，”她说。我犯了一个错误，她为我没有屈服而恨我。这对她是一个评论。

“她很纯洁，”大卫说，“她是一个纯粹派艺术家。”

“乔告诉我，她不再打扰他了，”安娜说，眼睛还盯着我。乔什么也没说，他在吃另一块土豆。

“她憎恶男人，”大卫轻轻地说。“要么她是这样，要么她想这样，是不是？”

眼睛的链环，法庭；再有一会儿，他们会拉着手在我周

围跳舞，那以后是绳索和火葬用的柴堆，对异教的医治。

这也许是对的，我在所有我认识的男人中查寻，看我是否恨他们。但我发现，我憎恶的不是男人，而是美国人，是人类，男人和女人。他们有机遇，但他们以神为敌，我该选择立场了。我希望能有一架机器把他们化为乌有，我希望有一个我可以按的按钮，然后在不妨碍其它事的情况下把他们消灭，这样就会为动物创造更大的空间，它们会得救。

"你不想回答吗？"安娜嘲笑地刺激我。

"不，"我说。

安娜说："上帝啊，她真是没人性，"他们都神情忧郁地笑了笑。

第十九章

我收拾桌子，把沾在盘子里的火腿罐头的油脂刮到火里，死亡之食物。如果你给它们足够的食物，它们会返生的；或者恰恰相反，如果你给它们足够的食物，它们则会再不回来，这是某一本书说的，但我忘记了是哪一本。

安娜说她乐意洗涮餐具。这可能是道歉，这是对这样一个事实的补偿：即她觉得与他一起战斗要比和他对着干容易一些。她把餐具在平底锅里弄得稀哩哗啦乱响，哼着歌来避免交谈；这不是说私房话的时候；她的嗓音占据着空间领地。

它一定是在屋子里面。晚饭前，当我拿铁锹去园子里挖土豆时，我在工具架上翻找了一阵；但它不在那儿，我应该知道这点。它一定在不容易发现的地方。我离开时，它不在这儿，一排桔子中的一个苹果，如同老式算术练习册。她一定特意为我把它带到这儿，把它藏在我能发现的地方，在我一切就绪的情况下，我便能找到它；象父亲的谜语一样，它转达信息，我们不能直接得到它们。安娜洗盘子时，我擦干它们，仔细观察每个盘子以确信它是熟悉的。但自从我到这儿以后，什么也没有增加，礼物不是一个盘子。

它不在大厅里。洗涮完毕，我走进大卫和安娜的房间；她的皮夹克挂在那儿，自旅行开始，它一直未被收拾起来。

我检查衣兜；但里面什么也没有，除了一个装阿斯匹林的空金属盒，一张老式的面巾纸，一些瓜籽皮；还有一截安娜吸过的燎焦了的烟蒂，我把它扔到地板上，用脚捻碎。

剩下的只是我的房间了。我刚走进去，我就感觉到力量，他在我的双手里一直注入我的双臂，我离它很近。我粗略地看了一下墙壁和橱柜，它不在那儿；我画的那些女士用发怒的眼睛望着我。然后，我确信：它在剪贴簿中，我把它塞在床垫下了，没有一张一张地翻过。它们是最后的可能性，它们不应该在这儿，它们应在城里，在皮箱中。

我听见湖上传来摩托艇的嗡嗡声，音高不同，比机动船要低一些。

“嗨，你看，”安娜在大厅里喊道，“一艘大船！”我们走出小屋，那是一艘警察的船，象渔猎监督官所驾驶的那种船，他们会象以往那样检查我们是否有死鱼和钓鱼许可证；这是例行公事。

船减慢速度开进船坞。大卫就在那儿，我乐意让他去见他们，那些证件之类的东西都在他身上。我走回屋子站在窗户前。

那儿有两个人，警察或许是渔猎监督官，他们身着便装；第三个人，亚麻色头发，也许是村子里的克劳德，第四个人，年纪老一些，保罗的块头。真奇怪，保罗在船上；如果他是来访，他会用自己的船。大卫与他们握手，他们都站在船坞上，小声地交谈着。大卫把手伸进口袋，往外拿许可证；然后他摸脖子，好象很担忧。乔从厕所走出来，交谈又开始了；安娜把头转向我。

然后我看见大卫一步两个台阶地快速跑上坡来。门在他

的身后呼地一声关上了。"他们找到了你的父亲，"他说，由于爬坡而喘粗气。他的脸扭曲着，似乎在表示同情。

门又呼地响了一声，那是安娜；他用胳膊搂着她，二人用急切、闪烁的眼光审视我，就象在晚饭时那样。

"是吗？"我说。"在哪儿？"

"几个美国人在湖上发现的。他们在钓鱼，他们错把他钩了上来；尸体已无法辨认，但那儿有一个叫保罗或什么的老家伙，他说他认识你，他认出了他的衣服。他们猜测他可能从峭壁或什么地方掉下来，他的颅骨摔碎了。"下流的商店魔术师，从虚无中变出我的父亲，就象从帽子里变出一个充填的兔子一样。

"在哪儿？"我又问了一遍。

"太可怕了，"安娜说，"我觉得太遗憾了。"

"他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被淹死的，"大卫说，"他一定是漂浮过来的；他的脖子上挂着一架旧照像机，一个大家伙，他们认为是那家伙的重量使他下沉，不然人们会早一点儿发现他的。"他的双眼幸灾乐祸地注视着我。

他能猜到那架丢失的照相机真是够机灵的，因为我就此什么也没说。他一定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快速地思考以便弄个明白：我知道那是谎言，他那样做是为了报复我。"他们要求看你的钓鱼许可证了吗？"我问。

"没有，"他说，假装的惊奇。"你想和他们谈谈吗？"

那是冒险，他应该更好地盘算一下，这会暴露他整个的错误解释。也许那正是他所要的，也许那是一个恶作剧。我决定我要表现得象相信他一样，看他怎样收拾结局。"不，"

我说，“告诉他们我太难过了。明天去村子时，我要与保罗谈谈有关安排的事。”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安排。“他曾希望被埋在这儿。”令人信服的细节，他能发明，我也能。我可是读了许多凶杀小说的。侦探，怪癖的隐士，兰花养植者，厉害的蓝头发老妇人，带着大折刀和闪光灯的姑娘，对他们来说，每件事都是合适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则不然，我想告诉他，你聪明过头了。

他和安娜对望了一下，他们计划要伤害我。“好吧，”他说。

安娜说：“你是不是……”然后闭上嘴。他们走下台阶，他们都很失望，他们的陷阱没起作用。

我走进另一间屋子，从床垫下取出剪贴簿。光线还足以让我看清，但我闭上了眼睛，用手，手指尖抚摸封面。其中一本较重较温暖；我拿起那本，将它打开。那是妈妈给我的礼物，我可以看一看。

剪贴簿的其余部分都是很久以前的人的照片，头发象射线和麦稻一样耸立闪光，一轮轮带有面孔的太阳，但礼物本身是松散的纸页，边缘磨损，蜡笔画的身形。左边的女人有一个圆月般的肚子，坐在里边的孩子向外凝望着。她的对面是一个头上长着牛角，拖着一根倒挂的尾巴的人。

这是我的画，是我画的。胎儿就是出生前的我，男人是上帝，当哥哥在冬天里知道了魔鬼和上帝时，我便画了上帝：如果魔鬼被允许长有尾巴和角，上帝也需要它们，它们是优势。

那就是那幅画当时的含义，但此时此刻，它的第一个含义就象石壁画的含义一样已经消失了。它们是我的向导，她

为我保存了它们，石壁画，我必须借助于力量而重新读解它们的新含义。神，它们的画像：以它们真正的形状来看它们是不幸的。你是人类；但在变形之后，它们可以被接近。首先，我必须把自己浸入其它语言。

那艘船启动开走了。我把那张画又放回剪贴簿中，把剪贴簿放回床垫下。其他人在坡上践踏着，我留在屋子里。

他们点燃了灯。大卫笨手笨脚的声音，然后是纸牌的声响，他在玩单人纸牌游戏；而后是安娜的声音，她要建造另一个船坞。他们一起玩双人纸牌游戏，象赌徒一样熟练地摔着纸牌，赢和输的时候发出单音节词。乔坐在屋角的长凳上，我可以听见他撞击墙的声音。

对他来说，真理还是可能的，能够保护他的就是文字的缺乏；但其他人已转向金属、皮肤的刺激，头脑冻结成铜疙瘩，内部的元件和缠结的线在成熟。桌子上纸牌的记号。

我松开手，一种力释放出来，它又变成了普通的手，手掌上布满小径般的纹络，生命线，通过现在和未来，当我缩拢手指时，断开处便合在一起，代表心的线和代表头的线合为一根时，安娜告诉我，你或是罪犯、白痴，或是一个圣人。

他们小声地说着，他们不能谈论我，他们知道我在听。他们在躲避我，他们觉得我不合时宜，他们觉得我应该被死亡充斥身心，应该悲痛万分，但事实上什么也没有死，一切都是有生命的，一切都在等待而成为有生命的。

第二十章

红色的落日，清亮的郁金香颜色使新的羊皮纸变暗。此时，只有夕阳余辉的线条，呈淡紫红色，透过窗子可以看见天空，被窗棂和交叉的树枝分割，树叶与树叶交叠。我躺在床上，身上盖着被子，衣服堆在地板上，一会儿他就会进来，他们不能总是推延它。

含糊的说话声，纸牌收了起来，刷牙的声音。吹气、烛光的闪动，灯灭了，手电光射在天棚上。他打开门，犹疑地站在那里，弄暗手提灯，早晨和下午之后，他不知道该怎样接近我。我佯装睡着了，他摸索着走进屋，象苔藓一样悄无声息，拉开了他的人类皮肤。

他以为我在痛苦中，他要躲避我，他卷曲着身体离我很远，但我却触摸了他，我的手掠过他的身体，他很惊讶，因为我还醒着。过了一会儿，他转向我，身体僵硬，胳膊搂着我，我从他身上闻到了安娜的味儿，日晒霜、胭红和烟的味儿，各种各样的味儿，床单，羊毛和香皂，化学处理的皮革，我不能在这儿。我坐了起来，将两腿伸出床外。

“干什么？”他说，耳语着。

我拉着他的手。“不在这儿。”

“上帝啊！”他试图把我拉回来，但我抱住双腿，钩住床边。

“别说话，”我说。

他迟疑地爬下床，跟我走了出去，从这间屋走到另一间屋，通过外面的地板。当我打开纱门和木板门时，我拉起他的手：我对外面的某种东西有抵御能力，而他没有，我必须让他靠近我，在镭之中。

我们走在地上，脚和皮肤赤裸着；月亮升起来了，在灰绿的光线下，他的身体闪着光，树干也闪着光，他眼睛的白眼球。他象盲人一样走着，跌跌撞撞地走进阴影重重的灌木丛，脚趾踢碰着，他从未学会在黑暗中看东西。我的有触角的脚和自由的手嗅出脚下的路，鞋是触感和地球间的阻隔物。双重的撞击，攥紧的心跳：兔子，警告我们，相互警告。远处的岸边有一只猫头鹰，它的声音象羽毛一样，又象用爪子抓东西一样，黑上加黑，心里的血。

我躺了下来，让月亮在我左手，让缺席的太阳在我右手。他跪了下来，颤抖着，身下和周围的树叶由于露水而潮湿，或者是湖水渗透了岩石和沙地，我们靠近岸边，微波流过浅滩。他需要长更多的毛皮。

“为什么？”他问。“怎么回事？”我的手搭在他的肩上，月光照在他的背上，他粗壮、模糊、轮廓可见，但相貌难辨，头发和胡须如同鬓毛。他在我身上卷缩着；他的眼睛隐约闪现，他在发抖，由于害怕或肌肉紧张，或是由于冷。我向下拽他，他的胡须和头发象蕨菜一样散落在我的身上，嘴象水一样柔软。重重地压着我，温热的石头，几乎是有生命的。

“我爱你，”他在我的耳边说，问答数学法。牙齿磨动，他缩了回去，他想让它象城市里的一样，巴罗克的涡型

装饰，象计算机一样复杂，但我很耐心，快感是丰富的，持久的，动物没有快感。我指导他进入我，这是恰当的季节，我急不可耐。

他抖动着，然后我感觉到我丢失的孩子在里面出现了，它谅解了我，从长久监禁它的湖里升上来，它的眼睛和牙齿闪着磷光；两部分勾在一起，象手指一样交叉，它发芽了，它长出了叶子。这一次，我要自己来干，蹲伏着，在一个角落的旧报纸上面，或者在树叶上面，干树叶，一堆树叶，那是吸尘器。婴儿会象一个蛋一样滑下来，一只小猫崽，我要把它舔下来，咬断脐带，鲜血流回它所归属的土地；月亮会是圆的，有吸引力的。早晨，我会看到它：它会被闪光的毛皮覆盖着，一个神，我决不教它一个字。

我用双臂搂住他，抚摸他的后背；我感激他，他给了我需要的他的一部分，我要把他带回小屋，通过此时附在我身上的那种深海潜水者所感到的压力，然后我就让他走开。

"没关系吧？"他问。他躺在我的身上，喘着气，融化了。"刚才没关系吧？"

他指的是两件事；但我的"是的"，所指的却是第三件事，未提出的问题，没人一定要弄个究竟，不然的话，他们就要再次对我这样干，把我撕碎扔进死亡机器，空无机器，腿在金属的框架里，秘密的刀子。这一次，我不允许他们那样干。

"那就好，"他说，他靠在臂肘上，用手指和嘴唇抚慰我，我的双颊，头发。"今天下午没什么，什么也说明不了；是她需要那个。"他翻滚下我的身体，躺在我的身边，紧挨着我的肩膀来取暖；他又发抖了。"妈的，"他说，

"冻死人了。"然后他小心地问："你感觉如何？"

这是爱，仪式语言，他再次想知道；但我不能给予补偿，甚至连谎言也不行。我们都等待我的回答。风吹拂着，树木呼吸的声音，水把我们包围起来。

第二十一章

我醒来时已是早晨，我们又躺在床上了。他已经醒了，俯在我的头上，我睡觉时他在盯着我看。他对我微笑，丰满的微笑，心满意足的微笑，他的胡须翘起，象一只鸣叫的蟾蜍的喉头，他低头吻我。他还不明白，他以为他赢了，以为他的肉体行为会象一根绳索、一条系狗的皮带一样缠住我的脖子，这以后，他就能带我回到城市，把我拴在栅栏上，拴在门把手上。

“你睡过头了，”他说，他又趴到我的身上，但我注视着太阳；很晚了，几乎是八点半了。我可以听见大厅里金属撞击的声音，他们起来了。

“不用着急，”他说，但我把他推开，开始穿衣服。

安娜正在做饭，在平底锅里翻动勺子。她穿着紫色的束腰外衣和白色喇叭筒裤，城市的装束，脸上象带面罩一样涂着厚厚的脂粉。

“我想我该做早饭，”她说，“因此你们可以睡个懒觉。”她一定听见了夜里开门和关门的声响；她脸上展现着笑容，热情、阴谋的笑容，我知道她的脑袋里在想什么：她以和乔作爱而使我们和好了。拯救世界，每个人都想这样做；男人以为他们可以用枪，而女人则用自己的身体，爱情征服一切，征服者热爱一切，由文字产生的奇迹。

她把早餐放在盘子里。那是炒罐装豆子，以往的早餐不见了。

“猪肉、豆子和音乐水果，吃得越多，吹奏得越响。”大卫说着，象愚蠢的鸭子一样嘎嘎叫着，欢快活泼，现出一副满意的样子。

安娜给他打下手，合作的群落生活；她用勺子敲他的关节说，“啾，你。”然后她又想起我父亲的事，调整好悲剧的面具：“有多远，我是说村子？”

“我不知道，”我说，“不太远。”

我们收拾好行李，我帮他们把行李拿到下面，还有我的，一箱子外来文字和差劲的图画，一帆布袋衣服，都不是我需要的。他们坐在船坞上交谈，安娜在吸烟，她让自己走在最后。

“天哪，”她说，“我真高兴回城去。又能购物了。”

我再次走回去以确认他们没忘掉什么东西。樫鸟在那儿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传播着部落间的信号，它们退到树枝的最高处，它们还确定不了我是否可信。小屋是我们发现它的方法。伊文斯来时，我要把门锁上。

“你们应该在他来之前把独木舟拉上来，”我走到下边时对他们说。“它们在工具棚里。”

“对，”大卫说。他看了一下他的表，但他们没有动弹。他们把摄相机拿出来，讨论着电影；带拉锁的器材箱放在他们的身边，三角架，装在茶叶罐子里的电影胶片卷盘。

“一、两周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剪接，”大卫说，他的专业版本。“我们要最先把它带进研究室。”

“还剩一些胶片，”安娜说，“你应该拍一些她的镜

头，你只拍我，从未拍过她。”她望着我，烟雾从她的鼻子和嘴里冒出来。

“好主意，”大卫说，“我们全都拍进去了，只是没有她。”他审视我。“我们把她放在哪一部分呢？我们没有可利用一下的人，但我还是可以配合的，”他对乔说，“我们需要你来操作摄影机。”

“我来吧，”安娜说，“你们俩都可以与她配合。”每个人都大笑起来。

过了一会儿，他们站了起来，吊起红色的独木舟，一人抬一头，把它抬上坡来。我与安娜留在船坞上。

“我的鼻子蜕皮了吗？”她问，用手刮鼻子。她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圆圆的上面有一朵紫罗兰的化妆盒。她打开盒盖，展示她的另一半，指尖在嘴角处划动着，左边，右边；然后又拿出一个粉红色的唇笔，在腮上点了几下，又抹匀，改变了她的形状，展现出她存留的唯一魔力。

臀部坐在行李上，后宫的垫子，腮上的粉红和眼睛四周精心涂抹的黑色，象血一样红，象乌木一样黑，这是对杂志美人的模仿，只是脸上已有皱纹，而那杂志美人也是模仿了一个模仿了别的女人的女人，原型已无处可寻，同一天堂上的秃头天使，在那儿，上帝是一个圆圈，是某人头脑里的被迷住的公主。她被锁在里面，不允许吃或排泄，不允许哭或生产，什么也进不去，什么也出不来。她脱下或穿上衣服，纸糊的娃娃衣柜，她在频频闪动的电灯下与裸体躯干雕像交媾，而他的大脑从房间另一端的用玻璃围起来的控制小室中往外看，她的脸扭曲成极度快乐和全然不顾的神情，这就是全部。她并不觉得无聊，她没有别的兴趣。

安娜坐在那儿，眼睛四周一圈黑晕，烛光下的颅骨。她吧嗒一声关上化妆盒，在船坞上把烟捻灭；我想起她哭的样子，哭着爬上土坡，那是昨天，从那以后她就定形了。机器是渐进的，每次它只吞食你的一部分，留下你的外壳。这样做对死亡之物是可以的，死亡可以保护自己，半死半活最糟糕。它们相互之间也这样做，只是未意识到。

我打开装摄影器材袋子的拉锁，把电影胶片卷盘拿了出来。

“你在干什么？”安娜问道，然而丝毫不想动弹。

我往外倒胶卷，让它充分暴露在阳光下，让它螺旋形掉进湖里。“你最好别那样，”安娜说，“他们会杀了你。”但她并未干预，她也没喊他们。

倒完卷盘后，我打开照相机的后盖。胶卷卷曲地掉进水底的沙子上，由于外壳的重量而下沉；被摄的看不见的影象象蝌蚪一样游进湖水中，乔和大卫站在被征服的原木旁，执斧的男人，抱着膀，安娜一丝不挂地从船坞上往下跳，手指上举，百十个微小的裸体安娜不再被困、被搁置。

我审视她，想知道她的被释放是否会产生什么变化，但搪瓷面孔上的绿眼睛毫无改变地望着我。

“他们会找你算帐的，”她说，预言家似的表示悲哀。“你不应该那样干。”

他们来到坡上，回来取独木舟。我快速跑到那支独木舟前，把它翻过来，往里边扔了一根船桨，顺着船坞拖着它走。

“嗨！”大卫喊道，“你干什么？”他们几乎走到了近前，安娜望着我，咬着手关节，她无法决定是否告诉他们；

如果她保持沉默，他们会把她当成间谍。

我先把船尾推下水，蹲下去，走上船，猛推。

“她把你们的胶卷倒出来了，”安娜在我身后说。

我把桨插进水里，我没有转身，我能听见他们向水中凝望。

“妈的，”大卫说，“妈的，妈的，啾，妈的，该死的，你为什么不阻止她？”

划了很远之后，我转过头来。安娜站在那儿，双臂下垂，一副与己无关的样子；大卫跪在地上，他的手在水里捞着，抓起一把意大利面条似的胶卷，虽然他明白这是徒劳的，所有一切都溜掉了。

乔没在那儿。一会儿他出现在坡上面，跑跑停停。他气急败坏地喊着我的名字：如果他有石头，他一定会扔过来。

独木舟漂浮着，载着我和肚子里的那个，穿过低垂的树枝，他们抓不到我了。现在去弄另一支独木舟来追我已经太晚了；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奇袭使人迷惑。而这种想法却是明确的。我看到我一直在计划干这件事，但有多长时间了，我说不清。

我靠近树木向前划着，既是船又是武器，两栖动物；水在身后合拢，未留下痕迹。陆地转弯，我也随之转弯，一个狭窄地带，然后是一片开阔地，我安全了，我藏在岸边的迷宫里。

这儿有一些石头；它们在水下时隐时现，褐色的阴影象云或象凶兆，路障。两侧都是坡地，岩石上满是爬山虎花儿。湖床，一度曾是陆地的湖床，向上倾斜着，它很浅，摩托艇根本无法通过。又转了一个弯，我来到那个湖湾，陆地

围绕的沼泽，温热的水中，芦苇和猫尾草从黑色的植物沉积物中长出来，围绕在被锯的、曾经是参天大树的树桩旁。我曾往这扔过死东西，洗涮罐头瓶和坛子。

我任船漂浮着，没有必要用桨。再往前走，树木在洪水袭来前未被砍伐，它们断枝残叶，呈灰白色，向一边倾倒，它们巨大扭曲的根茎发白无皮；浸湿的树干上有许多植物，以剥蚀物为食，月桂树，吃昆虫的茅膏菜，它的指甲形状的叶子上布满红毛。花朵从叶苞处长出来，纯白，小蚊小虫的肉体，此时是花瓣的变态。

我躺在船底等待着。平静的水汇集着热量；鸟的鸣啭，森林里有一只啄木鸟，别处还有一只鸫。太阳透过树木观望着，我四周的沼泽在慢慢燃烧，衰败的精力在生长，绿色的火焰。我想起了苍鹭；现在它将是昆虫，青蛙，鱼和其它苍鹭。我的身体也在变化，我身体内的生物，植物形动物，在我体内长出细丝；在死亡和生命之间它被安全地运送，我在再生再殖。

由远至近的摩托艇弄醒了我：它就在湖上，那一定是伊文斯。我让独木舟靠岸，把绳子绕在一棵树上，他们从这个方向看不见我；我必须亲眼看见他们随他一起离去，不然的话，他们会假装离开，却留了下来，等我回去时把我抓起来。

透过树的缝隙看，摩托艇离我不过四分之一哩远，它转弯躲避树枝，小心地驶过我曾涉足的地方，那条秘密小径通向父亲以前的那个实验室橱架，如果我当时不知道那条小径，我是决不会找到实验橱架的。伊文斯的船驶进船坞后，我的位置就在他们的后面，我紧挨着一垛木头躺在地上，我

可以通过植物根茎间的缝隙看见他们。

他们弯着腰往船里装东西。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把我的也装了进去，我的衣服，绘画的碎片。

他们站在那儿与伊文斯交谈，他们的声音很低，我听不见；他们会作出解释，他们会编造出某个理由，也许是事故，这就是我没同他们在一起的原因。他们也许在策划抓住我的战术；或者他们真的离开而弃我不顾，消失在城市的墓穴中，把我当成走失了而放弃我，他们的头脑里会装着我的过时的衣服和话语。对他们来说，我很快就会象平头发式和战争歌曲一样古老过时，会成为学校年簿里朦朦胧胧的脸，被俘敌人的勋章；值得纪念的事，或者连这些都不是。

乔走到台阶顶端呼喊着；安娜也在喊，尖叫，象起动的火车的哨音，他们在喊叫我的名字。太晚了，我不再有名字了。这些年来我一直努力使自己文明化，但是我没能做到，我一直在做假象。

乔绕到小屋的前面，我看不见他了。一分钟后，他又出现了，摇摇晃晃地走下坡来，向他们走去，由于被挫而双肩低垂。此时，他也许明白了。

他们上了船。安娜停了一会儿，面朝我转了过来，阳光下一脸的迷惑，那么奇特的凄凉；她看见我了吗？她要对我说再见吗？其他人伸出手来把她拉进船里，从远处看，那姿式几乎是爱情。

船退到港湾里，然后转过头加足马力。船头，伊文斯掌舵，穿着花格衬衫，呆头呆脑的，美国人，他们现在都是美国人。但他们真的走了，走远了，我的耳朵里响着马达声，而后是一片寂静。我慢慢站起身来，我的身体由于半天未动

而痉挛；赤裸裸的腿上留下树枝和树叶的印子。

我走到坡上浏览了一下岸边，发现他们消失的地方很空旷，察看，再次确认。没错，只剩下我一个人了；这正是我需要的，独自留在这里。从任何一个理性的观点来看，我都是荒诞的；但已不再有任何理性的观点了。

第二十二章

他们把工具棚和小屋的门都锁上了；那是乔干的，他可能以为我会划独木舟去村子。不，那是病态的意愿。我不应该把钥匙挂在钉子上，我该把它们放在兜里。他们以为会把我关在外面，这也太蠢了。一会儿，他们就会到达村子，汽车，城市；现在他们正在怎样说我？我跑了；与他们呆在一起只能跑开，真理就在这儿。

我站在房子前的台阶上，抓着窗棂往里看。装着我的衣服的帆布背包被移动了，它又回到屋子里，它放在桌子上，旁边还有我的箱子；箱子旁放着安娜的侦探小说，她最后的一本书。简直是不起作用的安慰，但毕竟是安慰，死亡是有逻辑性的，总是有一个主题。也许这就是她读它们的原因，为了神学。

太阳落山了，天空暗下来，一会儿可能要下雨。山坡上乌云集结，铁砧，不祥的锤头，会有一场风暴；也许不会有，有时它们盘旋好几天，只是向前移，而从不袭来。我得进屋去。闯进我自己的房子，他们曾经唱着歌从窗子进进出出，象桥梁一样举着胳膊；就象我们曾经做的那样。手推车就在小屋的下面，就在总是堆着的木柴旁边，两根圆杆上钉着车幅一样的木板。我把它拽出来，靠在窗户下的墙上，没有纱窗的那扇窗户。窗户在里面的角落处插上了，我得打碎

四小块玻璃。我用一块石头敲玻璃，头转向一边，因为飞溅的玻璃渣儿而闭上眼睛。我通过锯齿状的洞小心翼翼地爬进去，打开了窗户插销，把窗户拿下来放到躺椅上。如果我能打开工具棚，我会用螺丝刀卸下门锁。但工具棚没有窗户。那里边有斧子，大砍刀，锯，金属用具。

我踏在躺椅上，然后踩到了地板上，我进来了。我扫起碎玻璃；干完以后，我又把窗户挂在窗框上。真讨厌，每次爬进爬出都得卸下窗户，但其它窗户有纱窗，我没有割开它们的工具。我可以用刀试一试；如果我需要紧急离开，最好选择一扇后窗，它离地很近。

我成功了；我不知道还该干点什么。我站在屋子中间倾听着：无风，寂静，湖水和树木都屏住了呼吸。

为了忙碌一下，我把衣服从背包里拿出来挂在我屋里的钉子上。我母亲的夹克又回来了，我最后一次看见它是在安娜的房间里，它被移动了。我的脚步声是唯一的响动，鞋踩在地板上的回响。

一定会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但我的力量已经耗尽了，手指象手套一样空荡荡的，双眼缺乏洞察力，没有什么可以指引我了。

我坐在桌子旁，翻一本旧杂志，牧羊人为自己编织袜子，风雨扭曲了他们的脸，妇女们系着紧身围腰，嘴上涂着口红，微笑着显示她们的牙齿和快乐；橡胶种植园和荒废的宙宇，杂草爬到尊贵的雕刻神像上。封面上有一枚从未加工的圣餐杯里拿出来的戒指，昨天或十年前印上去的。

我打开一瓶桃罐头，吃了两块，糖汁从勺子里流出来。然后我在躺椅上躺下来，睡眠降临到我的脸上，黑色的四方

形，无梦。

醒来时，外面漫射的光已经移到大西边去了，天色已晚，一定是快六点了，晚饭时间；只有大卫有手表。饥饿从我身体内部升起，一声遏止的啜泣。我摘下窗户爬了出去，当我的一只脚踏在摇摇晃晃的手推小车上向地上跳时，我的膝盖刮破了。我应该做一架梯子；但没有工具，没有木板。

我走到园子里。我忘了拿刀和碗，没有它们也可以，手指就行。我打开门栓，鸡笼似的围墙罩在我的周围；栅栏外的树木象得了萎蔫病一样低垂着，园内的植物在灰色的光线下显得苍白；空气沉重、压抑。我开始拔洋葱和胡萝卜。

我终于哭了起来，这是第一次，我看自己哭：我伏在莴苣旁，花儿已经凋谢，变成了种子，我的呼吸打结，我的身体由于控制它而僵硬；我的口腔里充满水，鱼味。但我并不悲哀，我在谴责他们，你们为什么那样做？他们选择了那种做法，他们对自己的死亡有所控制，他们决定离开，他们就走了，他们建造了这个障碍。他们并不考虑我的感觉如何，谁会在乎我呢。我非常气愤，因为他们使这一切发生了。

"我在这儿，"我喊道。"我在这儿！"声音由于受挫而不断提高，随之而来的是没有得到回答的恐惧，晚饭后我们做游戏，我藏得太隐蔽、太远，他们找不到我了，我就这样喊叫。树桩都是一样的形状，一样的颜色，无法找到回去的小路，测量一下太阳、方向，不管你走哪条路，你肯定走到水边。危险的是恐惧、是绕圈子走来走去。

"我在这儿！"毫无反应。我抹去脸上的咸水，手指脏兮兮的。

假如我希望，假如我祈祷，我会把他们唤回来。他们就在这儿，我能感觉到他们的等待，在我看不见的小路或栅栏外的高草中，他们逆我而行，但我会使他们从他们所藏身的任何地方走出来。

我点燃炉火，在黑乎乎的屋子里做饭。没有理由往外拿盘子；我用勺子直接从锅和煎盘里往嘴里填食。我要尽量减少弄脏盘子的次数，直到有太多的脏盘子；当洗盘桶满了以后，我得用绳子把它竖到窗外。

我再次爬出去，用盘子里喂鸟的罐头肉使伤口凝结。浓重的灰色，乌云压下来，逼近了；起风了，它震颤地掠过湖面；南面已形成雨柱。闪电忽隐忽现，但没有雷声，树叶咆哮作响。

我向坡上的厕所走去，强迫自己走得慢一点儿，让恐惧与我保持一段距离，注视它。进到里边，我把门插上了，这是一扇使我害怕的门，因为我不能透过它看到外面，因为风使它自动打开。我顺着小路往回跑，告诫自己停止恐惧，我已够大的了，我已老了。

力量会保护我，但它不见了，它已精疲力尽，此时此刻就象银子弹和十字架一样派不上用场。但这间房子能保护我，它的形状恰到好处。进到屋里，我又把窗户挂回窗框上，把自己围在里边。四块碎玻璃，我怎么堵住它们呢？我从杂志上扯下一张张的纸，把它们揉皱来填堵漏洞，但根本不行，洞口太大，纸充填物掉在地上。我要是有钉子和锤子该有多好。

我点亮灯，但风从破碎的窗户外吹进来，灯闪烁不定，

变成蓝色，而且，灯亮时，我看不见外面发生的事。我吹灭灯，坐在黑暗中，倾听着风的怒吼，但还是没有下雨。

过了一会儿，我决定上床睡觉。我并不觉得累，我下午睡觉了，但没有什么可做的。我在我的房间里站了很长时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害怕脱衣服；我是担忧他们会为我而返回吗？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我会很快跑出去；但他们是不会在暴风雨中回来的，伊文斯知道得很清楚，开阔的湖面会由于闪电而成为最危险的地方，肉体和水都导电。

我打开窗帘，这样会有多一点儿亮光。我母亲的夹克衫挂在窗户旁的钉子上，里面没有人；我把前额贴在衣服上，皮革味儿，失去的味儿；难以遮盖。但我不能想这些。我和衣躺在床上，过了一会儿，雨点打在屋顶上。先是吧嗒吧嗒地，继而变成均匀的敲击，四周一片崩落的声音。我感觉到湖水在上涨，漫过岸滩，漫上山丘，树木象沙堆坍塌一样倒伏，树根拔起，房子离开地基象船一样飘浮，晃来晃去，晃来晃去。

午夜时分，寂静使我醒来，雨停了。茫茫黑夜，什么也看不见，我想动一动我的手，但是它不听使唤。惊恐象海浪一样袭来，象落地的脚一样没有中心；它象盔甲一样束缚着我，我的皮肤在害怕，在僵硬。他们要进来，他们要我打开窗户、打开门，他们自己做不了这些事。我是唯一的人，他们依赖我，但我不再知道他们是谁；不管他们是怎么回来的，他们不是以前的那些人了，他们要发生变化。我曾希望这样，我曾呼唤他们，他们应该回来，这是合乎逻辑的；但逻辑是一堵墙，我建造的墙，墙的另一面是恐惧。

第二十三章

早晨，窗户的轮廓慢慢呈现出来；我一定整夜都在注视窗户。而后，我想这可能是个梦，那种产生醒着的幻觉的梦。

早饭我吃的是罐装炖肉，我用坛子把它热了一下，还喝了速溶咖啡。这间屋子有许多窗户，我挪到靠墙长凳上坐下来，从这儿可以看到每扇窗户。

我把盘子放进桶里，里面还有昨晚用过的餐具，我把剩下的热水浇到它们上面。然后我走到镜子前梳头。

但当我拿起梳子时，我的手涌起一股惊恐，力量以不同的形式又出现了，它一定是在闪电期间从地下渗透出来的。我明白了梳子是被禁止的东西，我必须不再走到镜子前。我最后一次看了一眼我的扭曲的脸：暗红皮肤上淡蓝色的眼睛，头发乱蓬蓬地缠绕着，映象横在我的双眼和梦幻之间。不是为了看我自己而只是为了看。我翻转镜子，因此它现在面朝墙了，它不能再使我陷入圈套了，安娜的灵魂被锁在金色的化妆盒里，我该打碎的是化妆盒而不是照相机。

我卸下窗户爬了出去；恐惧马上离我而去，就象掰开了掐在脖子上的手。那儿一定有戒条：有的地方我可以去，另外一些地方我则不能去。我必须仔细倾听，如果我信任他们，他们会告诉我什么是被允许的。我应该让他们进来，那

也许是他们给予我忠告的唯一机会。

秋千的围栏和沙滩是被禁止的，不用触摸它们我就知道这一点。我向湖边走去。湖水非常平静，水面微波荡漾，薄雾从港湾和小岛后面升起，它上升时就被太阳烤没了，太阳本身象穿过透镜的光一样炽热明亮。水面上什么东西在发光，一只游动的动物或一根死木桩；没风的时候，生物都敢于从岸上走出来。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味儿，仲夏时节。

我走向船坞，恐惧告诉我不要这样做，我可以靠近湖，但不能走上船坞。我站在光滑的石头上洗手。如果我按正确的程序办事，如果我什么也不想，什么样的牺牲？他们要什么？

当我确定我猜到了被要求去做的事是什么时我走回小屋，进到里面。做早饭的火还在燃烧：我往火里扔了一根木头棍，打开了草图。

我打开夹子拉手，拿出图画和打字文件，《魁北克民间故事》，在城里很容易再弄到这些东西，粗制滥造的公主们，金菲尼克斯象干瘪的鹦鹉一样笨拙，没有生气。纸页在我手里起皱；我一页一页地往火里扔，这样不致于把火闷死，然后是油彩管和画笔，这不再是我的未来了。一定有个地方可以藏我的大皮夹，它无法被烧掉。我用刀在它上面划了个×。

我从左手上摘下戒指，它是我最终要抛弃的第二件东西，我把它扔进火里，祭坛，它也许不会融化，但它至少会被净化，上面的血会被烧掉。历史上的每件事都该被清除，那些圆圈和不可一世的四方形纸页。我在床垫下面摸出剪贴簿，把它们撕开，女士们，缀着装饰的瓷器头，太阳和月

亮，兔子和它们古代的蛋，我的假和平，他的战争，飞机、坦克和带头盔的探险者；也许在世界的另一面，我的哥哥感到重负被卸下来了，自由又进入他的双臂。甚至那些向导，不可思议的双面女人和长角的神，他们也一定被转化而升天了。还有墙上那些有着西瓜般乳房、穿着灯罩一样裙子的女人们，她们全是我的赝品。

他们的东西也是如此，从墙上扯下地图，石壁画，依照父亲的遗嘱留给我的；还有相册，母亲生活的顺序，关闭的照片。我自己的脸歪着、变黑了，伪造的父亲和母亲变成了一堆灰烬。我们应该被隔开了。我是一个胆小鬼，我不该让他们进入我的岁月、我的地方。现在，我该进入他们的岁月、他们的地方。

当这些纸都被烧掉以后，我打碎玻璃杯、盘子和灯罩。我从每一本书中撕下一页，伯斯威尔的书，还有《斯特布利格之谜》，圣经，以及普通的蘑菇、《原木棚屋建筑》之类，烧掉所有的字需要太长的时间。我把不能打碎的东西——煎盘，搪瓷碗，匙子和叉子——都扔到地板上。我又用刀乱砍地毯、床单、床和帐篷，最后便是我的衣服，母亲的灰色夹克，父亲的灰色毡帽，雨衣，这些外壳不再有用处了，我把它们全部废除掉，我需要清理出一个空间。

当一切都不复完整，只有火还在燃烧时，我离开了，挟着一块受伤的毯子，在毛皮长出来之前我还需要它。房子在我身后吧嗒一声关闭了。

我脱掉鞋子走到湖边；地面潮湿、冰冷，被雨砸得满是窟窿。我把毯子堆在岩石上，走进水里躺下来。当我身上的每一部分都湿了以后，我脱掉衣服，象剥落壁纸一样把它们

从我身上剥下来。它们在我身旁摆动，膨胀，袖子里充满空气。

我的后背躺在沙子上，头靠在岩石上，象浮游生物一样无害；我的头发飘散开来，在水中浮动。地球在转动，象吸引月球一样吸引着我的身体；太阳在空中跳动，红色的火焰和射线从其中跳射出来，烧灼着隐藏在我身上的罪恶，冷冰冰的雨渗透我的全身，温暖着我携带的血液蛋。我把头扎进水里，清洗我的眼睛。

岸上有一只潜鸟；它低下头，然后又抬起头叫了起来。它看见了我却视而不见，把我看成是陆地的一部分。

当我变得洁净以后，我从湖里走上来，让我的假身体漂浮在水面上，衣服：假目标；在波浪的冲击下它发出响声，引人注意地漂在船坞边上。

以前，他们把衣服作为纪念品来赠送；那是不公平的，但神灵们作出了要求，它们什么都要。

太阳已走完一天的四分之一行程，我开始感到饿了。小屋里的食物是被禁止的，我未被允许走回那个笼子，木制的长四方形。罐头也是被禁止的；它们是金属和玻璃。我走进园子四处徘徊，然后跪下来，把自已裹在毯子里。我剥开豆壳吃里面绿色的豌豆和黄色的生蚕豆，我用手指把胡萝卜从地里拔出来，我先要在湖里把它们洗一洗。我还在杂草中找到一粒已过时节的草莓。红色的食物，心的颜色，它们是最妙的种类，它们是神圣的；黄色，蓝色；绿色的食物来自蓝和黄的混合。我拔出一根甜萝卜，刮掉上面的泥土咬了一口，皮太硬了，我没有足够的气力来对付它。

太阳落山时，我把洗过的胡萝卜从其藏身的草丛里拿出

来，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还有半棵白菜。厕所是被禁止的，因此我在地上大小便，用脚踢土来掩盖它们。所有洞穴动物都这么干。

我在柴垛旁挖了一个洞穴，下面铺着枯树叶，四周摆着干树枝，上面覆盖着扭结的新鲜针叶枝条。我用毯子蒙着头，卷缩着身子躺在里面。蚊子很多，它们叮透毯子；最好别打死它们，血腥味会引来其它蚊子。我象猫一样睡觉，睡一会儿，醒一会儿，然后再睡。我的肚子疼起来。我周围的空间在沙沙作响；猫头鹰的声音，穿过湖面或就在我的体内，距离缩短了。柔风，微浪与滩岸交谈，多种语言的水。

第二十四章

透过枝条的缝隙洒进来的斑驳阳光使我醒来。我的筋骨酸痛．饥饿在我体内横行，气球肚子，漂浮的鲨鱼的胃。天气很热，太阳几乎已在头顶上了，我差点睡到中午时分。我爬出洞穴向食物所在的园子跑去。

园门挡住了我。昨天我可以进去，但今天不行；他们的行动在逐步升级。我靠在栅栏上，土地由于昨晚的雨和露水而泥泞，湖水渗透其中，我的脚在泥地上留下了脚印。我的胃在痉挛，我走到一边，在高高的草丛中躺了下来。那儿有一只青蛙，身上点缀着绿色的斑点，它有一双金边眼睛，祖先。它把我也算在内了，它闪着光，除了喘气的喉头外，一动不动。

我躺在草地上，双手支着头，努力忘掉饥饿，我透过网状栅栏的六角形洞孔往园子里看；一行行，一块块，桩记，标示物。植物正在旺盛成长，它们的生长几乎是可以看得出来的，通过根须和肉质的茎吸吮水份，它们的叶子湿漉漉的，在阳光下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绿色，杂草和正规的植物都是一样的，没有区别。地下，虫子在蜿蜒爬行，粉色的藤。

栅栏是坚不可摧的；除了杂草的种子，鸟儿，昆虫和天气外，它能把任何东西拒之门外。栅栏下面是一条两尺深的沟，沟边镶着碎玻璃片儿，破碎的坛子和瓶子，上面覆盖着

沙砾和土，土拨鼠和臭鼬无法在下面打洞。青蛙和蛇能爬过去，它们是被允许的。

园子是花招和诡计。没有栅栏，它是无法存在的。

现在，我明白那个规矩了。他们不会在有标志的地方，不会在某物之内，即使我打开门和栅栏，他们也不会走进去，走进房子或笼子，他们只能在他们的空间里移动，他们没有边界。我必须进入他们所处的境地才能与他们交谈，虽然我很饿，但我还是得抵制栅栏，此时，我距栅栏太近了，无法返回了。

但一定有别的我可以吃的东西，未被禁止的东西。我考虑着该弄点儿什么：蝌蚪，水蛭，但这儿没有。小径的边上长着一些可吃的植物，蘑菇，我知道哪些有毒，哪些是我们曾经采摘的，其中一些可以生吃。

藤架上有悬钩子，已经枯萎，很少了，但它们是红色的。我吸吮着它们，它们的甜蜜、酸涩强烈地刺激我的口腔，果核撞得牙齿劈啪作响。我向小径深处走去，坑道，树木的凉爽，我一边走一边寻找可吃的东西。他们会提供食物的，他们向来赞成生存。

我又找到了六叶植物，两株，我挖出它们的鲜嫩根茎，不等把它们拿到湖边洗一洗就嚼了起来。泥土在我残损的指甲下结块。

还有蘑菇，我要把那种致命的白色蘑菇留到我有了免疫力时再吃。我可以吃那种黄色的食物，黄色的指头。眼下，它们中的好多已经太老、太皱了，我掐下几株稍嫩一点儿的。吞咽之前，我很长时间地把它们放在嘴边，发霉的味儿，发霉的帆布味儿，我无法确定它们。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眼下足够了。我坐下来，我把自己裹在被草打湿的毯子里，我的双脚冰凉。我还需要别的东西，也许我能用我的手抓住一只鸟或一条鱼，那将是合理的。它在我的体内生长，他们拿取他们所需要的，如果我不给它喂食，它就会吸收我的牙齿、骨骼，我的头发就会变稀，一把一把地往下掉。但我把它放在那儿了，我产生了它，有尾巴和角的毛皮神已经形成。神的母亲，他们感觉如何？声音和光从肚子里向外闪耀，他们觉得不舒服，头晕吗？疼痛挤压着我的胃，我弯下腰，头顶在膝盖上。

缓慢地，我又沿小径走回来。我看见了变化：我的双脚提起，离地面有几寸高。我变得象冰一样清亮、透明，我的骨骼和里面的孩子透过肉体的绿色网络显露出来，肋骨是阴影，肌肉是果冻；树木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它们微微发光，树心透过木质和树皮闪光。

树林跳了起来，巨大无比，呈现出被人们砍伐之前的样子，一束一束的阳光冻结了；石砾漂浮、溶化，所有的一切都是由水制成的，甚至岩石也是如此。有一种语言没有名词，只用动词来表示一段较长的时间。

动物没有言谈的必要，当你是一个人时，为什么要说话。

我靠在一棵树上，我是一棵倚靠的树——

我破碎了，披着满身阳光，头抵在地上

我不是一只动物或一棵树，我是树和动物闪烁其中的东西，我是一个地方

我必须起身，我站起来了。借助大地，破碎的表面，我站立着；再次分隔。我把毯子披在肩上，头向前倾。

我能听见樫鸟的叫声，叫啊，叫啊，好象它们发现了敌人或食物。它们在小屋附近，我走上山坡向它们走去。它们就在树木中间飞扑着，空气把自己弄成鸟的形状，它们继续叫喊。

我看见了她。她站在小屋的前面，她的手向前伸着，她穿着那件灰色的皮夹克；她的头发很长，披在肩上，三十年前的式样，我出生之前；她半转着身子，我只能看见她的侧脸。她没有挪动，她正在喂它们，一只停落在她的手腕上，一只停落在她的肩上。

我停下脚步。起初，除了惊奇的缺乏外，我什么感觉也没有；那就是她应该呆的地方，她一直站 在那里。我 注视着，那景象一动不动，我害怕了，我怕得浑身发冷，我害怕那不是真的，是用我的眼睛剪成的纸娃娃，烧掉的照片，如果我眨眼，她就会消失。

她一定感觉到了我的恐惧。她轻轻地转过头来，朝我这边看着，望着我的身后，好象她知道那儿有什么东西，但她看不清。樫鸟又叫了起来，它们从她身上飞了起来，它们翅膀的影子在地上荡起涟漪，她不见了。

我走到她站过的地方。樫鸟站在树木中 间 朝我 呱呱叫着；喂鸟的盘子里还有点儿食物，它们把其中一些食物洒到地上了。我眯着眼睛注视它们，努力想看到她，努力想看出哪一只是她；它们跳了起来，抽动着羽毛，转过头来，先用一只眼睛盯着我，然后用另一只。

第二十五章

又是白昼，我的身体从睡眠中跳了出来。我听到了机动艇的声音，进攻的声音。几乎有点太晚了，我醒来时，他们已经进入港湾、减慢速度，就要靠近船坞了。我用双手双脚从洞穴中爬出来，身上盖着毯子，褐色的编结伪装，我弓身跑进树林里倒伏下来，然后爬进灌木丛、榛木丛中，我可以从那儿往外看。

他们可能是被派来找我的，也许是别人要求他们这样做，他们可能是警察；或者，他们可能是观光者，好奇的旅游者。伊文斯会在商店里告诉人们有关我的事，整个村子都会知道。或者战争开始了，侵略，他们是美国人。

他们不可信。他们会把我误认为人类，一个缠着毯子的裸体女人；很可能这就是他们来这儿的原因。如果某物脱缰跑了，没有主人，为什么不得到它。他们没有能力说清楚我到底是什么。但是，如果他们猜到了我的真实形状、身份，他们会向我射击或者用大头短棒猛击我的头颅，把我双脚捆起倒挂在树上。

他们正笨拙地从船上下来，四、五个人。我看不清他们，看不清他们的脸，树干和树叶挡着我的视线；但我能闻到他们，令人恶心的气味，不流通的空气，汽车站和尼古丁，嘴与毛线裤，铜线和钱的酸臭味儿。他们的皮肤是红色

的，绿色的方块，蓝色的长条，我一下想起这是假皮肤，旗子。领子上方真正的皮肤是白色的，拔过毛的，上面还有一块一块的毛，斑驳的毛皮和非毛皮的混合，象发霉的香肠或是狒狒的臀部。他们正在进化，已走完进化为机器的一半路程，左边的肌肉萎缩患有疾病，象阑尾一样满是气孔。

其中两人爬上土坡向小屋走来。他们边走边谈，声音很清晰，但一经进入我的耳谷就只是声音了，外国电台。那不是英语就是法语，但我无法确认那是我所听到或知道的任何一种语言。伴随着嘟哝声和脚步声，他们走了进去，从门或开着的窗户走进去，里边传出靴子踩在碎玻璃上的嘎吱声。其中一人大笑起来，那声音活象用钉子刮石板瓦。

另外三人还站在船坞上。他们呼喊着；他们一定是发现了我的衣服，其中一人蹲跪在地上。那是乔吗？我想勾画出乔的模样。但这毫无意义，他不会帮助我，他会站在他们一边；可能是他把钥匙交给他们的。

那两人走出小屋向船坞走来，他们的假皮肤摆动着。他们聚到一起，象快转的磁带一样叽里咕噜地说着，叉子和匙子在他们的手中兴奋地舞动着。也许他们认为我溺水而死了，那可是他们犯的大错误。

别出声！我对自己说，我咬住自己的胳膊，但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笑声从我的喉头喷射出来。这笑声使我惊奇，我赶紧住嘴，但已经太晚了，他们听见了。胶底鞋咣咣地走下船坞，防弹的脑袋转向我，他们是谁，大卫和乔，村子里的克劳德，伊文斯，间谍玛姆斯特罗姆，美国人，人类，他们来到这儿，因为我不出卖。我告诉他们，我不拥有它，谁也不拥有它，你们不必杀了我。兔子的选择：麻木不动，充分

利用他们没有看见你的机会，然后逃跑。

与他们相比，我具备有力条件，我没穿鞋。我悄无声息地跑着，躲避树叶，跑上通往沼泽的小径，独木舟就在那里，我会轻易地首先到达那儿。在开阔的湖面上，他们会用摩托艇把我劈成两半儿，但是，如果我走进沼泽，置身于死树根之间，我就会很安全，他们就不得不蹚水抓我，那儿的泥土是松软的，他们会象推土机一样陷下去。他们在我的身后赶上来，皮靴踩地通通响，嚎叫的语言，电子信号在他们中间往来传送，他们用数字交谈，理智的声音。他们哨啷作响，身上带着沉重的武器和电镀的铁器。

他们成半圆形围了上来，五根金属手指收拢成一个拳头。我往回跑。另一个计策：上树，但时间来不及，而且也没有足够大的树。匍伏在岩石后面，白天可以，但现在不行，而且没有岩石，在我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把自己推进地球下面去了。飞，已经没有选择余地，虽然我在祈祷，但力量已经抛弃了我，什么都不站在我的一边，甚至太阳。

我转向湖，那儿有一个高堤，坡很陡，主要是沙子。我走到高堤的边缘，滑了下去，好象是用膝盖和胳膊肘，划出两道犁沟，我希望他们看不出这痕迹。我一直用毯子蒙着身体，这样，白色就不会显露出来，我的脸紧贴着腐朽的树根爬行着。扭曲，雪松树。我的一只脚和一只胳膊被划破了，我感觉到血象威士忌一样往外涌。

哨啷声和叫喊声从我身边经过朝前去了，走远了，又近了。我一动不动地呆着，别把自己交出来。他们回到树林子聚到一起：谈话，大笑。也许他们带来了食物，装在有盖的大篮子和暖水瓶里，他们也许把这看成是野餐。我的心收

紧，又放松了。我倾听着。

发动摩托艇的声音刺激着我。我爬上高堤，蹲伏在树桩的后面，如果我呆在湖滩上，他们会看见我。噪音从他们那儿咆哮而出，他们象箭一样疾驰而过，离我那么近，我可以用石子打中他们。我数了数，肯定他们是五人。

那就是他们的行径，不让你有平静的生活，他们不允许你拥有他们所没有的东西。我呆在高堤上，休息一会儿，用嘴舐伤口；我的皮肤上还没有长出毛，为时尚早。

我择路返回小屋，心里蔑视神灵，虽然他们可能救了我；一瘸一拐，脚上还在流血，但已经不多了。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设下陷阱；我得避开我的洞穴。被困的动物咬断自己的胳膊和腿来获取自由，我大概也能。

我没有时间来感觉饥饿，此时此刻，饥饿离我而去，它并未坚持；我一定是已经习惯于它了，不久我就能完全不用进食而生存了。过一会儿，我要查寻另一条小径；小径的尽头有一块右头，那儿有乌饭树丛。

当我走近工具棚时，恐惧和力量又出现了，就在我的脚底，它从地下涌出，无声的嗡嗡。我被禁止走上小径。被金属所触碰的一切，伤痕累累；斧子和大砍刀开辟的小径，秩序是用刀完成的。他的工作是错误的，他的确是一个观察者，他熟悉这些事，数出它们的数量，这样其他人就可以砍伐挖掘它们。此时，他一定已经明白了这一点。我走到一边，避开被脚践踏的地方，向湖边走去。

他背朝我站在栅栏附近，正在向园子里观望。临近黄昏

的阳光斜射在土坡上的树桩中间，落在他的身上，使他成为一团朦朦胧胧的桔色雾气，他象水汽后面的物体一样摇曳着。

他感觉到自己是一个闯入者；小屋，栅栏，火和小径都是亵渎；现在，他自己的栅栏排斥他，就象逻辑排斥爱情。他想让这一切结束，界线消失，他想让树林流回到被他的头脑清理过的地方，补偿。

我说父亲。

他转向我，那不是父亲。那是父亲所看到的，那是当你独自一人长久地留在此地就会看到的东西。

我并不害怕，如果我害怕它，那将太危险了；它用黄色的眼睛盯着我，狼的眼睛，就象夜晚车灯下的动物眼睛，没有深度，闪烁不停。反映物。它既不喜欢我也不讨厌我，它告诉我，它跟我没什么可讲的，除了它自己。

然后，它的头以一种笨拙的、几乎是丧失活动能力的动作转开了：我不喜欢它，我是景物的一部分，我可以是任何东西，一棵树，一只鹿的骷髅，一块岩石。

我看出，虽然它不是我的父亲，但它是我父亲的变体。我知道，他没死。

一条鱼从湖里跳出来

鱼的思想跳跃

一条鱼跳跃，两侧涂有斑点的木刻鱼，不，用红颜色画在石壁上的带角的鱼，保卫着精神。它悬挂在空中，肌体变成圣像，他再次发生变化，返回水中。他能有多少种形状？

我注视它约一个小时；然后，它滑落变软，边缘扩展，它又成了一条普通的鱼。

我走近栅栏，脚印还在那儿，并排印在泥地上。我的呼吸急促起来，这是真实的，我看见了它。但脚印太小了，上面还有脚趾印；我把自己的脚放进去，我发现，那是我自己的脚印。

第二十六章

晚上，我又挖了一个洞穴，更靠后，更隐蔽。我什么也没吃，只是躺在岩石上喝湖里的水。夜里，我做了一个有关他们的梦，梦见他们活着和变老时候的样子；他们在一只船里，绿色的独木舟，驶出港湾。

早晨醒来时，我知道他们终于走了，回到我召集他们之前他们所在的地方，又回到地里、水里，又回到空气中。规定已经过时失效了。现在，我可以去任何地方了，进入小屋、花园，我可以在小径上行走了。我是岛上唯一活下来的人。

他们曾到过这儿，我相信这一点。我看见了他们，他们曾经与我说话，用别的语言。

我已不再感到饥饿了，但我还是步履艰难地走回小屋，又从窗户爬进去，打开一盒黄蚕豆罐头。热爱生活，我欠他们的就是这个。我盘腿坐在靠墙的长凳上，用手指夹里面的豆子，每次只吃几粒，一开始就吃太多是有害的。地板上放着一堆破烂，破碎的东西，那是我干的吗？

大卫和安娜曾在这儿，他们曾睡在那边的卧室里，我记得他们，但朦朦胧胧，其中还掺杂着一种怀旧之情，就象回忆那些我曾认识的人一样。此时，他们住在城里，在不同的时间里。我可以记起他，我的假丈夫，记忆比较清晰，此

时，我对他的感觉只有遗憾。他不是我所相信的事物中的一种，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不甚优秀，用一般的标准衡量，他自私善良；但我接受不了平常和一般，容忍不了那没有必要的残忍和谎言。我的哥哥很早就看到了这种危险。为了洗礼自己，或者参加战争，或者被毁，虽然可能还有别的选择。

不久就会是秋天，然后是冬天；八月下旬，树叶就要变黄，一进十月就要下雪，一直下到白雪掩埋了窗户和屋顶，湖水会冻得结结实实。或者在那之前，他们会关上水闸，让水位提高，我要日日观察，也许这就是他们乘坐摩托艇来这儿的原因；不是为了打猎，而是为了警告我。不管怎样，我不能永远留在这儿，这儿没有足够的食品。园子不会绿多长时间了，坛子和瓶子里的东西也快用完了；连结我和工厂的纽带已经断裂，我没有钱了。

如果他们是寻找我的人，他们回去时也许会说他们看见了我，或者只是认为看见了我。如果他们不是寻找者，他们便什么也不会说。

现在或者明天，当我吃饱并有了足够的力气时，我就取出拴在沼泽地里的独木舟，十里的水路，我就可以到达村子了。然后回到城市、回到充满威摄力的美国人中去。他们存在着，他们正在挺进，该有人对付他们，但他们也许可以被监视，被预测，被遏止，而不必模仿他们。

此时，没有神灵帮助我，他们的可疑性再次显示出来，象耶稣基督一样只是一个理论。他们退却了，退回到过去，进入头颅中，那是相同的地方。他们不会再出现在我的面前，我承担不起；从现在起，我要过一种正常的生活，以他

们的虚无来限定他们；以它的失败去爱，以它的失落和遗弃来获得力量。我为他们感到遗憾；但他们只给予一种真理，一个方面。

没有绝对的解决方法，没有绝对的复生，我们的父亲，我们的母亲，我祈祷着，为我而下来吧，但不起作用：他们缩小，生长，变成他们以往的样子，人。我从未想到他们有这样的能力；但他们的极权主义的清白却是我所拥有的。

我第一次考虑他们做人会是什么感觉：我们的父亲把他的生活局限在一个岛上，在战争期间和穷困的国家里，保护我们和他自己，他一定煞费苦心地保持他的理智的幻想和仁慈的秩序，也许他没有这样做。我们的母亲，收集季节、气候和她的孩子们的脸，这些细心的记录使她遗忘了其它事情，忘却了她与之抗争的痛苦、孤独或别的什么在历史中消失的事情，我永远不会知道。他们此时已离我远去，他们属于他们自己，象以往一样。

我把空了一半的罐头盒放在桌子上，小心翼翼地走过地板，裸露的双脚避开地上的碎玻璃。我把镜子转过来；里面的生物即不是动物也不是人，无毛，只有一张肮脏的毯子，双肩收拢佝偻着，深深的眼窝中，蓝眼睛冷冷地凝视着；嘴唇自动启合。这曾经是立体声磁带上的广告画；头发里塞满草棍，胡说八道或闭口无言。能与别人交谈，文字也可被理解：他们的正常的定义。

此时此刻，真正的危险是医院或动物园，当我们不再有能力应付的时候，我们就被送到那里，种类或个人。他们永远不会相信这是一个自然状态的女人，自然状态，他们会把我看成是沙滩上一个晒得黝黑的身体，被湖水浸湿的头发象

围巾一样摆动；不仅仅是这样，脸上还有斑斑泥块，污痕遍布，皮肤上满是积垢，痂结累累，头发象破损的浴室防滑垫，上面夹杂着树叶和草根。新形的一期报纸中最中间的一张。

我笑了起来，那声音活象是某物被害时所发出的声音：一只老鼠？一只鸟？

第二十七章

总而言之，拒绝就使自己成为受害者，除了那样做，我别无选择。我必须放弃信仰，放弃以往的信念：即我是软弱无能的女人，而正因如此，我不会做伤害别人的任何事情。谎言总是比事实更富灾难性。文字游戏，输和赢的游戏结束了；此时此刻，没有别的什么了，但它们可以被发明出来，撤退不再成为可能，抉择是死亡。

我把毯子扔到地板上，走进我那被砸得破烂不堪的房间。那儿有衣服，上面带着刀痕，但我还是要穿上它们。我笨拙地穿上衣服，对纽扣已不熟悉；我又进入自己的时间。

我身上携带着从遥远的五天前的夜晚弄来的时间旅行者，一个将需要学习的原始的家伙，此时，它在我的腹中呈金鱼形状，正在进行其水中的变化。潜在的文字沟壑已在它的原始大脑上形成，未涉足的小径。不是神灵，或者它根本就不存在的，就连这个也无法肯定；我还无法知晓，太早了。但我设想它：如果我死了，它也会死，如果我觉得饿，它也会与我一起觉得饿。这也许是第一个，第一个真正的人；它一定要生出来，它被允许有此种权力。

船来时，我正走进花园里。不是伊文斯；那是保罗的船，厚重、缓慢，涂着白色油漆，那是他自己制造的。保罗坐在船尾，在古式的发动机旁边；前面是乔。

我跑出园门，躲在树后面，路旁长着一簇簇的白桦，不必着急，不必跑开，只是小心一点就可以。

发动机关闭了，船头顶在船坞上。保罗站起来，用一根桨使船靠紧船坞；乔走下船，他把船拴好，向岸上走了几步。

他喊着我的名字，然后停下来。“你在 这儿 吗？”回音：这儿吗？这儿吗？

他一定等在村子里，寻找者一定告诉他，他们看见了我，也许他就与他们在一起。当大卫和安娜乘车离去时，他留了下来，或者他开车同他们一起回到城里，然后又搭车返回、步行回来，重要的是他在这儿，一个调停车，一位大使，向我提供什么东西：任何形式的监禁，新的自由？

我望着他，我对他的爱象第三只眼睛或可能性一样无价值。如果我同他一起走，我们就得 交谈，木头房 已经废弃了，我们不能再象以前那样躲避 对方，过着 虚假 的和平日子，我们得重新开始。对我们来说，调解的语言文字是必需的；或早或晚，我们可能失败。那是正常的，就象此时发生的事情，我不知道这是否值得，我不知道我是否该依赖他，他可能是作为诡计被派来的。但他不是美国人，此时，我能看出这一点；他什么也不是，他只被塑造了一半，为此，我可以相信他。

相信就是走出来。我向前、向需求和询问推自己，虽然我的脚并未移动。

他又呼唤我，站在即不是水中也不是岸的船坞上，平衡自己，手叉在腰上，头向后仰着，眼睛审视着。他的声音里带有恼怒，他不会等很长时间的。但此时此刻，他在等待。

湖水很平静，树木围绕着我，即不索取也不给予。

[General Information]
□□=□□
□□=□□□M. □□□□□
□□=220
SS□=11838214
□□□□=1991.12

